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邮发代号82-507 刊号:CN11-2817

炎黄春秋

邓小平与李默庵

刘西尧谈原子弹氢弹研制决策过程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毛泽东巧借美机空运将帅赴前线

粟裕对手李默庵谈"七战七捷"

长征:共和国在马背上

司徒美堂何以受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礼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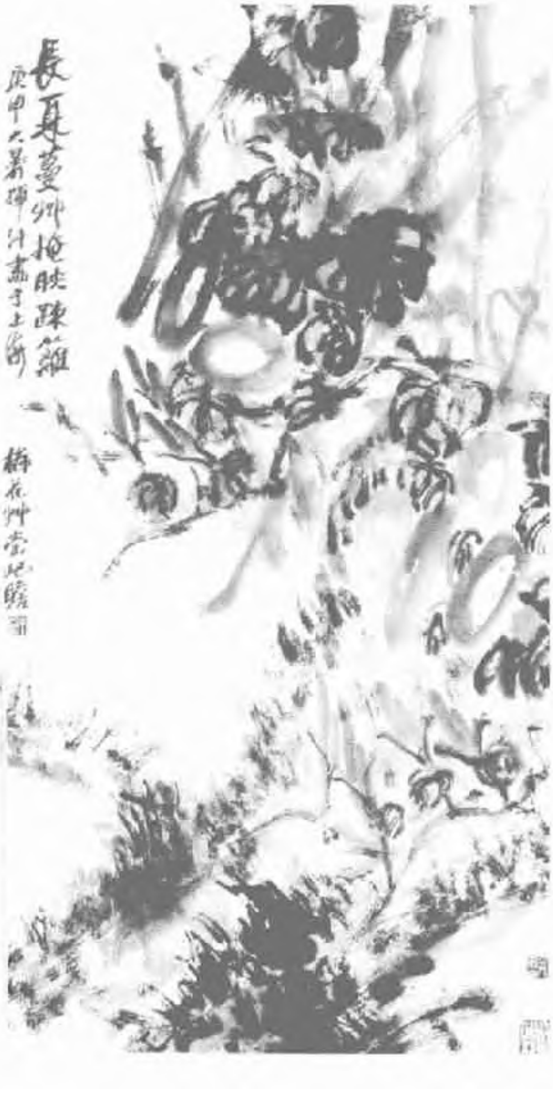
冰心

5/96

《当代炎黄书画精萃》作品选登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属炎黄书画院编辑、齐鲁书社出版的大型书画册《当代炎黄书画精萃》，现已正式发行。书画册集中了百多位海内外炎黄子孙名家的作品，从百岁老人朱屺瞻到青年新秀于文江，可说是“四世同堂”。整部书画册，流派纷呈，风格多样，映照出当代中国书画坛发展的态势和面貌。

本刊将选登该画册作品，以飨读者。



上图：尹瘦石《奔马》
下左图：朱屺瞻《长夏蔓草掩映疏篱》
下右图：启功《录古德语对联》

炎黄春秋

1996／5 （**总第50期**）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絜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事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飞无线电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建设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孙敏伟　宋晓洛
秘书长：徐　孔
副秘书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　　编：100802
印　　刷：[illegible]知识印刷厂
国内部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出版日期：每月11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杂志社电话：66170955
定　　价：4.[illegible]0元

目　录

专　稿

(2) **我国"两弹"研制决策过程追记** …………刘西尧

春秋笔

(10) **毛泽东巧借美机空运将帅赴前线** ………牛大勇

(15) 百天战斗：北平《解放》报从创办到被查封 ……………于光远　张沛　孙政

(21) **长征：共和国在马背上** ……………李茂林

(25) **历史档案回答了张学良对长征的一个疑问** ………力　平

求实篇

(29) **向忠发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共总书记** …杨奎松

英杰谱

(38)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孙彦钊

赤子心

(43) **司徒美堂何以受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礼遇** ……………木　易

遗闻录

(48) **报头变换《光明日报》曾起风波** …………关　民

(50) 毛主席纪念堂工程与天池山文物保护 ……………张志新

人海浪

(52) **粟裕对手李默庵谈"七战七捷"** …………高建中

(59) **艺坛猛士、政治漫画家米谷** ……………沈云汉

文荟园

(65) 梁实秋、冰心联袂主演《琵琶记》 ………罗静文

(47) **艺苑掌故新谭五则** ……………朱继功

时代风

(69) **通向太空的航天铁路** ……………才铁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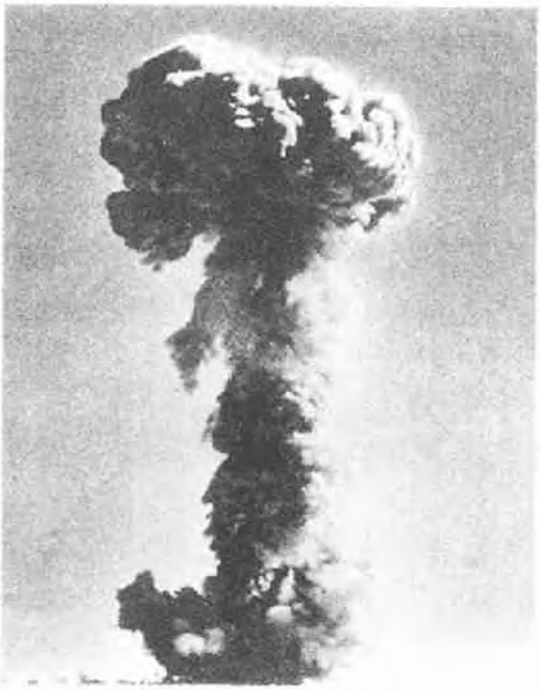
古今谈

(47) 大渡河：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邱远猷

(78) 以崇尚节俭为要务的刘裕 ……………安中晶

编读窗

(79) 作家舒芜致本刊信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我国"两弹"研制决策过程追记

●刘西尧

这里发表的是刘西尧同志长篇回忆录中的两节，原题为《忆攀峰》，现在的题目和文中插题为编者所加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6月12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援助。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撤回在中国的全部专家。所有这些丝毫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和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赤胆忠心，博学勤攻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们，其中许多带头人都是从海外归来的赤子，他们满怀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激情，和全中国各族人民一道，不信邪，不怕压，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继承中国工农红军"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革命英雄主义，坚定地继续前进了。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建国初期苏联和东欧各国对我国的援助，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他们把我们卡得很紧，一片过滤膜掉在地上，也要用吸铁石把它吸走，怕我们拿去仿制。断援后，他们的人都走了，不但打掉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的依赖心理和行为，也使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苏联拒援，聂荣臻提出研制新型材料的任务，毛泽东批示说"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

1959年聂荣臻副总理向国家科委提出了研制苏联拒援的国防尖端所需新技术原料和材料，简称为新型材料的任务。为此，把原来主管国防军工协作任务的国家科委一局改为新材料局，章竞三任局长，由我分管，从此我跨入了国防科研领域。为了解决国防尖端的配套所需，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还先后成立了三个协调小组，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一机部、三机部、物资部组成的材料、设备五人小组；一个是由五院即导弹研究设计院、科学院、国家科委组成的导弹研制协调小组；再一个是由二机部、科学院、国家科委组成的核武器研制的协调小组；三个小组都由我代表国家科委参加。

1959年7月，毛主席对聂荣臻副总理关于组织各有关部门研制新型材料的建议作了"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的批示。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一文件时再次指出，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原料、材料的基础上，必须下决心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一问题。

1960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聂荣臻和我关于研制新型材料的汇报，当场批准成立新型材料国家专案，正式组成由国家科委牵头的新技术材料小组，统筹安排，协调解决新型材料研制中的问题。会后，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国家计委程子华副主任

多次亲自过问、审查、落实。原来我们提了一百多个中间试验、试制项目，当时正值三年困难，从中选出了最急需的 96 个项目正式立案。由于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有关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与生产单位的努力，这 96 个项目都如期保质保量地建成投产，拿出了合格的产品。

新型材料研制任务为什么能那样顺利的完成，我体会除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外，还有如下几点：一是使用部门与研制部门密切协作，在确定技术指标时，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双方专家经常在一起研究商讨，制定既先进又是在当时条件下能以实现的指标，一步达不到的，分步骤进行。凡是这样做的，都较快地取得成功；反之，个别项目，因使用部门要求过高、过急，走了较大弯路。二是在安排研究试制的同时，就安排中间生产；能利用现有工厂的，就在现有工厂中，加一个流程或车间，需要大量生产时，再另作安排，这样既省又快。三是各有关部门都成立了专管这一工作的机构，指定了专门的负责人领导，督促并协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冶金部是刘彬、陆达、李东英，化工部是李苏、陶涛，建材部是祁峻，石油部是侯祥麟，科学院是裴丽生、谷羽，电子部是王世光、何华生，一机部是陶亨咸、张树楠，还有轻工、纺织部，负责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四是参加这一工作的全体人员的高度爱国热忱和忘我的工作。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低，而这些研究试验工作，有许多都需要日夜不停地进行，值夜班的同志就白天睡觉，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定量留在夜间工作时吃。

随着新型材料和国防尖端的研制，新技术元器件、仪器仪表和各种配套的大中小型设备的研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就是聂荣臻副总理所说的研制国防尖端所必须的"开门七件事"。国家科委又会同一机部、四机部等作了安排，并由沈鸿牵头，自行设计出我们在研制新型材料中提出的"九大设备"。"开门七件事"的顺利进行不仅满足了当时我国国防尖端研制、试验的及时需要，而且为以后我国自力更生地建设三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把我国整个工业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足之处，是我们对整个电子元器件，特别是半导体，虽然也注意到了，但是没有提到开辟科技和工业新时代的高度予以重视，起步并不晚，却未能跟上世界的步伐，被甩在了后面。

陈毅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它们（原子弹）搞上去；二机部的工作表明：两三年内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

苏联断援后，我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及有关建设一直没有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考虑，正如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所说的那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它们搞上去"，否则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不硬。当然这是对我国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下决心把核武器搞出来的形容语。因为没有这个吓人的东西，人家就看不起我们，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就难以大振。问题是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经济实力上能否承受，在科学技术上有没有能力？！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实践证明，我国搞核武器并没有影响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在这方面所花的钱和核大国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进行核试验的次数也是最少的。

1961 年夏，聂荣臻副总理把我和国防科委计划局的同志找到北戴河，那时我已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导弹要继续上马给中央的报告。他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支持。

1961 年 10 月聂荣臻副总理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又派张爱萍和我在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等的陪同下，到二机部所属主要单位去调查研究，我国能否自力更生地制造出原子弹？什么时候可以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核武器研制的核心机密。

我们一行在湖南，看了两个矿山，其中一个已经开始出铀矿，一个即将投产，都是地下井采。我们还看了苏联援建的水冶厂，已经基本建成。这是我这个祖籍湖南长沙的湖南人第一次到湖南。我们顺路到了毛泽东的韶山故居，刘少奇的花明村故居。回长沙夜渡湘江时，橘子洲头万家灯火，我不禁默念起毛泽东的"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词句，更增加了一定要让我国早日爆炸自己的原子弹的豪情壮志。

在西北先看了一个浓缩铀厂。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为推动该厂早日建成投产，发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已人"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帮助我国建设该厂的苏联专家，他们在我们职工的影响下，一起鼓足干劲加油干，积极地向他们的政府催要设备材料。到苏联政府撤退专家时，该厂的主要设备、材料已基本到齐，只要再解决一点零配件，就可以开工生产，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大跃进期间，该厂有的同志想改动某些工艺，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不同意，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发出了"先学楷书，后写草书"的指示，不但使该厂没有受到大跃进中歪风的影响，也使二机部事业始终沿着客观科学规律的正确轨道前进。

我们到选在地处青海高原的原子弹研制基地了解情况时，李觉、赵金璞、吴际霖等正在海拔 3200 米的地方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日以继夜地开始建设。他们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被职工誉为"青天"。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都是在那里先后制造出来的。后来我填了一首怀念那里的词。《忆江南·银滩颂》："高原雪，六月降银滩。篷帐连营来玉璞，迷津屡渡跨关山，举

世另颜看。”

在那个基地开始建设以前，二机部就在北京附近简易的棚子里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我们奉命去了解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航弹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一系列部件的试制、试验工作，只剩下一个技术关键问题，正从两个途径研制中，且专家们认为这两个途径都有成功的把握。我凭自己懂得的一点科技知识判断，也同意这个看法。以前，苏联曾答应给我们一个原子弹的模型，后来变了卦，他们派来的专家，在他们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什么也不敢讲，我们的同志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但是，出于革命的友谊，他对我们倒不是毫无帮助的。

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经过二机部和有关各方面同志们几年的努力，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的研制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只要进一步抓紧时间，加强组织协调技术攻关，安排好所需的配套件的研制、供应，两三年内，即最迟在 1964 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二机部的同志也是按这个目标安排的，但是在给中央写报告时，他们为了留有余地，建议写三四年内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我们认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宜早不宜迟，应该尽可能抓紧时间，抓紧工作，力争早日爆炸，因此坚持写了两三年。我们确信，只要抓紧，是可能的。这样就以张爱萍和我两个人的名义于 1961 年 11 月 14 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周总理。张爱萍把这个报告送了一份给邓小平总书记，邓阅后，在重要的地方打了杠，呈送给了毛主席。

此行，二机部的工作给我以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土”洋结合，全民找矿虽然造成了浪费，但为核武器研制提前提供了铀矿，再即前面所提到的，他们不等基地建成即提前在简易棚子里搞原子弹研制，以及“土”法上马搞铀矿水冶提取二氧化铀等，都为我国早日爆炸原子弹赢得了时间；二是他们的全体职工，包括一些卓越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隐姓埋名，艰苦奋斗的高度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远值得炎黄子孙尊敬、铭记和学习的。

我们回北京后，正值流行甲型肝炎，张爱萍和我都因转胺酶偏高住进了三〇一医院。秋天恢复工作后，我又奉命给二机部和核武器试验基地增调高级科学技术专家。主要是从一些大专院校选拔，没有完全按当时仿照苏联定的从事国防尖端机密人员条件的规定，主要看是否有真才实学和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在出身、社会关系以及是否党员等问题上苛求。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做对了。

我还再次和张爱萍一起先后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华东局作了汇报，在具体落实二机部所需的关键配套件等的研制供应方面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上海的工业技术基础再次显示出了潜力，几个关键的原材料都是上海的研究单位和工厂协力做出来的。有一个气压密封配件，东德援建的新厂做不出来，却在上海一个弄堂工厂试制成功了。我对上海是有感情的，因为我是在那里找到党的，搞国防科技有不少难题是在上海解决的。因此填了一首《清平乐·忆松江》：“苏州河畔，北斗终寻见。匆返钟山催雾散，初识风云雷电。重来地赤天红，春光普照吴淞。树大根深叶茂，新花郁郁葱葱。”

在此期间，还参与了编制发展国防尖端的补充规划，那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已经提前完成，国家已开始作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由于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发生矛盾，中央让张爱萍和我都兼任了国防工办副主任，张是管装备的副总参谋长，也兼了国防科委副主任，以便于协调军队装备与其科研、生产中的问题。邓小平又专门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来协调双方日常发生的矛盾。

为了解决国防科研和国防生产的矛盾，张爱萍曾提出国防科委与国防工办合并的意见，“文革”中受到批判。1971 年，我再进国防科委时，又提了这个意见，1974 年又受到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终于实现了国防科委与国防工办的合并，即现在的国防科工委。

周恩来先提出“三高”要求，后又指示：“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八届十中全会后，二机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在 1964 年，不迟于 1965 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两年规划。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审阅后附了一个报告，提出力争在 1964 年实现规划的要求，并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提出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原子能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保证这一规划的顺利完成。1962 年 11 月 3 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大力协同作好这件工作。”1965 年原子能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改为管两弹，即既管原子弹又管导弹，参加人员也扩大了，办事机构仍设在国防工办。

1963 年初，二机部党组的两年规划经中央批准后不久，刘杰去广州从化休养，二机部有的同志认为“两年规划”，不可能如期实现，在京党组同志反映到中央。为了弄清情况，落实“两年规划”，周恩来总理和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三位副总理商定，由我负责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检查组到二机部检查并帮助解决有关两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联合检查组接受任务后，先在北京与各方面

聂荣臻(左)亲临核试验基地(中为朱光亚)

的专家和负责同志谈话并仔细了解了在京各单位情况,认为1961年张爱萍和我向中央军委所作报告中的观点仍然是符合实际的,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是可以如期实现的。当时,核燃料生产加工已无不可解决的技术问题,前面讲过的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个技术关键,也已选定方案,在试制中。我们就调查了解的情况写了书面简报,并向总理和聂荣臻、罗瑞卿副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总理在听取汇报后,向二机部提出了在工作中“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的要求,后来我们把这三点要求简称为“三高指示”。我和刘杰谈话时,刘杰建议派一位较强的干部到二机部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以加强二机部的领导,我将他的建议向总理作了汇报,并推荐了两位同志。

汇报后,联合检查组于1963年3月分两路到二机部南、北两片的主要单位去进一步了解情况,落实问题。我先到南面,然后到兰州,拟再去青海,回头再到玉门。刚到兰州,接到先去玉门的检查组同志发给我并报总理的电报称,按苏联工程建设经验推算出来的“绝对工期”计算,玉门厂不能按“两年规划”要求如期拿出产品。我见报后,立即回电并报总理:“我即去玉门,查明情况后再报”。到玉门后,我把有关人员都请来,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玉门厂厂长周秩为首的多数同志认为苏联所谓的“绝对工期”并不绝对,是可以打破的。经过他们仔细陈述和现场实地考察,大家统一了认识,肯定“两年规划”中的要求,在玉门厂也和其他单位一样,只要认真抓紧落实,是可以如期实现的。我把这一结论立即电报了总理并专委,至此,北京、戈壁关于“两年规划”能否如期实现疑云都驱散了,剩下来的,就是按“两年规划”倒排的日期扎扎实实的工作了。回到北京,周总理找我谈话说,当初派我组织联合检查组去二机部,就已决定把我留在那里,不另选他人,我当即表示服从。聂荣臻副总理曾问我,抓原子弹,是去二机部直接抓好,还是留在国防科委好,我说,还是去二机部好,于是中央免去了我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的三个副主任兼职,任命我到二机部任副部长。

1964年6月,刘杰在草原电告不带核燃料的原子弹模拟装置试验成功,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最后一个技术问题解决了,这是北京房山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个重要贡献。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直接准备。

我国试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个航弹装置。我们决定把它放在一百米高的钢制塔架上进行试验。为了防止万一,试制了两颗弹,一是防止加工装配及零件上出现差错,二是防止科学家们经过计算指出的,在原子弹爆炸时可能出现的千分之三的过早点火。为此,1964

年8月，张爱萍和我受命，开始了紧张的试验准备工作，一是检查试验弹的制造，二是检查试验场区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多次往返于北京、青海、新疆之间。

新疆核试验基地司令部离核试验现场有四百多公里，早饭后出发，在二百公里处的食宿站甘草泉吃中饭，到试验现场正好赶上吃晚饭。我们第一次去时，在马兰的试验基地的机关已经建设好；试验现场还正在抢建，到现场都是露天搭帐篷宿食，后来有了两间石头修成的房子。戈壁滩空气特别干燥，每天要喝大量的水，那水和吃的副食品、大米都是用汽车从几百公里外的铁路线上拉去。尽管喝了很多的水，但是没有汗，也很少小便，小手帕洗后甩两甩就干了，水分都通过皮肤、空气很快就挥发掉了。我们经常于回基地司令部途中看到戈壁蜃楼，时间大多在下午傍晚。

我们在那里主要忙三件事：一是布置建筑安装爆炸原子弹的钢塔。二是建设离爆心20公里的地下指挥所和60公里外的地面指挥所以及爆心附近的直升机降落场。那时，基地司令部附近已经有了可以降落伊尔14的飞机场，后来又扩建成可以起飞、降落图16的机场了。三是遵照周总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组织安排各有关单位，包括各军兵种及民防送去原子弹爆炸效应试验的装备、生物(狗和白老鼠)及民防建筑等。

为了保证第一次核试验的成功，周总理先后发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丝不苟"的指示。张爱萍和我将试验场区的准备工作检查完毕后，又飞到西宁，乘火车去草原，即有名的金银滩中的银滩。在那里，我们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看，有的工序就陪着操作人员从头到尾看加工及部件装配，后来又看了总装配。这个单位的重要工序加工、装配、测试都是高等级的技术工人或大学毕业生，我们还检查了保密通讯网。在这里加工装配好的核弹，是装配好，检查合格后再拆开，由专车运往试验场地，再用直升机运往试验现场，在那里再装配好，检查后再吊上塔顶。

原子弹爆炸了，事先起草好的我国政府声明，却一直等到外电报道后，毛主席才批准发表

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张爱萍和我回到北京向总理和专委汇报后，总理把我留下问我，假若暂不试验行不行?我说估计没有问题，肯定可以实现核爆炸，但是为了研制氢弹，还得先爆炸原子弹，弄清我们的原子弹的梯恩梯当量才行。总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人所周知，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国是险恶的，霸权主义者扬言，中国若进行核试验，他们就要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中央专委经多次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另一个是晚试，先抓紧三线建设，待机再试。凡遇重大问题，提出两个或更多的方案，供中央决策，这是我党的例行作法。经反复考虑，从战略上进行认真分析后，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中央果断地选择了早试的方案。

中央作了早试的决定后，我们建议国庆节进行，中央没有同意，要我们在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间选择适当的时间进行。在回试验基地前的专委会上，贺龙元帅连问两声："你们能保证响吗？！"刘杰和我都没有吭声。从会议室出来，张爱萍对我说，你们这些部长怎么不吭声，我没有答话，只笑了笑。心想，我们的原子弹虽然肯定是研制成功了，但是谁能保证在试验瞬间不出现万一呢?!就是在这次会上，周总理向我们说，对这次试验要严格保密，万一不成功，让外国人知道了，风险会更大。他接着说：凡是和试验无关的人员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他的妻子，中央委员，因为她和核事业没有关系，所以他没有对她讲。回到现场后，张爱萍把总理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参试人员进行了传达，使大家深受教育。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泄露出去。那时超级大国的侦察工具还只有U—2飞机，飞到江西就被我空军拦击回去了，还曾被我国新试制出来的地空导弹打下来一架。因此，当我国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及放射物，分别经地震波和高空烟云传出去时，全世界大吃一惊。

根据试验场区气象预测，经中央批准，定于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进行试验。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完全是巧合。原子弹装配好，吊上塔顶后，张爱萍和我等大部分人员退出场地。张爱萍等返回60公里外的地面指挥所，我在离炸心20公里处的路口指挥撤退。基地司令张蕴玉、核武器研究院长李觉、副院长吴际霖、朱光亚等，在现场指挥陈长仪接好引爆装置后才撤离，李觉下到地下指挥所。他们都撤离警戒线后，我再次检查了地下指挥所并将启动钥匙交给了在那里的张震寰，然后回到地面指挥所。在地面指挥所每人带上一付黑眼镜，以防光辐射伤害眼睛。张震寰按动电钮，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北京时间下午3时整，一道巨光，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起。从巨光的强度和蘑菇云的形象中，我判断是原子爆炸，叫了一声："是核爆炸！"张爱萍拿着电话机正在和北京通话，北京也听到了我的叫声连问："是不是核爆炸?"我回头问了问王淦昌，他点了点头，我放心了。当时吴际霖、朱光亚因为走岔了路，都还没有回到指挥所。原定部署，取样飞机 已经过我们上空直插蘑菇云。北京来电话，毛主席、党中央要我们拿出确系实现了核爆炸的证据。以程

开甲为所长的二十一所的有关人员开始了紧张的分析、化验工作。两小时后张爱萍和我等六人穿上防护服，坐直升飞机到了爆心上空，只见钢架像面条样歪歪曲曲地躺在地上。

经过对各种测试结果的仔细分析，16 日 19 时 30 分张爱萍向总理再次报告，我国确实实现了核爆炸，经计算，爆炸威力在两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此时，日本已发出我国进行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他们是从地震波和高空烟云放射性含量的测量中判断出来的，高空放射性烟云出我国国境，是首先经过日本的。周总理向正在人民大会堂排练演出《东方红》的人员、观众宣布了这一消息，全场欢声雷动。

在准备爆炸原子弹期间，周总理就已起草好了我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于 10 月 14 日 19 时报给了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毛主席一直等到外电发出我国进行了原子弹爆炸消息后，才批准发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重大战略问题的非凡魄力和认真谨慎态度。我国政府在正式声明和新闻公报中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当晚，我们在试验基地会了餐，朱光亚等能喝酒的同志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晚上基地的文工团演出了张爱萍参与编导的《孔雀春雷》。

塔试成功后，我们又紧张地作准备空投试验的工作。张爱萍和我又一同指挥了两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一次是空投航弹，一次是空投能装上我们当时已研制生产出来的东风二号导弹头的小型化了的原子弹。吴法宪、成钧参加了这一工作。早在 1963 年 12 月，中央专委鉴于原子弹、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及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后出现的国际形势，决定核武器要以发展导弹核弹头为主。1964 年 6 月，刘杰从青海草原向中央报告原子弹技术过关后不久，7 月初，周总理就派他主管国防的秘书周家鼎到二机部向我传达加快进行原子弹小型化的指示。我国经过小型化了的原子弹空投试验后，1966 年 10 月 25 日，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成功地在我国国土上进行了一次带有原子弹头的导弹发射，我国自制的导弹准确地把原子弹头送到了预定地点爆炸。

我们进行原子弹试验，每次选择风向，都是让低空烟云首先经过我国上空东去，这样核爆炸烟云飘出国境时已经稀释，使外国人不会受到超剂量的污染。在核试验区附近的敦煌等地，一开始就布置了临试前将人口、牲畜等转移和必要的防护。由于地面风向经常变化，每次试验，都要两小时了解一次气象情况。第一次空投试验，飞机已挂上弹待命起飞，气象预报，场区地面风突然转向，爆炸后，烟云有可能从新疆首先进入邻邦。总理命令我们待风向变化后再试，这样我们只好让飞机挂弹待命，等了 8 天后才试。

在这 8 天中，我去看望了二机部在新疆的一个地质队。吉普车走了一天才到达那里，一路都是戈壁、沙漠，只是中午时刻在一条小河边遇到一户人家，一老一小。到那个地质队后，他们把库存的一点食品都拿出来表示欢迎之情。没有大碗就用洗脸盆装菜，做了四菜一汤，主食是一位维吾尔族的老汉做的新疆称作“馕”的大饼。我在试验现场还和张震寰一同到了孔雀河边，那是一个干枯了的河，河两旁的大树多已枯死，春夏有一点水，但是苦的。张震寰过了河，到了“不灭楼兰誓不还”的楼兰遗址，发现了许多红绸子包着的大小不一的骷髅头。我回京后专门请教过郭沫若，他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8 天无事，大家就到处捡贝壳，那里原来是海底。九院去那里参试的同志捡了个最大的完整的贝化石，我要来带回北京送给了总理，总理问我需不需要留着考古用，我说不需要，他说：“那我就处理了。”我估计大概送给毛主席了。

攻氢弹，一开始就瞄准高水平；接受专家意见，“三步曲”一举成功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周总理立即指示要加快氢弹的研制。有关氢弹，除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 1960 年就开始了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积累了一些数据外，其他一点资料也没有。二机部党组决定把该所研究热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铁塔装置

核聚变理论的黄祖洽、于敏等同志的小组集中到核武器研究院(简称九院)以邓稼先为首的在北京的理论设计部,他们在突破氢弹原理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九院理论设计部除邓稼先外还有秦元勲、周光召、周毓林等一批物理数学专家,九院副院长彭桓武也是搞理论的,长期在理论设计部和他们一起工作。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做事要先抓龙头。二机部是核事业的龙头,搞核武器九院是龙头,理论设计部又是九院的龙头,要研制氢弹,要在理论设计上首先突破才行。因此,我们首先把重点放在九院的理论设计部,也就是邓稼先、于敏他们那里。同志们形象地把这个想法、做法称为"龙头三次方"。当时,为了完成航弹的制造和小型化的设计试制,九院领导很忙,要到草原去,就把九院主管技术的副院长朱光亚留了下来和彭桓武、邓稼先等一起探索氢弹原理。

首先从哪里抓起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就要解决研制出一个什么样氢弹的问题。在开始抓氢弹时,二机部党组提出了"两手准备,保证低水平的,争取高水平"的方针。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先搞低水平的,再搞高水平的,另一种是,一开始就瞄准高水平。前者保险可以做出来,但是不能上导弹的弹头。

经过反复研究,我们一致认为,低的方案虽然唾手可得,但不仅不能装上导弹头,形成真正的威慑力量,而且高低方案之间,无内在连系,实现了低的方案后,还得从头再去攻高的方案,这样既延误时间,又浪费人力、物力、财力。高的方案虽然需要我们花点时间去探索,但它是外国人已经实现了的东西,不存在什么还没有突破的科学技术问题,只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专家们坚信,外国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出来。正在这时,周总理又向我们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氢弹研制的指示。中央和中央专委的思想,核弹就是要上导弹头,我们都是知道的。于是大家一致下定决心,为我们研制的第一颗氢弹确定了一个目标,当量要达到和超过一百万吨梯恩梯,重量不得超过一吨,简称为一一〇〇。尽管在此期间,有的同志有些担心怕"欲速不达",大家也毫不动摇。

目标定了,理论设计部的同志就从分析氢弹爆炸的内因,即热核爆炸的内部基理和外因,即热核爆炸的外部条件入手以寻找引起热核爆炸的途径。当时,我国有中国科学院自制的两台十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北京,一台在上海,上海那台运行比较稳定,用户也较少,可以给我们较多的计算时间。最近,理论部的同志告诉我,西方搞氢弹时,尚无这样高水平的计算机,这也是我国氢弹搞得快的一个原因。我们兵分两路,由于敏带了些同志到上海,这样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攻关,通过专用的保密电话,互通信息,共同探讨。开始提出的两个设想,上计算机计算后都否定了,随后北京、上海都酝酿着新的设想。于敏等在上海先走一步,按新的设想提出了具体方案,邓稼先也到了上海,他们一道把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上计算机计算。

1965 年底,我在草原,接到邓稼先从上海打去的电话,说他们的理论设计方案在计算机上已经验证可行,要求立即付诸实施。我表示同意。在征得在北京的刘杰的同意后,即请九院领导召集全院有关专家和领导的会议,讨论实施方案;会上除个别同志有疑虑外,都表示赞成,对实施中的技术难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作出了具体的产品设计方案;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是由在草原的实验部的同志解决的。为实现这一方案,决定组织三次核试验:第一次是检查热核材料性能,验证我们对热核材料性能的理论计算是否与实际符合;第二次是验证理论设计是否可行,即我们是否真正掌握了氢弹原理,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氢弹试验,只是热核材料装料少,当量小而已;第三次则是全当量的氢弹试验。为了实现这三次实验,我们调整了组织,在"221",即九院在青海的基地组织了一支跨九院下属各部门,以陈长仪为组长的精干的突击力量。

三次试验都按预定计划成功地实现了。进行这些试验时,我已经离开二机部当了周总理的联络员。1966 年 12 月 28 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晚上周总理把刘杰和我找到西华厅,还备了饭菜和酒表示祝贺。二机部造反派到了国务院西门,扬言要打倒刘杰和我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讯拿起酒杯风趣地说:"他们(指造反派)要打倒我,我引为光荣,"随即吟起了毛主席的诗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以鼓励我们要经得起"风吹浪打",随后又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我国仅仅用了两年七个月的时间就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跳到了爆炸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不但赶在法国前面爆炸了氢弹,而且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所用时间最短,水平提高最快,试验次数最少的国家,使我们的热核爆炸试验一起步就比美苏起步时高一头,再一次迈出了迎头赶上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中央以尽可能少的试验,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的要求。

若说原子弹的研制,苏联专家"哑巴和尚"多少还起了点作用的话,那么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了。原子弹设计计算中有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周光召解决的。关于氢弹,后来不少参加过氢弹研制工作的同志见到我时,都说 1965 年当机立断很重要。美国人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来华时要见我,我没有见。在他们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上,写了一句:"在他(指我)的领导下,氢弹计划取得了迅速发展。"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看见后打电话告诉

我的。这大概是九院或国防科委的一些同志讲出去的。至于他在文中引用的一些有关氢弹研究的话，都是从我应核工业部之邀，为纪念核工业部成立 30 周年登在 1985 年 11 月 3 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录的。因此，我要在这里说说我之所以能当机立断的原因：我多少懂得点科学，而且原子弹的成功，使我增强了信心，我对热核聚变原理不是一无所知，加之，在理论设计部攻氢弹期间，我又经常去他们那里，听他们讨论(那时我是坐的一辆坐了 18 年的红“奔驰”，理论设计部的同志们一见那车就知道我去了)。所以我对理论设计部的攻关情况心中有数，否则，哪能一接电话就下决心呢！还是毛泽东说得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氢弹研制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快的进展，还是应该归功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专家同志们的努力。

1965 年冬，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视察了在青海的核弹研制基地 221 和在甘肃玉门的 404 厂。去前通知我们不要搞欢迎场面，那时我在 221，两处都是我陪同视察。考虑到那里的职工长期奋战在高原、戈壁，中央领导同志去了，不让他们见见，不好交代；因此，两处都组织了夹道欢迎。为了不打扰这些单位，小平等都是在火车上吃饭；上午听汇报，下午看，然后我们送他们上火车，在火车中吃顿便饭，饭后下车，等火车开动后，我们再回去。在 221 小平还高兴地题了词，薄一波见到 221 的车间中贴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标语后说：这样的车间应该贴“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标语，我们觉得这话很对，就改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有的造反派说成是反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从 1963 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在青海 221 先后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那里海拔 3200 米，由于空气稀薄缺氧，晚上睡觉，似睡非睡；开始时没有高压锅，米饭馒头都是夹生的，为了开胃，我每次去，都要带两瓶最辣的小辣椒。可是那里的职工，包括王淦昌、朱光亚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却长年隐姓埋名地在那里披肝沥胆、艰苦奋斗：山重水复总有路，“无声”岁岁把峰攀。他们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歌颂，永远是一切有报国之志的青年学习的榜样。

事后方知时间贵。如果不是 1964 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 年底就突破了氢弹原理并紧锣密鼓地实现三步曲，“文化大革命”到来，何时可以爆炸氢弹，就很难设想了。概括这段历程，有如下几点体会：

首先是，要有预见，动手早。党中央是 1954 年下决心搞原子能的，说快，从开始到爆炸氢弹也花了 13 年时间。“人无远见，必有近忧”，搞现代化没有远见是不行的。

其次是，要把自力更生和力争外援辩证地统一起来。现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先发展起来的，搞现代化不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不抓住机遇力争外援是不行的。要迎头赶上，就要尽可能在世界已经达到的水平上起步，认真吸取外国一切对我有益的东西。但是，力争外援，决不是依赖外国。就核事业来讲，中央在力争苏联援助的同时，就下了几着要棋：一是争取了一大批留学西方的海外赤子归来；二是开展了自己的地质勘探工作，寻找我国自己的铀矿；三是建立了以钱三强为所长，集中了一批杰出的核科学技术专家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这个所在核科研和培养高级人才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四是在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原子能专业，源源不断地为这一事业输送人才。没有这些自力更生的要着，苏联断援后，我国的核弹研制是不可能进展那么快的。

第三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战略藐视，战术重视。在战略上我们是高起点，敢跳跃。原子弹研制，我们一开始就搞航弹，原子弹试验一成功，我们就研制能上导弹头的氢弹，在战术上是严肃认真周到细致一丝不苟。这些使核弹取得迅速进展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充分体现了敢闯与稳妥的统一。

第四，是要用先进的哲学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科学技术实践，也就是把先进的哲学思想和现代的先进科学技术手段结合起来，以探明物质变化的本质，掌握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五，是集中力量，大力协同。中央集中了一大批既有高度爱国主义觉悟，又有广博渊深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学者，并有效地组织了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之间的大力协同，对核事业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杰出的专家学者们和各有关部门及单位，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里作出了不同的杰出贡献。我在本文里提到的，只是其中的几位。

我国核武器事业的成功，是一曲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演出的一支威武雄壮的交响乐；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在国防现代化领域打的一场干脆、利落的歼灭战。

（责任编辑 萧 徐、洛 松）

毛泽东
巧借美机空运将帅赴前线

●牛大勇

一

1945年8月，东亚战局急转直下。美军迫近日本本土，并两次实施原子弹轰炸。苏、蒙军队也大举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政府8月14日宣布投降。

对于已同日本法西斯持续苦战了14年之久的中国来说，最后的胜利降临得如此迅速，实在有些出乎意料。无论是担负着正面战场的国民党，还是坚持着敌后抗战的共产党，此时都发现自己尚未作好迎接这一历史突变的充分准备，

国民党战场的机动力量，此时正集结于黔桂湘山区。他们刚刚在那里经受了数万日军的一次进攻狂潮，正准备实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制定的“黑色金刚石计划”，打算在8、9月间，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一次局部反攻，争取夺得一个出海口。其余的国民党军队，散布在从华南到西北的漫长战线上，等待着抵抗日军的下一次进攻。

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中共军队，自1940年末“百团大战”后，便根据形势调整了战略方针，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再进行大兵团作战。至1945年春夏，中共各个解放区的部队，分别向日伪据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规模有限。1945年6月“七大”结束，集中在延安的各解放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很多没有返回前线。

日本败降在即，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便面临着由谁受降、由谁占领的问题。辽阔富饶的东北地区，也面临苏联红军撤走时由谁接管的问题。显然，这对战后国共两党力量消长，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具有至关紧要的战略意义。

中共中央8月10日指示各解放区党的领导机关：“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顽军（指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编者）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10日至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调动部队向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进军。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8月11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联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投降问题。旋即电令国民党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一天，蒋介石又电令朱德等中共将领：“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还命令沦陷区的“地下军”和伪军：“须切实负责，维持治安”，“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收编”。

鉴于蒋介石企图独吞胜利果实的蛮横态度，毛泽东于13日向聚集在延安的干部们阐明了时局和方针。他说：“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下旬，当时被称为日伪顽合流的形势逐步形成。23日何应钦在芷江把国民党政府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交给前来洽降的日军使节今井武夫，其中特别要求冈村命令所属各部：“应立即在各自之原驻地及指定地点待命，非蒋委员长或本司令指定之部队指挥官，不得解除日本陆海空军之投降武装及交出占领地区以及分让物资”。日方当即提出：“中共军想以武力强行解除日军武装。为了自卫，日军决定对此采取断然处置”。国民党方面答复：“除受命于何应钦总司令者外，可一律视为土匪，日本军对他们即使采取自卫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经过如此一番“洽降”，中共的对日受降权利，便被完全排除了。

二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在华的一举一动，都将对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产生微妙的影响，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是大力支持和援 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但其政策的另一界限是："美国部队和物资不得用于对抗中国人，除非用作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1945 年 8 月 10 日，在日本即将败降的新形势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厘定了在华行动方针。它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但将继续支持"中央政府军重新占领现为日本所占中国战区的一切地区"；"太平洋战区之美军正准备控制中国战区的关键口岸和交通要地"。训令表明："美军将把他们解放的中国要地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所委派的机构和部队"。它还命令魏德迈："帮助中央政府迅速运送中国中央政府军到中国的战略要地去"。同时又指示："同中央政府之外的中国军队和机构打交道，将严格限于军事形势之需要"。

1945 年 8 月 25 日晨，赶赴前线的部分中共将领在延安东关飞机场同送行人员合影

后排：左一陈再道，左二杨得志，左三陈锡联，左六邓华，左八林彪，左十江华

前排：左三徐特立，左五罗瑞卿，左六陈赓；右二叶剑英，右七滕代远，右八康生

美国决策人似乎认为，支持国民党军抢占要地，与不支持它打内战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尽管国共双方对此都持相反的看法。不过，美国军方尚未绝对排除在"军事形势之需要"的情况下，同中共进行某种有限度的接触与合作的可能性。后来的事态表明，中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可能性。

魏德迈深知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但他坚信：援助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地，是自己当前的崇高使命，而运用美国的飞机、舰船、汽车抢运国民党军，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唯一可行办法"，即使这意味着被美国运到各要地的国民党军将士，将向已包围或占领了那些地点的中共军队开战，也在所不惜。他迅速调集美国空军第十和十四航空队的所有可供使用的运输机，从 8 月 26 日开始，先后向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中心城市运送国民党军先遣人员。9 月 5 日、6 日开始将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九十四军分别从芷江、柳州空运到南京、上海。10 月中旬，又将九十二、九十四军分别从汉口、上海空运到北平、天津。美国海军两师陆战队 9 月 30 日在大沽登陆，进占天津、北平、秦皇岛。10 月 10 日又有美军在青岛登陆。此后，美国源源不断地把国民党军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同那里的中共武装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

暂时看来，蒋介石在美日的积极配合下，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抢到手了。中共被迫放弃了夺取这些大城市的计划。魏德迈似乎有理由夸耀，这次援蒋大空运"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但他又自称在执行援助中国受降的任务时，"也许是无意中为中央政府打败共产党武装力量提供了直接的美国援助"。这话则未免有 些遮遮掩掩。如前所述，他完全是在意识到这样的美国政策将给中共造成什么危害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的。然而，如果说他手下的美国军事人员，"也许是无意中为共产党武装力量打败国民党军提供了一次直接的援助"，此说或许可以得到赞成。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无意中"的援助，才使成千上万乘坐美国运输工具赶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将士，最终变成悲剧角色。而魏德迈引以自豪的那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也被注定成为徒劳之举。

三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大而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对美外交保持了适当的灵活性，因此得以机敏地抓

1945年8月25日晨，赶赴前线的部分中共将领起飞前在延安东关机场美军飞机前，同送行人员合影。

后排左起：杨尚昆、陈毅、邓小平、刘伯承、滕代远、萧劲光、陈赓等

前排左一：杨得志，左三至左五：蔡树藩、聂荣臻、李富春

往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偶然机遇。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早在4月2日即于华盛顿宣布，美国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中国的任何军阀或武装政党”。消息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认为：“美国政策已决以全力扶蒋，不给我以援助，但因怕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 中央决定公开批评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以期促使它有所改正。

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提出“区别对待”的对美策略：“我们第一要把 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这里提出的第二点区别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尽管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内连续撰文，严厉抨击美国政策，但时局的突变，使他感到有必要保持对美政策的灵活性，以便使中共有机会获得某种战略利益。

中共中央8月11日决定：根据国际国内新动向，考虑恢复搁置已久的国共谈判，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取缓和态度，继续救护美国被难人员，准备配合美军登陆，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中央也提醒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对美国在华充当斯科比(General Scobie)的可能性要保持高度警惕。

日本投降后，中共一刻也未放松应付内战的军事准备，但同时认为，如果能经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实行民主改革，那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即使谈判破裂，或边打边谈，或虽达成协议仍不能兑现，也可以使 中共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军事上赢得时间。

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3日议决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毛泽东不想立即动身去重庆的原因之一，是其立足于“打”的必要准备工作的关键一环尚未解决，因而放心不下。毛泽东认为，在中共即将向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谈判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中共军队是最中心的一条。要使对方接受这些条件，可能要有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甚至可能要打疼对方，迫其承认这些条件。所以中共必须在对手面前，摆出一个内战不那么好打的架势，才能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的地位。

毛泽东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使自己的部队迅速完成从分散的游击状态到大兵团运动作战的转变，实现猛烈扩大解放区，迎击来犯的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战略目标，目前最迫切最关键的一步，是要以最快的方式，把滞留在延安的各路将领抢先送回前线。这位手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共产党决策人，在此困难条件下，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决定将这一事关全局的重任，借助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之手去实现。他派一直负责同美国军方打交道 的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面办理此事。

经验丰富的叶剑英在向美军观察组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之后，顺便以轻松的语气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的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则略而未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探问。

早在1944年末，十八集团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凝镇修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转运被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人员。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附近，美国飞机以前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之间。因此，美军观察组把叶剑英的这个提议，当作是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甚至不认为还需要再请示一下更了解此时美国官方政策的上级部门。

8月25日清晨，刚刚接到搭乘飞机赶赴前线的通知的20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据40年后若干当事者的回忆透露，这20人的姓名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任何熟知中共党史的人，看到这个名单都会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干部”而是当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

这些将帅们当时都奉命要对此事严格保密，谁也不许带随员和家属。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飞机者都带上降落伞。还有一些中共领导人前来送行。朱德的秘书黄华看清将要共乘一架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后，不禁也吃了一惊。他担心飞行中万一发生情况，这些不懂英语的将帅无法同美国驾驶员通话，将非常危险，便主动要求随行担任翻译。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黄华也加入了这批冒险者的行列。

人们在机场上合影留念后，开始告别、登机。这是一架破旧的军用运输机，舱门关不紧，两只螺旋桨在启动时还要靠人来推动，机舱矮小而呈弧形，人们在两边的铁座上坐下后，直不起腰、抬不起头。这些都给乘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时许，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送行者和乘客们的心一起带上变幻莫测的万里云空。这批将帅大多数生平第一次坐飞机。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以及肩负的重任，都令他们神色凝重，心情紧张。延安统帅部里同样充满紧张和担忧的气氛。谁都明白，如果万一这架飞机在飞越日军封锁线时被击落，或因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事，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叶剑英坐立不安，喃喃自语：“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可别让这架飞机出事。那上边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啊！”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讯传来后，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立即转报毛泽东。在此之后，毛泽东决定和周恩来同赴重庆。

飞机在长凝机场着陆后，诸将帅稍事休息，便分别赶赴各自预定之战区。就这样，美军飞行员一次“漫不经心”的飞行，仅用几个小时，便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输送任务。其时间比魏德迈开始空运国民党军先遣人员去“受降”，还要早一天。

四

了解这批将帅在随即到来的国共决战、朝鲜战争和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人，自能理解这次空运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这里只对其最直接最近期的影响略加评析。

中共晋冀鲁豫战略区处于华北战略要冲，扼守着国民党军北进的门户，威胁着津浦、平汉、正太、同蒲四条干线，是“四战之地”。美国飞机给中共这个战略区运来的几乎是一个完整的统帅部。邓小平是该区党的书记兼军队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薄一波是副书记兼副政委，滕代远是副司令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们8月25日飞抵山西黎城，27日便赶到河北涉县赤岸村的司令部开会，拟定了上党、平汉两战役计划。随即将分散游击的各部队整编为四个野战纵队，由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分任各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也在随后组建的另一支主力纵队中指挥作战。经过紧张而短促的准备，他们即于9月上旬和10月中旬连续发起上党、平汉战役，歼灭北进的国民党军六万余人。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在一系列战役胜利之后，“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中原，率先揭开中共战略反攻的序幕。他们和陈

1945年9月11日，聂荣臻同志飞抵灵丘后同美军飞行员合影。左七萧克、左八聂荣臻、左十刘澜涛

毅的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决战淮海，横渡长江，旌旗所向，云、贵、川、藏。杨得志所部则成为攻略华北、西北的主力之一。

被美机运到前方的另一批将帅，在贯彻中共中央“全力争取东北”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同样扮演了令人注目的角色。林彪、萧劲光、邓华、李天佑、聂鹤亭、江华等人，成为中共东北战略区的主帅和主将。他们10月下旬赶到东北后，对于及时调整那里的原定战略方针，夺取战争胜利，不同程度地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他们的大军依次席卷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军锋直下海南岛。

陈毅任中共华东战略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傅秋涛是他麾下的战将。他们在赶赴山东的途中，及时组织了对津浦铁路的彻底破坏，使国民党军长期不能利用这段铁路发挥自己的机械化优势。陈毅更重要的作用，是以红军创建人之一的老资格，协调指挥华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原本互不统属的部队，于10月至11月间配合作战，打赢了津浦路阻击战，有效地阻滞了国民党军沿这条铁路开向华北和东北，掩护了山东中共军队进取东北的战略调动，并为华东中共军队今后的内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华东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也是被歼人数最多的地区。

顺便指出，中共在此历史关头，巧借美军之手获取如此重要的战略服务，绝非仅此一次。大约就在同一天或9月9日，另一架C－46型美军飞机，把中共晋察冀战略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某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又一批将帅，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这个飞抵前线的战区统帅部，立即采取行动，指挥所部在两个月内解放中小城镇六十余座，将主力整编为九个纵队二十余万人，地方部队编为五个军区十一万人，还派出一万多部队率先奔赴东北，在那时很快发展成十万之众。这批将帅对华北、东北的战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邓华、杨得志、陈赓、宋时轮、王近山、郑维山等人，曾经分别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司令员、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等要职，是对美作战的主将。聂荣臻在此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在指导战争的中国最高统帅部负枢要重任。

五

当然，1945年8月25日那天，美军观察组人员不可能预料这次偶然的飞行，对未来的中国命运和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同样，任何历史学家至今也很难断言，万一那天叶剑英（也代表着毛泽东等中共决策人）的那种可怕的担心，不幸而成为现实，一部现代中国历史，又将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当时面临的紧急形势来看，毛泽东等人认为，即使冒这样大的风险，也是非常值得的。确实，让这么多高级将帅，共乘一架宿敌之友飞机，实为世所仅见的大胆之举；而其所获得的战略利益，也是令人无法估量的。

从延安到黎城，相距八百多公里。其间要经过黄土高原、黄河天险、晋南山地，还要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人们在很多地方只能绕行崎岖小路。一年多以前，杨得志率部从稍远的濮阳来延安，走了七十多天。江华从更远的山东滨海地区来延安，走了半年。依此推算，从延安到黎城，约需走两个月。中共将领们固然可以在某些地段骑马代步，但行进的速度仍要由步行护送的普通士兵决定。这就是说，除去长途跋涉积累的疲劳，和其他难以估量的影响行程的因素不计之外，若不借助美军的飞机，中共华北、华东、东北三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将领，要迟两个月才能赶到自己的阵地。谁都明白，在日本投降、国共争作战略展开之际，这两个月的延误意味着什么。

应该承认，如果这些富有经验和权威，并由毛主席、党中央面授机宜的将帅，未能及时赶到前线实施指挥，很多重大部署是不能很好贯彻落实的，一些关键性的转变甚至难以发生。这次空运，帮助这些主要将帅先敌一步到达战区，遵照中央指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建设指挥机构，先敌展开，取得选择和预备战场的主动权。许多重要战略措施得以顺利实行，初步完成了从分散游击向集团运动作战的战略转变。先机之利，惠莫大焉。

笔者并不认为某一次空运便 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不认为中共在这个历史关头，若不借用美国飞机，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大决战的最后胜利。笔者只是想指出，中共中央这次对美军工作人员的成功借用，构成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一环。这次空运的历史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对美国来说，也许它从来没有机会，能以如此之小的动作，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此事若在当时甚至以后许多年内被披露，都会给美国政坛和美蒋关系带来强烈的震撼。

（主要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聂荣臻、萧劲光、杨得志、陈再道、江华、郑维山等同志的回忆录和雷英夫等同志的口述史料。）

（责任编辑　萧徐）

百天战斗：北平《解放》报从创办到被查封

●于光远　张沛　孙政

1946年2月22日清晨，一张报头为毛泽东手迹的“解放”两个字的报纸，在北平街头出现。这是一张由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从各解放区调集干部、就近由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委员叶剑英领导的报纸，是继《新华日报》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第二张党报。它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百天，但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今年是这张报纸创办五十周年纪念。由于现在知道这一段历史的人不多了，我们作为这张报纸当时的工作人员，感到有责任向今天的读者介绍自己亲知的情况和切身感受。

创刊

创办这张报纸的决定，是1945年底由党中央在延安作出的。办这张报纸的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潮流的压力，以及他的军队还龟缩在“大后方”，一时难以调动出来发动全面内战，于是一面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快运兵，一面作出姿态表示愿意停战，并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面组织“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战的实施。虽然国民党一直到1945年12月31日才正式答复中共方面提出的无条件停止内战办法的书面文件，停战命令直到1946年1月10日才颁发。但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事实上在1945年12月中旬就开始了。党中央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时机，在1945年12月决定在北平再办一张党报。

1946年1月初，李克农（叶剑英同志当时的助手）对最早到北平筹办这张报纸的于光远有一次谈话。其内容大略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我们党的《新华日报》也要跟着搬去南京。日本投降后我们党中央不能一直耽在延安，也要搬出来，很可能搬到北平来。北平城外四周围都是解放区，城里我们党的力量也很强，党中央搬来后，北平就会成为以我们党为主的一个全国性政治中心。这时延安《解放日报》就搬到北平来发行。你们来办这张报纸就是为延安《解放日报》搬来作准备。因此，这张报纸也不用另外起新的名称，就叫《解放日报》，报头也就用延安解放日报的那几个毛主席写的字。

党中央办报决定作出后，就很快从延安、张家口、重庆、山东、东北各地调集熟练的新闻工作干部到北平。由于北平四周是晋察冀解放区，晋察冀中央局还专设北平城市工作部领导北平市委员会，中央局把这张报纸视作自己的报纸一样来关心和出版。第一期报纸就是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阮慕韩家的院子里编成，在地下党办的立华印刷厂印刷由地下党领导的“联合派报社”等处组织许多报童发行的。

这张报纸创刊的这一天，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吆喝：“请看解放！”“解放！”“解放！”买报的人也大喊“我要解放！”“我要解放！”卖报和买报的都故意省略“报”这个字，一语双关。报纸一出就抢购一空。

报纸一创刊，就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一个国民党要员说，这张报纸的发行，等于共产党在北平城里驻扎了一师军队，这个话倒很有见地。

头四十天的工作

三道栅栏的房子远远不够用。后来又从一个银行界人士那里用三千银元买到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的院子，作为编辑部和经理部的办公地点，三道栅栏41号作为发行部。

报纸和新华分社的主要负责人钱俊瑞等同志是三月初到任的。钱俊瑞任总编辑兼新华分社社长，姜君辰任副总编辑，杨赓任分社副社长、报

北平国民党当局查封了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后，叶剑英向全体同志讲了话，并同大家合影。自左至右为杨赓、马乃庶、钱俊瑞、姜君辰四位同志

社采编部主任，郑季翘任编辑部主任，于光远任研究室主任。确定这5个人为报社的编委，全部工作人员达到八十余人。

从1946年2月22日到4月2日，不多不少，正好40天。在这40天中，《解放》报上关于国内外政治形势、国民党和我们党的动向完全采用新华社播发的稿件，它们分别刊在要闻版和解放区之页上，使读者识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澄清他们制造的关于解放区的谣言。当地的消息由采访部提供。报上还经常登出蔡若虹画的尖锐的漫画。所有这些深受北平居民的欢迎，使这张报纸一下子在读者中赢得很高的信誉，在北平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出版物，发行量逐期稳步上升。

《解放》报和新华分社的影响从一些小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报社和分社的工作人员在胸前都佩有徽章。报社人员的徽章上是"解放"两字（新华社的徽章是另外一个样子），戴着它上街，群众经常用一种友好、钦佩的眼光注视着它。

报社有专门接待来访者的人员，大家经常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有趣的故事。一次来了3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登记本上写的是"赤子"、"革命"、"解放"三个名字。接待同志问："这是你们新起的名字吧？"答："没错，名字是假的，心可是真的。""如有事，请到屋里去好吗？"答："不用进屋，我们其实没有事，就是想来解放区看看。""哪个解放区？""这儿就是！《解放》报社就是解放区。"最后他们才说出他们来的实际目的是，不愿在国统区上学，想到我们的解放区去。

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解放》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在北平居民中生根了。

"四·三事件"

1946年4月3日凌晨，住在方壶斋九号的同志们还在梦中，突然被一阵喧嚣声吵醒。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派来军警和便衣特务等二百余人在半夜就包围了方壶斋九号，以两挺机关枪对准大门，如临大敌。

那伙人进楼后，首先到楼下的那间大房子，大声叫喊，让睡在床上的同志"起来"，说是检查户口，检查违禁品，把床上床下、桌上、箱子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你们这是干什么？"有同志抗议，"你们自己知道！"一个警察对警官说，"没有那种家伙！"一听这话，就知道他们想查出一、两支手枪来，那样就可以大做文章了。当一部分军警在那个大房里搜查时，另一部分人就上了楼。军警们窜上二楼立刻将电话看住，叫嚷着"查户口"，顺势闯入钱俊瑞的办公室乱翻，并声称未报户口，要将人带走。钱俊瑞拍着桌子怒斥军警的暴行。他在特务、警察的包围下怒气冲冲地走到报纸编辑部，下夜班不久又被军警吵醒的郑季翘、余宗彦、张蓓、祖田工和王炯正在屋里同军警进行着斗争，老钱大声对大家

说："我到警察局去交涉，编辑无论谁都不许自由行动！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外出！"大家明白老钱的意思，便对军警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老钱同马乃庶下楼后，军警立刻开始捕人，他们人多，几个对一个，将姜君辰、郑季翘、张沛、王炯拖下楼去，接着把楼上的同志一个一个从楼上架下楼梯，被抓的人一方面表示愤怒一方面使劲抵抗。当时没有被抓的人也齐声抗议。国民党军警大概事先没有作好会遇到我们坚决抵抗的准备，来人虽多，但在大家的抵抗下，他们还是感到人手不够。

钱俊瑞下楼后，从容地对大家说："这完全是破坏和平、破坏民主的非法行动，我就要到警察局抗议。你们要等在这里坚持职守，不要随便离开。"钱俊瑞这几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许他们把我们的人抓走，要我们抵抗。讲完，他带上秘书马乃庶离开房间，许多军警跟着他们两个人。

钱走后，军警接着就用三个人架走一个人的办法把人抓走。一共有 20 多人被绑架到和平门外梁家园警察外二分局。

4 月 3 日，五点多钟天已大亮。聚集在楼下与看守的军警相峙的同志，看到在这里等着他们采取下一个行动不是办法，一个喊声"到大门外去"，房里的人就跑了出去。除了这个房间里的人外，还把别处所有的人叫了出去。大家走出大门，一片抗议声、口号声，吸引了许多居民和过路人围观。本来国民党计划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干完，可是现在的斗争现场从院内、楼内转到街上，他们再也不能偷偷地干这件事了。

反动派在方壶斋动手的同时，国民党军警宪特 30 多人也以清查户口为名，闯进了西四三道栅栏 41 号《解放》报发行部。军警们一边翻箱倒柜地搜查，同时将经理部负责人马健民以及另外 11 个工作人员捆绑起来带往警察内四分局，把他们投入拘留室并加戴了手铐。上午 10 时左右，中共代表团宋时轮少将等同志赶赴内四分局慰问我被捕的 12 位同志，并宣读了我代表团的慰问信，鼓励他们"要和法西斯斗争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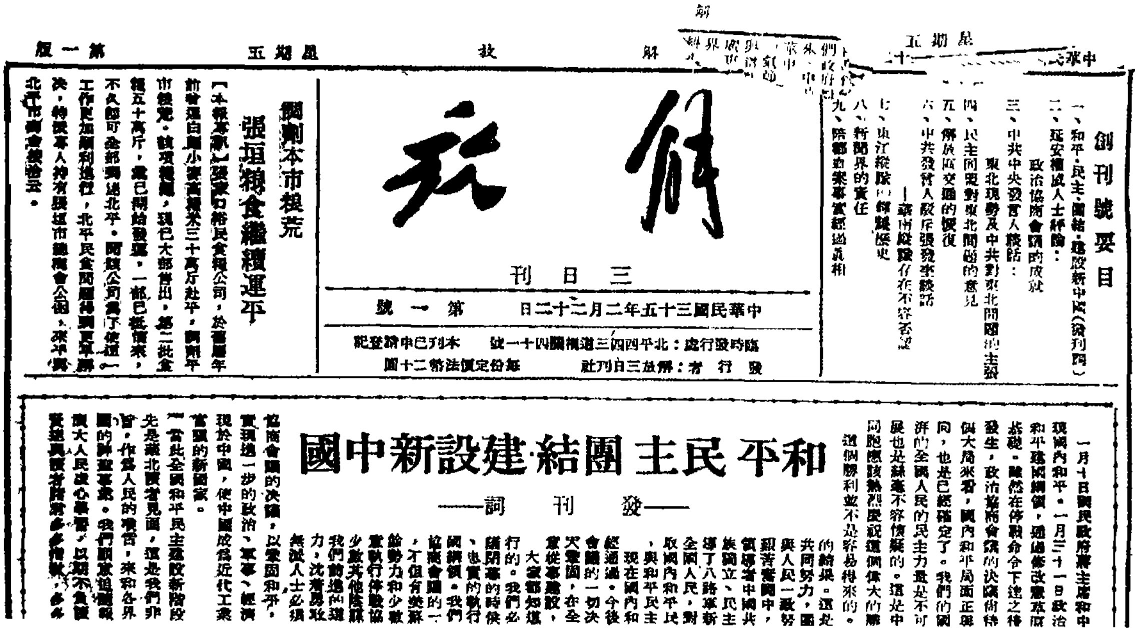
在北平警察外二分局，以钱俊瑞为首的报社、分社的 29 位同志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向国民党当局展开坚决的斗争。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凶道歉，立即释放被捕的人员，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大家还分批值班轮流休息，以保证旺盛的精力坚持斗争。对警方，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着重怒斥其罪行，另一些人则向其下层警员分别进行说理和分化瓦解工作。杨赓同志以不息地怒斥、使警方颇为慌乱的行动，至今使人留有深刻印象；钱俊瑞同志在狱中奋笔写下《我们被捕了》，揭露国民党的这一暴行。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派出了李聚奎、陈雷等同志赶赴二分局，慰问被捕的同志们。

国民党北平当局自知已处于极端被动之中，于是在外二分局内悄悄撤去了看守的岗哨，大敞其门，妄图不加阻拦任我们被捕的同志返回报社了事。这时，我们已不是要求"立即释放"，而着重要求他们必须"追究责任、惩凶道歉和保证今后安全"，否则我们将不会离开警察局。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只好在 4 月 4 日晨将被捕人员分别从外二、内四分局移送到前门的警察总局。当 29 位被捕的同志乘卡车一出和平门外梁家园胡同时，便高呼口号。汽车路经和平门外大街、西交民巷。同志们在车上高呼"坚持正义"、"保障人身自由"、"取消特务机关"、"共产党万岁"等激昂的口号。当时正是早晨上班时间，行人都伫足而视，他们有幸看到了北平有史以来共产党人的首次游行。

在方壶斋没有被捕的人还有 20 多人，五个编委中于光远没有被捕，他和大家一起下了决心：报纸照常出。反动派想破坏我们的报纸，抓走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的报纸照样能出版。4 月 4 日中午，报社人员分头到邻居家访问，向他们慰问，同时了解他们的反映。报纸这一期还发表了一则《特务行凶，居民受惊，本社人员分访慰问》的新闻报道。

4 月 5 日，北平《解放》报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发动"四·三事件"使报纸夭折的阴谋，准时出版了。一版头条新闻详细报道"四·三事件"的经过，另外，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我们的控诉和抗议》、钱俊瑞在囚室中写的短文《我们被捕了》，并且发表了新华社驳斥中央社对"四·三事件"造谣、歪曲的文章。在第四版，刊载了读者的慰问信和军警特务自创刊以来对北平《解放》报的破坏和迫害情况。为了使这期重要的报纸能到达读者手中，留社的编辑、行政人员分头深入到发行第一线，护送这期报纸到达读者手中。

"四·三事件"的阴谋破产，使国民党反动派陷于全国进步力量的声讨之中。4 月 4 日下午，滕代远将军除亲往国民党的北平行辕、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和北平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还代表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国民党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谴责。次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发动"四·三事件"是反动派向人民实行进攻的步骤之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仅发表声明，而且在政协会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全国众多的进步新闻、文化单位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反动派的这一暴行。国民党当局在极端被动中，盼着早早了结此事。在 4 月 4 日下午，中共代表团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三位同志亲往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和警察总局交涉，市长熊斌和警察局局长陈焯对我方要求也只好加


解放　三日刊
第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臨時發行處：北平西四三道柵欄四十一號　本刊已申請登記
發行者：解放三日刊社　每份定價法幣二十圓

創刊號要目
一、和平·民主·團結·建設新中國（發刊詞）
二、延安權威人士評論：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就
三、中共中央發言人談話：東北現勢及中共對東北問題的主張
四、民主同盟對東北問題的意見
五、解放區交通的恢復
六、中共發言人駁斥張發奎談話——華南縱隊存在不容否認
七、東江縱隊的鬥爭歷史
八、新聞界的責任
九、陪都血案事實經過真相

調劑本市糧荒
張垣糧食繼續運平

和平民主團結·建設新中國
——發刊詞——

1946年2月22日在北平创刊的《解放》报

以接受。

陈焯对被捕的同志们说："各位先生，误会了，诸位这次受了委曲，对不起，向各位先生道歉了。"叶剑英接着说："陈焯局长向大家道歉了，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大家回去为和平民主继续努力工作吧。现在上车！"

被捕的41位同志分乘三辆卡车，在叶剑英等同志所乘数辆小汽车的护送下，离开警察总局。李克农事先已嘱咐于光远购置了许多鞭炮。于是同志们燃放着鞭炮，高呼着口号，途经天安门、长安街，并绕道繁华的王府井，胜利回到南河沿翠明庄中共代表团驻地。

代表团的同志们早已站在翠明庄门外相迎，此时，南河沿北口已经人山人海，钱俊瑞一下车便被人们抬了起来，他在人们欢呼声中向围拢来的群众作了简短演说，然后大家一起到翠明庄大饭厅内开会庆祝胜利。叶剑英在会上讲话，他说，在这场"四·三事件"中，我们取得了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胜利。他号召大家在新闻岗位上继续坚决、勇敢、谨慎地工作和斗争。大家在返回方壶斋九号时，又受到聚集在报社门口许多群众的欢迎。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门前，胜利返回的同志和聚拢的群众燃放鞭炮庆祝胜利。

"四·三事件"斗争的彻底胜利，使北平《解放》报的声名大振，发行量达到5万多份，把国民党的各大报纸远远甩在后边。

"四·三事件"后的六十天

"四·三事件"后的六十天，是北平《解放》报将斗争推向一个高潮的六十天。当时，时局和报纸的处境更加险恶：蒋介石已将百万军队部署到了内战前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将政协决议和四项诺言全部推翻，并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伪国大，为发动全面内战作最后的舆论准备。

"四·三事件"的彻底胜利，更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他们除直接对报社加强捣乱和监视外，还策划了封闭北平《解放》报的阴谋。以周恩来为首的重庆代表团4月14日致函国民党代表团揭露这一阴谋，并申明北平《解放》报将继续出版，希转致北平当局停止查封活动。北平《解放》报便是在这种日益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向平津和华北人民传达着党的声音。

首先是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报纸在"四·三事件"胜利后的第16期上，以整版篇幅大标题全文刊登了延安《解放日报》社论《驳蒋介石》，驳斥他在国民党参政会上的谎话，揭露了他镇压人民和扩大内战战火的凶险面目。

与此相配合，报纸还继续以醒目标题和报道向国人揭示："国民党调动大军一百万，新的全国内战一触即发"、"国民党军队密集江北，华中形势严重"、"国民党当局完成围歼中原解放区准备，中原大规模内

战即将爆发”……，用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是发动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

北平《解放》报在一系列关于东北战况的报道中，着重强调了我军坚决自卫的立场，突出报道了我军在鞍山、本溪、四平等地“坚强自卫重创猛犯之敌”的消息。还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周恩来将军声明，中共在东北严正自卫立场”，申明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这时，报纸已不再单纯报道国民党军违令进犯，而更加突出报道我军坚决自卫重创敌军的情况。

北平伪国大代表的选举，是国民党反动派导演的一幕欺骗北平人民的丑剧。北平伪国大代表候选人，全是国民党当局指定，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皆被排斥在外，这立即引起北平各界的强烈抗议。北平市文化教育界6000多人于4月21日下午在音乐堂集会，由陈瑾昆、江绍原两位教授主讲有关国大代表选举问题，大会立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两教授被打伤，一些人遭逮捕，《解放》报记者丁九也被石块击中。北平《解放》报立即用一整版篇幅以《校场口事件重演北平，中山公园发生血案》的突出标题作了详细报道，及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这一罪行。报社还派记者到陈瑾昆先生家代表钱俊瑞、姜君辰同志进行慰问，并作了采访。之后《解放》报发表了《抗议中山公园事件》的社论，还以新闻集纳的形式，揭露了平津所谓国大代表选举的种种丑态。北平《解放》报接连几天以深入、集中的报道，在平津地区掀起了一个揭露国民党黑暗内幕的高潮。

4月5日，北平市立中学教职员联合会与北平市立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国民党当局按规定增加薪金，宣布全体员工从4日起实行“请假”，等到增薪实现之后方能复课，并发表宣言，要求各界支援。北平《解放》报当即在4月8日增刊两版进行了报道，又于11日发表题为《声援北平市中小学教员》的社论，接着在14日发表了《当局缺乏诚恳，中小学教职员罢课事态扩大》的消息，进行了及时、有力的支援。国民党当局被迫于17日表示让步，罢教斗争获得初步胜利。

为配合文字报道，蔡若虹在这期间赶绘出多幅辛辣的漫画，对国民党当局种种黑幕和暴行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而国民党特务多次打电话和写信对蔡若虹进行恐吓，这足以证明漫画象匕首一般，正好刺中了反动派的要害之处。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发动“四·三事件”迫使《解放》报夭折的阴谋失败后，便加强了对《解放》报发行工作 的破坏，以限制报纸影响的扩大。我们发行部的一项主要对策，便是把报童们培养成一支得力的发行队伍。每天一早，发行部的同志将等候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门外的报童们请进院中。报童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靠卖报贴补困难的生活。吃不饱的，发行部便免费供给他们一些吃食，钱不够的，发行部先免费让他们拿报去卖。发行部人员还经常给他们讲抗日故事和解放区情况，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对社会上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这些报童渐渐成为发行北平《解放》报的“街头游击队”，他们把我们发行部人员当作有力的后盾，向特务们展开机智的斗争。

特务破坏发行的手法，主要是抢报纸、打报童。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报童们便抱住特务不放，大哭大叫，引起路人们的围观和责骂，围观者斥责特务们“打不了共产党却打孩子”，特务们在群众指责下只好慌忙溜走。

北平《解放》报初创后，便感到版面容量不够，就用不定期增刊的灵活方式以加大容量，因此每逢节日或发生重大事件以及发表篇幅较长的重要社论，则随时出增刊增加版面。1946年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新闻斗争空前激烈，北平《解放》报的增刊便数日一见，或4版或8版，容量足以超出国民党的大报《华北日报》。

随着斗争的发展，三日刊的形式已难满足需要，自第27期起便改为双日刊，同时，积极作出版日报的准备。

随着北平《解放》报影响的日益扩大，更加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和不安。蒋介石于1946年4月初在国民党参政会上便 大发脾气：“都是你们不为我争气，让共产党在北平发表文章，指着鼻子骂我！”接着蒋介石在他忙于部署全面内战之际，于5月下旬飞往长春途经北平时，便向北平市当局下了“言论荒谬肆无忌惮者即查封”的手令，命令北平当局立即查封北平《解放》报。

查封—抗议—撤回解放区

山雨欲来风满楼。进入5月之后，蒋介石要对《解放》报和新华分社下毒手的时间看来越来越近。报社已经作了应变准备。如印发新华社新闻稿的工作已经从方壶斋转移到翠明庄。5月29日下午，执行部中共代表团说有紧急的事要我们立刻派人去那里，代表团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刚刚接到延安的电报，电报里说蒋介石决定今天晚上要查封《解放》报。并且说，延安来的电报里，毛主席表扬了《解放》报的同志在“四·三事件”中表现出的威武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同时指示，现在形势同那时不一样了，对于这次查封不能像“四·三事件”那样硬斗，要封就让他们封，要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到代表团去的同志回来

说，李克农传达党中央这个指示后，幽默地说：“这回斗也没有用了就按计划安全地撤退吧！”我们把这个指示传达到报社的每一个人，要大家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当天夜里，大家等待着这件事的到来。入睡之后，也特别注意院内动静，结果一夜平静。在清晨起床时，大家以为反动派改变了行动的日期。可是到了 30 日早晨，大门口果然贴着一张查封的布告。两扇大门上还贴有一张封条，布告和封条上的时间都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十九日封”。一张是封报社的，一张是封新华分社的。封条这种贴法也真特别，封条总要封什么东西，而这两张封条像对联那样贴在两扇大门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封住，大门照样开关，人员照样出入。看来，经过“四·三事件”的教训，他们不敢惊动我们，怕惹出麻烦，半夜偷偷贴完就走了。

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抗议。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陆定一代表党中央抗议，叶剑英发表长篇谈话。5 月 30 日这一天上午，叶剑英带领了好几位在军调部工作的负责同志来到了报社。叶剑英先看了门口的布告和封条，听了我们简单的汇报，就在报社打电话给北平市长熊斌说：“啊哟，你要打仗吗？我们的部队就在西山，打个电话就过来了。”

“老熊，你怎么不知道？署有你的大名的查封布告就贴在我们的门口。怎么样？我揭下来给你送去？”

“老兄的难处可以理解，那就不揭了，我照张相给你送去！”

这时候我们把那块早就制作好了的“北平解放日报社”招牌抬出来挂在大门口。大家簇拥着叶剑英走到大门口拍照。

拍完照立即去冲洗送到熊斌那里去。

报社被封闭后，工作人员分为三个地区撤退，一部分回延安，一部分回山东，大部分（共有 30 多人）去离北平最近已经解放的“大城市”张家口。

去张家口的人由罗瑞卿护送。先在西直门坐火车经南口到康庄，康庄是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分界线。双方都有用铁丝网做成的关卡。要过的第一道卡子是国民党的。隔开四、五十米就是我们的卡子，在那里有不少我们的军队。报社分社的同志们在快过这第一道国民党设的卡子时，罗瑞卿要他们站在自己的身边，他自己就坐在路边的一个土堆上，派一个少校军衔的副官前去交涉过卡的事。谈了十几分钟，对方坚持要一个一个人接受检查，不肯让步。这时罗瑞卿突然从土堆上站了起来，对我们说了一声“跟我走”，大家就拿着手提行李跟着他走到卡子前面。他对坚持要检查的那个国民党少校军官说：“怎么样，要检查我吗？谁叫你们干的呀？”那时罗瑞卿穿着将军衔的军服，那个少校军官不得不端端正正地站着。罗瑞继续训斥“这里是哪个部队？没有教养！连我都要检查？你们的师长是谁？我找他算账！”他一面说时一面使眼色暗示我们过卡。那个军官不敢再拦。罗瑞卿看大家已经过完了，自己也过卡，边走边说：“现在不是还没有打仗吗？告诉你们的部队要讲团结，不要自己打自己人嘛！”那个少校一直端端正正地站着，还大声地回答“是”。来到我方关卡时，接我们的警卫人员，立即让同志们过关，帮大家装好东西，督促大家上车。罗瑞卿走到车前小声问都上来了吗？说了一声“快开车”。车子开动了，大家向罗瑞卿挥手。离开这个地方，到了我们的解放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大家马上活跃起来，在车上说说笑笑。四、五个小时之后到了张家口。

报社记者仓夷是《晋察冀日报》社来的，仓夷是一个很让大家 喜欢的小伙子。他生长在新加坡的一个贫寒家庭，在高中时接受了新思想，抗战爆发后不顾一切离开了家，告别了正在热恋中的未婚妻，千里迢迢回到祖国直奔延安，后来到《晋察冀日报》当了记者。他回到张家口后，1946 年 8 月 8 日再次到北平完成了对“安平事件”的采访任务返回张家口时，所乘的飞机绕往大同，遭到大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绑架，反动派谎称把他押送到解放区。在离开大同机场到解放区的路上，反动派就把他杀害了。这是我们在北平办《解放》报唯独一个牺牲的同志。

（责任编辑　林跃）

邮 购 启 事

敬告各地读者，如果当地邮局订阅不到《炎黄春秋》，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单价 4.00 元，按月、按季度、半年、全年预订均可，也可以补购，第 1 至 4 期，均免收邮费。

另：本刊 1995 年合订本（总 34—45 期）已装订完毕。全部精装，每部 47 元，免费挂号邮寄。

请您汇款时务必将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书写清晰，以免误投。

本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政编码：100802　电话 66170955

联 系 人：杜习

长征：共和国在马背上

● 李茂林

每当人们提及六十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无不对蒋介石义愤填膺。正是这位民国的风云人物，在30年代连续发动的“围剿”，才迫使各苏区的红军官兵，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军事转移。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相当严肃的事实：红军的长征，决不限于军事失利后的战略退却，它同时还是为了一个新生政权的存在，才那样气壮山河地抗争。蒋介石也并非仅为了争得几块地盘，而是为了要扼杀一个新生的政权，才同共产党和红军打得难解难分。

许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被称为中央苏区及其所属的各革命根据地，早在1931年11月，就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一个在中华民国版图上破土而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个政府的不少机构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机构几乎相同。如果说以江西瑞金为首都的共和国就是后来以北京为首都的国家的雏形，似乎并不过分。更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国家主席和后来的国家主席虽相隔十八年，竟都是一个人——毛泽东。可见，这位1949年在北京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人，是我们新中国当之无愧的缔造者。

然而，这位曾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家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首先提出建立全国性中央政权的，是当时的党的负责人李立三，他的设想和计划自然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尽管李立三不久因“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但中共中央对他建立国家的构想并没有改变，反而还加快了实施的步伐。

原定于1931年8月1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因第三次反“围剿”战事的影响而推后，但不难看出，选定南昌起义的日子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是继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之后向南京政府的又一次挑战。它明确告诉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在拥有自己的军队、土地之后，现在要拥有一个堂堂正正的新国家。

最后确定的日子是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蒋介石的30万人马被打得落花流水。此时，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已形成包括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的辽阔地域，经过战火洗礼的5万名红军官兵成为这块地域的坚强柱石。毫无疑问，建立国家政权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

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立讲话者为毛泽东，其右侧第一人为朱德

中央发布的《告全国工农民众书》指出，将要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毫无异议地要成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

11月7日在赤色首都瑞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晚上放了焰火。历史赋予这一天的特别含意是：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成立后，第一个以工人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东方诞生。而且，这个刚刚问世的国家就首先声明向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战。

然而，曾参加过"八国联军"的欧美列强和正在侵华的日本并没有对这一天格外重视，也许他们以为，这只是共产党人搞的一场儿戏和闹剧。从这一点讲，他们对共产党的力量一无所知，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麻木不仁。只有当时的南京政府坐立不安，毕竟是一个共和国在它的腹地出世，而且从瑞金传来的立国豪言，无不咄咄逼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并非几个领袖人物的个人决定，而是经过工农兵全国代表大会的投票之后，才宣告了政权的诞生。来自七个苏区的代表团共六百余人，是代表所辖范围16万平方公里、一千余万群众来行使这神圣权利的。工农兵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向全世界宣称，这个国家的政权属于工农兵及其一切劳动群众。大纲规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各级人民政权，在对外政策方面，宣布中华民族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即日无效。

这部中国无产者的第一本建国大纲是周恩来同志在上海起草完成的。无独有偶，二十几年后，又是他代表中国共产党提议，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

大会还讨论通过了国家劳动法、土地法、红军法和婚姻法，并予以颁布实施。

当时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最高权力，这和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完全一致。历史和现实如此相同，不难看出，最初缔造国家的共产党人所跨出的历史一步，有何等的英明和远见卓识。在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的63人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18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他们中的领袖人物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由工农兵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军事委员会，统帅各个苏区的全部武装力量，被任命的军委委员就有朱德、彭德怀、王稼祥、谭震林、林彪、叶剑英、贺龙、徐向前、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关向应……如果再加上后来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的刘伯承，建国后的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当时就在其中。也正是这次大会，全国各苏区的武装力量被统一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总司令由朱德担任，朱总司令这个称呼从此就伴随了他整整一生，虽然他最后担任的职务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在国人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中国人民军队的总司令。

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下设外交部、劳动部、粮食部、军事部、财政部、土地部、教育部、内务部、司法部、工农检察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临时最高法庭等部委和机关，承担着今天国务院所履行的全部职责。她的廉洁形象永远是今人学习的榜样；中央政府十多个部委办公地点总共才占用一栋500平方米的祠堂，而且每个部委只限定一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

房子工作。为防止和消除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现象，共和国成立之初便发动群众进行监督。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郑重提出：民众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对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分子，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

国家工农检察部还特意组织了反腐败突击队和反腐败群众法庭，让一切非人民公仆的形象，哪里出现便在哪里曝光。

正是由于这样，人民的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新生的共和国成立才一个月，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加入了苏维埃共和国领导的工农红军，使中央苏区的红军猛增至6.7万人。

看来，任何力量也不能否认这个国家的存在，仅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货币上，也能使一切拥护者受到鼓舞，使一切反对者受到震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头像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永恒信仰，而地球上的镰刀斧头则预示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当时的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他同毛泽东一起长征到达陕北。

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

诞生的那天起就直接在战争的锤炼中成长壮大，在从1932年7月起的长达八个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以后，南京政府又在半年之后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当敌人50万大军加上300架飞机向中央根据地频频进攻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然而，共和国的旗帜依旧高高飘扬，回敬敌人的除了军事抵抗之外，又于1934年1月在首都瑞金沙洲坝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除了十多个苏维埃地方政府代表团之外，还有来自上海、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满州、台湾、香港及朝鲜、越南、印尼等地的代表。历时12天的大会通过了对国家宪法大纲的修改，还举手表决了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和国徽、国旗、军旗等议案。毛泽东继续被选任国家主席……

但是，连年的战争使中央苏区经济匮乏、供给紧张，主要军事负责人的“左”倾思想、特别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的脱离实际的指挥，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三四个完整的县了。

被迫要进行一次长征已成定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离开根据地而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但她决不是一个流亡政府，她仍然以国家的名义继续向南京政府挑战；她在出发前还与中央军委联名发表了《抗日宣言》，以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再次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行使国家的主权才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

在蒋介石的“围剿”大军最终攻占赤色首都瑞金之后，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被他占领的土地上，不仅中国共产党还在，中国红军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影子也还在。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继续斗争的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察部长项英，他此时担任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区负责人。另一位中央执行委员陈毅，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同时留下的还有教育部长兼国家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瞿秋白，粮食部长陈潭秋，内务部长曾山，司法部长梁伯台等。他们继续统一领导南方8省14个地区的游击战争及党政工作……

至于其他根据地红军部队，更是精心维护着国家的尊严。远离中央苏区的红廿五军长征时，就直言不讳地把自己北上行动称之为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之命……连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张贴的文告上，都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委会的红色大印……没想到，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借用了“革委会”这个光辉的名字，滥用权力造成那么大的破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使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蒋介石也刮目相看。尽管他在中央苏区屠杀了70万人，但对如何防止苏维埃“死灰复燃”仍然束手无策。倒是进剿苏区的前线总指挥陈诚颇有一点政治眼光，他命令占领瑞金的国民党官兵，对苏区所有文件，哪怕是片言只语，也要完好地上缴保存。也许是为了探讨这个国中之国的生存奥妙，从中寻找出扼杀她的灵丹妙药……虽然结果是黔驴技穷，事与愿违，但他当年搜集的资料，最后汇编为一本《陈诚档案》，这就成了保存至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完整的一部史料。

长征途中的各路红军，总是用自己的战果扩大着红色政权的影响，同时，也以此证明，红军永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忠实的武装力量。

在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初攻克遵义后，很快为马背上的共和国诞生了新的地方政府——按照《苏维埃共和国组织法》，以当地工农兵为代表组成了遵义县苏维埃政府。国家主席毛泽东到会予以祝贺，曾任红三军团师政治部主任的李井泉，被选为遵义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

虽然这个地方政权仅存在了7天，便随着红军的撤离而消失，但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却永载史册。就是这个只有25人组成的地方政府，给困难中的红军征集了4000名兵员。当今人只知用“遵义会议”的伟大来评价遵义时，请不要忘记在这里还建立过长征途中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在红二、六军团长征离开湖南进入贵州毕节、大定以后，黔西北的苏维埃临时政权如雨后春笋。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其张贴的布告中指出：革命委员会是川滇黔省广大人民的革命政府，其战斗任务是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后来，这支部队进入西康后，贺龙又以川滇黔康分会的名义，发布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告。值得提及的是，这些告示所用川滇黔省或川滇黔康，表明了这支长征劲旅曾活动过的地域范围。当然，他们长征最终走过的绝不是上面所讲的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而是九省，其中青海省是其他红军都未经过的地方。在这样漫长的征途中，它攻占过38座县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文告，也就贴满这些地方。可见，国家的意识、政权的意识、维护中央政府统一的意识，无论远离中央红军与否，都已经成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自觉行动。

当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无论用分裂这个字眼是否恰当，事实上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上曾

一度出现过两个中央政府。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应该追溯到1935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张国焘，他在红四方面军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当远道而来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以后，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借故不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及部分红一方面军约10万人南下金川，从而迫使仅有7000人的红一方面军孤军北上，造成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它给我党、我军造成的创伤，多少年后都隐隐作痛。然而，当时的张国焘并没有看到他给红军可能造成的灭顶之灾，还振振有词地谴责毛泽东是逃跑路线。而他却跑到卓木碉的大庙里，宣布成立所谓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时还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由他担任"中央政府"主席。这个职务是他自己任命的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我们无须深究，因为选举国家主席需要召开第三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而这恰恰是张国焘力所莫及的。仅这一点，"张主席"的称号就是非法的，是违背《苏维埃组织法》的。

合法的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惊涛骇浪里又度过了一个月，终于和他的亲密战友彭德怀、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带着7000人的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和先期到达到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两个月后，苏维埃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时的共和国又有了一块属于自己辖管的版图。新成立的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国家在陕北苏区设立的最高行政机关，她辖有陕北省、陕甘省、关中特区、神府特区共36个县。以博古为主席的这个办事处，还设有劳动、土地、粮食、教育、司法、外交等九个部委……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新诞生的人民政权，后来与南京政府继续抗衡的陕甘宁边区基本上就是这个行政区域。

在四川的张国焘的那个"中央政府"徒有虚名地生存了八个月后，随着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最终结束了非法的政治生涯。平心而论，当时张国焘也认识了错误，否则，他与毛泽东军事对立的局面将不会结束。随着1936年10月的到来，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会师，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中国工农红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则实现了空前的巩固。

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联名发出的三军会师贺电，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贺电称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是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陈昌浩、林彪、徐向前、贺龙、任弼时、王稼祥、刘伯承、叶剑英、徐海东。贺电最后的口号是：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背上的共和国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战斗岁月，是党和党领导下的红军把年轻的共和国护送到新的革命大本营。九个月后的1937年7月17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庐山谈判，国民党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撤销。

从1931年11月成立，到1937年9月撤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历了6年的风雨历程，其中有两年在长征中度过。正是她的存在，才使中国革命更显得伟大、壮观和神奇，因为从世界革命史上，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有过这样一段艰难曲折经历的国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如此丰富的斗争背景和强大的生命力，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她，特别是在这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　　（责任编辑：洛松）

（作者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正在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再说长征》的总撰稿人，10年前曾为10集电视系列片《长征·生命的歌》撰写文字稿。）

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在甘肃会宁会师，马背上的苏维埃共和国终于在陕北落户。图为会宁西关

历史档案回答了张学良对长征的一个疑问

● 力平

红军纪律歌

张学良曾经产生过一个疑问：长征那么艰苦，红军为什么没有被拖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当时在西安的张学良曾产生了一个疑问：长征这么艰苦，爬雪山，过草地，饥无食，寒无衣，任什么军队都会拖垮了，为什么红军没有垮，战斗力仍那么强，东北军几次进攻都吃了败仗？

后来他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接触，对红军逐步有所了解。这支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不烂，拖不垮，坚韧不拔，英勇无敌，是它的性质决定的。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拥戴自己的军队。有关长征的历史档案材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给养、补给十分困难，极易发生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下，红军采取一系列加强纪律的措施

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在撤出初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又因王明路线的错 误而犯了军事上的逃跑主义，损失很大。

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之后，又成为无后方作战。在一切给养和补给十分困难，极易发生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下，1934 年 10 月 22 日，红军政治部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出通知。通知说：“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随时注意筹款及征集资材的工作，主要的是以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向富农及城市商人捐款等方法进行。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应由各级政治机关负责，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及无组织的乱没收行为。”为保证这一要求的实现，还规定了没收、捐款的“暂行细则”，如其中规定：“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队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混乱现象”。

同时，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如 10 月 27 日的《红星》报发表了《消灭一切脱离群众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文中“要求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坚决保障一切红军战士充分了解争取群众发动群

众斗争的意义，自动遵守纪律，不侵犯群众丝毫利益”。文章还“把这几天地方工作的一切脱离群众事实略举数条”，“希望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克服一切非阶级路线、脱离群众之现象”，其中，有“违反阶级路线的没收”、“副排长私打土豪”、“只顾捉鸡脱离群众”、“乱拿东西”等事例。文章指出：“这是违反苏维埃法令与红军纪律的行为，现正严格追究。”

10月29日，即长征开始还不到一个月，红军政治部发出的《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深刻分析了撤出苏区后面临的新形势，强调指出保证红军以阶级纪律的模范行动，争取广大群众的必要。《训令》要求政治工作人员首先以身作则，发挥模范作用，加强政治工作，克服任何困难，“保持红军的模范纪律”。并且强调“要耐心教育个别战士，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严厉地处罚破坏纪律违犯阶级路线的分子。每连宣传队配置时，应实行进出宣传与检查纪律”。要“避免一切伤害群众宗教的民族的情感之行为，肃清一切强迫命令的方式”。

在11月7日《红星》报发出的“号外”中，提出以下号召：(一)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二)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三)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四)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五)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六)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作出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七)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并且指出：“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与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竞赛，并向本报经常地通信。”

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以十分严厉的手段，包括枪决，来保证纪律的执行

一方面是加强宣传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严格执行纪律。正如11月7日的《红星》报所指出：“严格的检查本部队的纪律，对于违反纪律的分子，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及受到应得的裁判。”

“福州”某部上士袁子何，行军中故意逗留在后面，枪杀群众的鸡鸭，乱拿群众的东西，经领导发觉纠正，他竟不服从命令，仍旧自由行动。经上级机关批准，执行枪决。

“红星”直属队工兵连指导员李新贵，私自拿土豪的谷子，用来换鞋子，还自行没收土豪的财产，经上级批准撤职，并罚做苦工。

红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并不是只听你说的什么，而是要看你的实际行动的。没有纪律的队伍，一切宣传工作都不会引起群众对部队的同情与拥护。正是红军的实际行动，取得了白区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且吸引了红军尚未到达地区的群众。

1934年年底，当红军进入一个镇子时，群众已经在街口贴满了下列的标语：“欢迎废除苛捐杂税的红军！”“欢迎爱国家爱人民的红军！”“欢迎不拉伕不扰民的红军！”“欢迎拔除痛苦的红军！”“欢迎丝毫无犯的红军！”

《红星》报刊载了这些标语，并且指出：“这些标语都是从群众心坎中透露出来的，证明群众怎样深刻地了解红军，热烈地拥护红军，渴望和欢迎红军到来的热情。”

当年在云贵川地区广泛地流传着一首“赔锅”的诗歌，也是对红军纪律严明的写照。歌词的大意是：我们红军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锅，留下五个袁世凯(银元)，赔你一口好铁锅。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当地人民群众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红军真是穷苦人的救星。

为严格财经管理，避免侵害群众利益和贪污腐化的现象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中央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曾颁发过《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组织条例》，专门对从地主、富农征发来的财物作出处理规定。红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针对变化了的情况，当年11月10日，李富春以红军政治部代主任的名义发出了《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从步兵团起到师、军团、总政治部，都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同级政治机关指导下进行工作，受上级没收征发委员会的指挥。“部队中对于地主豪绅及反动分子的一切没收征发工作，完全归没委负责，由没委登记、转账及处理，但对于分配给地方群众的物品，须交给同级政治机关分配”。并且规定了工作细则、会计手续，以保证不致乱打土豪、乱摊派，发生违犯纪律的行为。

针对进驻城镇的新情况，及时提出做好城市居民工作的新要求

除了一般地加强注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纪律问题外，由于红军行进中经常进占一些县城或者市镇，因而产生了一个如何做好城市居民工作的问题。

“福州”部队在进占宜章城时，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团协同政治部门进行城市工作，他们散发和张贴传单、标语，化装演讲，召开三四十个小规模的群众会和三

个群众大会，扩大政治影响，发展红军，组织工会小组。他们对这次工作总结了经验，也对部队的纪律工作作了总结：在进城之前，在队伍中宣布纪律；进城之后，组织检查和巡查；打开一个城池，并不是所有队伍都拥进城去，只由必要的一些队伍进城。由于采用了这些办法，“所以纪律的遵守与革命秩序的维持还好”。

这些经验，受到红军领导上的重视，向全军作了通报。后来，领导上对进城工作更有准备了，如1935年1月上旬占领遵义城，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出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八项注意是：“一、整齐武装服装。二、不掉队落伍。三、不脱离队伍，不自由行动。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六、不乱买东西吃。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尊重与团结少数民族，争取他们的同情；周恩来和朱德等亲自检查部队纪律

红军长征向西到达湖南西部，接着进入贵州，逐渐深入到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情况立即引起了红军领导上的注意。

11月29日，红军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指示说：瑶民、苗民等是散布在广西、贵州、湖南西部以及云南等省的弱小民族，总的人口不下千万。他们历来就受着汉族军阀、官僚、地主、商人、有钱人的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这促成了他们对于汉民族的仇恨与他们内部的团结。我们对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族与他们民族平等。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争取他们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同情。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他们的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对于他们的统治的方式、思想、习惯和宗教仪式，应该表示尊重，不求过早地去发动他们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且向他们解释汉族中的劳苦群众同他们一样受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压迫，他们民族的敌人，也就是中国劳动民众的共同敌人。

红军政治部还制定了对苗民、瑶民的口号，如：

“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帝国主义、军阀、财富者是汉工农与苗族共同的敌人。”“苗族与汉族的工农起来共同扫平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苗、汉民族的对立，只有苗族与汉族的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苗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

这个指示向全军发出后十天，12月9日，政治部又发出通令说：在最近几天我们行动的区域，均有瑶民居住，各部队须根据本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用政治课的方式在部队中传达。

12月24日，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还致电各军团政治部主任说：最近我军经过的地方，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二、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的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三、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关于上述电报的第三条，是长途行军中红军领导一再注意的问题。因为红军行动一般都是夜行军、急行军，部队的休息和睡眠时间很少，常常是晚饭后出发，第二天午后刚到达，接着又准备下一个行动了，故而十分疲劳，特别是在夜间，落伍的不少。而落伍者脱离了集体，纪律就不易遵守。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军团早已采取了措施，例如建立行军中的支部生活，加强部队的日常管理教育，注意连队的给养和休息，克服一切疲劳散漫现象等。11月底，红军领导向全军发出“消灭掉队落伍现象”的号召，指出近来掉队落伍现象严重，成为减员的主要原因，要引起各级政治机关的严重注意，同时要加强对后方勤务机关的领导，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

（一）加强收容队的工作，在每个团的后卫之后，应派出坚强的收容队，由政治处派得力干部负责。收容队应附有担架。

（二）收容时应不分队别，待到宿营地后再分别送回原队。

（三）开展故意掉队落伍的斗争，对成群结队掉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加以处罚。

（四）加紧卫生工作与改善给养，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病员与掉队落伍现象的重要工作。

此外，还有发扬阶级友爱，帮助病员背包袱、背枪弹，加强对什务员、运输员的教育并解决他们的问题等。

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后，频频发生驻地失火事件。这主要是国民党的地方团队有计划地纵火，以挑拨红军与居民的关系，尤其是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1934年12月10日，红军驻地龙坪等地，四处同时起火，当场捕获国民党便衣纵火人员数名。

参加红军的部分彝族战士长征到达陕北后留影

对此，红军政治部及时发出通令，指出最近几天在红军直属部队和其他部队住地，都发生失火烧房子以及烧山的事件，反革命分子趁此作反动宣传，影响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因此规定：

在屋内不准打火把；每营指导员在宿营中应检查灯火；每伙食单位随时准备救火用水，遇有失火或烧山，红军必须积极参与救火。

并且指出，要特别注意空房子与闲杂人员，严禁掉队落伍人员在空房子烤火；巡查队要严格检查各伙食单位煮饭、烤火的地方是否恰当等。

当时，红军长征中的纪律问题，是受到红军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的。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前夕，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富春等领导人亲自检查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

1935年4月，红军到达彝民地区时，《红星》报专门发了消息《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特别指出：一、不打彝族的土豪，对于彝民群众痛恨的彝族土豪，也要发动彝民群众自己动手来打。二、用写标语、口头宣传等，向广大彝民群众说明红军关于解放彝民的主张。这月14日，总政治部王稼祥、李富春通知各军团政治部："严整部队纪律，争取黔西南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当时，有些对彝民的标语中，发现有用"蛮"字的，《红星》报立即发表文章指出："必须纠正，因为'蛮'字是汉人骂彝民的，彝民听到是很不高兴的。"并且说："犭这一狗旁，过去我们也常常沿用起来，加在猺、猓、猓猓等字上，这同样是少数民族所不愿意的，也应纠正，一律改用人旁如傜、侗、倮倮等。"

也是这月10日，《红星》报还发出《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的文章，说："总政治部曾经无数次的提出，严整纪律是目前我们争取地方居民创造新苏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如果忽视了这一工作，我们就不能顺利的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专门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总政治部发现少数无纪律现象，立刻在6月2日致电各军团政委、政治部主任："严格的检查纪律，必须与目前纪律松弛的现象斗争。"

红军在长征中，严明纪律，这是贯彻始终的。

痛恨红军的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红军纪律严明，并以此为例，严饬所属军队

对于红军的严明纪律，蒋介石是十分害怕的，因为国民党军队是兵匪一样，侵害群众，人民对之极端反感的。为此，在国民党军队对长征的红军围追堵截中，蒋介石曾经以红军的有纪律来严饬国民党军队。如1935年3月6日，蒋介石给刘湘、潘文华的电报说：

"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馀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已行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蒋中正。鱼午行参战印。"

正是由于红军长征，一路上爱护群众，纪律严明，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欢迎，因而军行所过，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洛松）

向忠发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共总书记

●杨奎松

一个遭人鄙视的总书记

总书记一职，曾经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在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中共公认的领袖之前，中共至少有过五任总书记。但在这五任总书记当中，却只有一位是工人出身的，他就是向忠发。

这个唯一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其在位三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尽管向忠发被捕三天就被处死，但这种死显然也不能洗刷他向国民党供出自己组织的机密而带来的耻辱。他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位最受鄙视的党的领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可以看到的有关向忠发的说明，都是相当苛刻的。向忠发的工人身份，被说成是"流氓无产者"；他的文化程度，被说成是"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在党内的作用，自然只是"挂名"；而他的个人品质，更是恶劣不堪，因为据说他自任总书记以来，在那种极端危险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竟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甚至还包了一个妓女叫杨秀贞的整天在他的住处鬼混"，以至"党"反过来"研究决定"派人监视自己总书记的"种种不轨行为"(见高军：≪关于向忠发被捕叛变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相信以上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至少，在近两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于向忠发的说法多多少少有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比如，关于向忠发根本上是个"流氓无产者"的说法没有了，承认他是个工人，至少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的；关于向忠发"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说法，换成了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关于向忠发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类，则被比较简单地概括为追求生活安乐，跟妓女姘居。不过，看起来关于向忠发是"挂名的总书记"的说法是难于改变了，作者只是换了一个更贴切的字眼儿，叫做"名义上的总书记"，并且断言此人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自己也对总书记的职务厌倦了"。(见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8页)

向忠发的被捕变节，确实应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是不容置疑的。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共产党，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只是对嫖妓感兴趣的庸人来做自己名义上的领袖？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是：向忠发到底是怎样一个总书记？

事情很清楚，时至今日，人们关于向忠发的种种说法都还不尽准确。对向忠发的情况，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与说明。

向忠发起家武汉工运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省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省一家大户做佣人，三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四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冶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

向 忠 发

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湖南省岳阳，中共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四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此时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在中共五大时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当时的武汉政府邀请中共入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选派在共产国际专门研究过农民问题的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担任农政部部长，选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去担任劳工部部长。结果，不仅在两党合作期间，他们领导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群众面前消失(了)共产党的面貌"，而且当1927年7月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苏兆征进一步因为与谭平山一道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电令公开抗议武汉政府的政策并声明退出，而是"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使其工人领袖形象在共产国际那里大大打了折扣。与此相反，因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并不特别重视向忠发这一类人的工人领袖，致使向内心颇不平衡。故当中共中央为避免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更是常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共中央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几乎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辩论。此种情况，自然给人以不同凡响的印象。

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只有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也没有特别重视。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因此，向

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4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开始认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

主张“鞭笞”党的向忠发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对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错误指示,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分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俄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11月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十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欲望。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

中共六大会址——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列布若耶别墅

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分，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分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他宣称这中间的问题在于，上述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与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他说"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他提出，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1)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2)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自然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像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己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对中国党全面改造的结果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曾经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发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

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3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把100－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偷渡到苏联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看重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丝毫没有想到他有机会借此大会一步登天。因为，当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的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濡目染的结果。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中共六大的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10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而这个名单与以前明显不同的一点是，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向忠发并非傀儡

向忠发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颇值一提的事情。一件事是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开除的原因只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错误严重，而党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严重不满情绪。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的9月10日的报告，蔡和森于15日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尽管与会者在蔡和森等人的处分问题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对此，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

另一件事就是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这个长达9000字的文件中，向忠

发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

再有一件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上海毕竟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受到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的反对。但向忠发声称："我们受了六次大会的重大委托，我们如何来实行？新中央工作至数月但有多少成绩呢？我们深深感到组织上是一个问题，的确感到工作方式之错误。我们每天都要喊中心工作，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上海，……中央兼江苏可给一般同志以很好的影响，同时群众的情绪可以很快的反映到中央来"。因此，他一意坚持，根本不听项英的意见，并当面指责项英对江苏的问题总是带有感情色彩，断言江苏的工作要有起色，"中央兼江苏才是唯一的办法"。由于向忠发的这一提议，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接连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加以解决。而向忠发的意见，也只是在周恩来从外地回来后提出了极为充分的反对理由，并得到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不过，他仍旧相当固执地表示："放弃我的主张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即周恩来——引者注)说服了我"。

显然，这些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做事干脆决断，愿意思考，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即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1929 年 1 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说明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中央通告，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 2 月指示信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着边际。

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

向忠发一心想做出点儿石破天惊的大事业来，因此他早就在主张尽快地"动"起来了。1929 年 3 月，他极力反对所谓党内的"左"倾危险，甚至说"左"倾盲动倾向已不复存在。同年 7 月共产国际也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正合向忠发口味。恰巧中共中央讨论如何贯彻"反右倾"精神之际，共产国际 1929 年 10 月指示信又到了。这封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已经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开始准备实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的说法，确实更使人热血沸腾。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不进则退，不左则右。李立三很快提出了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从而有了所谓"立三路线"的赫赫名声。不过，如果说立三路线的要害是"左"的话，那么最"左"却未必真的是李立三。因为事情很清楚，最早在党内主张消灭右倾危险的，并不是李立三，而是向忠发。尽管在构制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象力与李立三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毕竟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

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

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吗？

和共产国际唱对台戏

1930年6月初，所谓立三路线已经基本形成。其核心内容就是相信中国革命已到通过一省数省的发动，走到夺取全国政权的阶段。不想，这时恰恰传来消息，说是共产国际怀疑中共所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在莫斯科则接受了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批准他们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后，他们立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

6月11日决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坚决反对。他们强调，共产国际正在就中国革命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文件，而且决议在全国平行布置夺取政权的工作，反对建立根据地的作法十分不妥，目前只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对此，负责与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立即给予支持，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同时还要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给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反对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

7月底，中国红军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消息传来，使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布置夺取全国政权工作的中共中央欢欣鼓舞。谁知这时共产国际又来一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对此，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8月1日和8月3日，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出，“如果我们对总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中国革命则是罪恶”的话来。他明确主张：“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声称：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他还认为，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因此，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前此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李立三和向忠发由此给自己惹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还不敢大张挞伐，只把矛头指向了有系统理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远东局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对此，向忠发同样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大吵，指责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党的统一。

8月6日，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双方开联席会。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煽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但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对此，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像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不禁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嚷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

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此事非同小可。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承认“这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特别对远东局不应如此”。但他同时亦表示，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这实在难以忍耐。他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同时，政治局会议迅速通过正式决议、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向忠发起草并署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摘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当然，为了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向忠发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同时，也主动“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起政治上的责任”。

同时，中共中央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复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的答复。”

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情况吗？事实上，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政策，这时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因此，向忠发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他所期望的任何结果。

向忠发何以“堕落”？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部署。以至政治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向忠发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政治路线。这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辩”，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是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

多工作。在紧接着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李维汉也被删掉了，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像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蛋”，就连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他明显不再像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未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向忠发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通常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向忠发四中全会以后，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还是有远见的。

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可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主席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自然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此可见，不能把向忠发说成是一个草包或傀儡，他还是能说会写的，并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但他有个人野心，他的政治觉悟很差。他坚持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比李立三还起劲！而且他坚持城市中心论，而看轻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这说明他是当不了中国革命领袖的。然而他不让张国焘当苏区中央局书记，推荐毛泽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为党做了两件好事。但这不能抵消他被捕后自首变节的罪行。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职务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用周恩来的说法是“堕落”了。不只是生活上堕落，而且是政治上堕落了。

（本文中的一些重要资料来自于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莫斯科汉学图书馆，笔者谨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艾子）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孙彦钊

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一、“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古城西安临潼华清池突然响起了枪声，划破了寒夜的宁静。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抗日救国，在向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多次进谏无效反遭斥责后，终于采取了兵谏行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序幕。

张、杨冒着极大危险，以英雄无畏的胆识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上，却举棋不定。

于是，张、杨把寻求对策的目光投向了中共。

中共于当天就得到消息，群情激昂。人们欢呼雀跃，不断传来“审判蒋介石”、“杀掉蒋介石”的呼声。

中共领导人也被这种情绪感染着，激动着，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痛快。然而，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一方面密切注视着事变的发展，一方面做着应变的准备。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三次去电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西安情况以及中共意见；复电张学良，表示支持他的抗日义举，并提醒他看管好蒋介石；急令红军南下，与张、杨部靠拢，为张、杨壮胆声威。

紧接着，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西安事变，这是中共中央在事变后首次召开的会议，地点在陕北保安城(今志丹县)东南张闻天的窑洞里。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人。

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交(即统战)工作，所以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做了报告。

毛泽东根据掌握的材料，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事变后的形势以及如何看待蒋介石等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指出：“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不叫政府的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到如何对待蒋介石问题，当时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以上材料根据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的研究文章)

但是，毛泽东在报告中还谈到：“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这一点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中间的立场与亲日派、降日派有别，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这为后来决定释蒋，继续争取蒋，一致抗日留下后路。

随后，与会者就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大多数同意毛泽东关于西安事变意义的分析，只有张国焘认为张、杨举动第一是对蒋，第二才是抗日，从而低估了事变的意义。

周恩来的发言委婉耐人寻味，他提出在政权上不

要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比建立实质政权)更为有利。”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从而暗示了他反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除蒋”、“审蒋”的看法。

张闻天最后发言，只见他戴着高度近视镜，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慢条斯理地谈起了他的看法。

“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因而，“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而要尽量争取、分化、孤立妥协派，“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系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中共中央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时预测说，西安事变是一次好的时机，“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

张闻天的发言，明确了不在西安建立实质政权方式的主张，反而强调要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自然包括争取蒋介石。因为南京政府正统和蒋介石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群情高昂情况下，张闻天能够冷静从事，提醒大家不要急躁，以免被动，可谓高瞻远瞩。他的观点很快被形势的发展所证明。

而张闻天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争取蒋介石，促其转到抗日方面来的思想，不是一时的冲动或决定而是由来已久，这次发言只不过是他关于联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早在1936年8月，张闻天就提出中共在新形势下要与蒋介石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认为中共要在多方面采取措施，揭破蒋介石的欺骗，使其与国民党及军队的抗日倾向继续发展，转向真正抗日上来。随即，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首次公开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

9月1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抗日反蒋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策略转变。

9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为联蒋抗日再迈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

然而，蒋介石不甘心与中共合作，不甘心给中共及红军以合法地位，他一面谈判，一面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宁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彻底消灭中共及红军。一时间，蒋介石的行为令人猜疑，党内也有人开始怀疑蒋介石能否走上抗日道路。

鉴于此，中共中央在11月13日(西安事变前一个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

张闻天在分析全国形势后明确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原因是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向抗日方面来的较多。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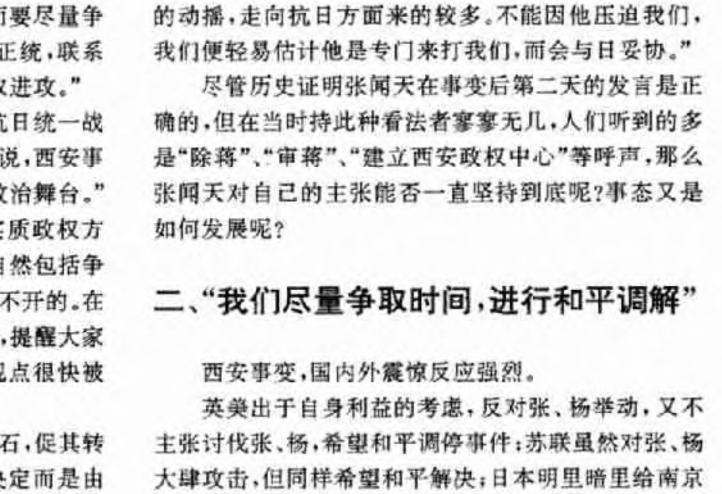
尽管历史证明张闻天在事变后第二天的发言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持此种看法者寥寥无几，人们听到的多是“除蒋”、“审蒋”、“建立西安政权中心”等呼声，那么张闻天对自己的主张能否一直坚持到底呢？事态又是如何发展呢？

二、“我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西安事变，国内外震惊反应强烈。

英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反对张、杨举动，又不主张讨伐张、杨，希望和平调停事件；苏联虽然对张、杨大肆攻击，但同样希望和平解决；日本明里暗里给南京施压，阻挠南京与西安和谈，梦想中国内战爆发好坐收渔翁之利。

南京内部主和、讨伐两派都在搭救蒋介石的旗号下调兵遣将，打得不可开交，地方实力派担心内战爆发



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康生；
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秦邦宪、陈云

对己不利，纷纷谴责张、杨，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

一时间，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世人关注的热点都集中在和平解决或是武力解决的问题上，换言之，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了问题的关键。

显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裁判，事情就解决了。何况，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是促蒋抗日、逼蒋抗日，并非除蒋抗日。因而，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17日到达西安，了解各方反应和西安情况以及与张学良商谈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保蒋安全”建议。周恩来在电文中称：“为了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随即，中共中央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实属显然。”“即对于援救蒋氏本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向世人表明中共反对武力解决的态度。

自此，前方后方，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电报往来不断，互传信息，共商计策，推动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方向发展。

经过几天后，事态渐趋明朗，需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于是，12月1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是继13日会议后又一次讨论西安事变并最终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策略方针的会议，因而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先由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认为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黑暗的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光明的方面），两个方面都在发展着。由于捉蒋，南京方面“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反而“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爆发与延长的危险，自然会影响光明的方面。“我们主要是消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更站在第三者立场说公道话”，“力争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张闻天也在会上做了发言。他的发言共七点，比较系统明确，阐述了我党在西安事变上的认识和采取的策略方针。

张闻天开篇即说自13日会议至现在开会已有六天，“在这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和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比前次是更进步的。”

张闻天明确提出：“我们要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从而概括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张闻天认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全国性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

鉴于党内曾有过“审蒋”主张，张闻天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批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他这种明确态度与其13日会议发言精神是一致的，它对于统一党内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张闻天谈到了关于苏联在西安事变上的舆论问题。苏联报纸自14日起对张、杨举动横加指责，称事变的发动是亲日派的阴谋等等，令人迷惑。而此时，中共还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清晰的指示，所以对苏联的舆论党内有统一认识的必要。

张闻天认为：“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那么，中共能否采取与苏联同一立场呢？“当然是不能的。”张闻天的回答是坚决的。这充分显示中共是独立自主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方针的，从而为否定那种屈从于苏联或听命于共产国际指示的传统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对党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前者是毛泽东起草的，它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灭亡！”因而倡议双方以潼关为界，罢兵，由南京召开全国和平会议，共商国是，会议地点在南京。对于处置蒋介石问题，虽仍然提出要由各党各界各军讨论处置，但基本纲领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通电》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策略方针的正式确定。后者为张闻天起草，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及意义、性质、前途，提出了中共的方针和任务，它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统一党内思想和步伐的纲领性文件。

和平调 解方针已定，关键是如何运作。换言之，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

张闻天在21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时局和释蒋的看法，对促成和谈顺利进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张闻天认为时局的特点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战；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所以，“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具体请周恩来与张、杨协商，可以在下列条件下与蒋介石、陈诚谈判，“成立和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三〉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该电文受到周恩来重视，后来成为西安谈判的基础，它的基本精神在蒋介石口头承诺的六项条件得到反映。

12 月 25 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亲自陪同下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张学良为他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英雄“壮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客观上也使西安形势复杂起来，和平之路荆棘丛生。

三、“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张闻天来到了西安

蒋介石返回南京，把他的“领袖人格”抛到九霄云外，立即扣留张学良，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判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剥夺了张学良的自由，同时调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

刹那间，形势急转直下，西北上空战云密布，人们刚刚看到的和平希望又变得渺茫起来。

那么，蒋介石还能履行他在西安的诺言吗?不仅一般老百姓心里犯嘀咕，而且共产党内部一些同志也产生了怀疑。

面对这种形势，需要中共做出自已的判断申明自己的立场。所以，在 1937 年 1 月 2 日，党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对策。

张闻天在会上开宗明义说：“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而不能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怀疑他，看不到他的抗日倾向。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重兵压境“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

因此，西安方面应发表通电，“说明现在情况，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要求南京出兵援绥。”要采取措施使蒋介石实现他自己的话，并与亲日派分离。但要看到：“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依靠斗争与活动。”

张闻天还指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争取更多的同盟者。目前我们的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与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

张闻天的发言透彻、深刻，既肯定了蒋介石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又看清了蒋介石目前玩弄的伎俩，这种分析对于统一党内思想，把握方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月 5 日，张闻天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传达 1 月 2 日会议精神，具体指示红军行动和周、博的工作。他们还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要他与宋子文接洽，促使宋子文履行蒋在西安应允的“停战撤兵”等六项条件。

1 月 7 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再次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为此而奋斗。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一方面批判亲日派的行动，一方面提出督促和逼迫蒋介石实践自己的诺言。

1 月 9 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周、博，强调“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

同一天，蒋介石抛出了解决西北问题的甲乙两种方案。甲案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撤到甘肃和陕西西部，红军全部退回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陇海线；乙案则要东北军移驻安徽、河南，十七路军调防陕西西部，红军仍回陕北。

张学良被扣未返，甲乙方案又关系部队去向问题，西北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东北军内部分为主和派、主战派，两派矛盾分歧很大。主和派认为可以谈判撤军，主战派认为在张学良回陕之前，任何有关军队去向的谈判都是背叛，坚决反对和谈撤军，决心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可是西北三方的力量与南京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如果真打起来，吃亏的肯定是西北三方，这也不利于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所以，中共代表团成员及彭德怀等中共将领对东北军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希望主战派权衡利弊，改变主意，与主和派精诚团结，在接受甲案条件下与南京谈判，这样才有可能解救张学良，有可能维持西北得之不易的“三位一体”的局面。但主战派仍执迷不误，特别是 1 月 21 日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军政负责人会议决定接受甲案后，他们更是气愤难平，四下活动，煽起战争情绪，形势骤然变得险恶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张闻天 1 月 25 日从延安秘密出发前往西安。毛泽东当天致电周恩来告知此事说：“洛甫(即张闻天)本日出发来西安。”

张闻天动身前还致电北方局的刘少奇，指示北方局要“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

1 月 27 日，张闻天到达西安后，立即与那里的周恩来、博古谈话，了解西安情况，共商大计。是夜，张闻天秘密住进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

然而，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东北军青年军官 50 余人到周恩来住处请愿事件。当时气氛异常紧张，他们不听周恩来的解释、劝说，只坚持反对和谈撤军，否则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并希望得到中共和红军的支持。他们中有人当场扬言，如果红军不参加与中央军作战的话，他们就和红军决裂。还有人拟出了暗杀名单，里面有主和派和中共党人。

28 日上午，博古急忙赶到张闻天住处，将夜里情况告诉他，并催张闻天赶快离开西安前往云阳红军总指挥部。

张闻天说："不急不急，我还想多了解些情况。"

博古可急了，说"不行啊。住在这里暴露了可不得了，因为已有人拟定了暗杀名单。还是快走的好。"

博古的担忧不无道理。张闻天是秘密来西安的，不像周恩来、博古他们是张学良邀请来的，是客人，东北军某些青年军官虽有不满，但有所顾忌。如果在他们情绪难平之时发现中共总负责人在西安城内，那么他们对中共的疑惑就更大了，张闻天的暴露无疑火上浇油，使局势难以控制。可见，张闻天西安之行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正如博古后来回忆："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洛甫同志来了。"

张闻天自西安动身前，以他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任弼时，谈了他的看法。他根据西安形势和主战派情况指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对极少数不能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我们要向左派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

同日，张闻天到达云阳红军总指挥部，顾不上休息，立即与那里的中共领导人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紧急商议，最后以他个人名义再次致电毛泽东及周恩来、博古，提出建议：军事上，红军主力主动从陕南"向渭北方向撤退，"这样既可以向各方"表示我们的和平诚意，"又可以借机收缩兵力，避免被歼的危险。政治上，请朱德、毛泽东对红军这一行动发表谈话，表明"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并且"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

电报还进一步强调："这一态度的表明，目前极端重要。"

该电报的内容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比如要蒋介石销假主事，把他推到两难境地，反而有利中共和西北问题的解决。蒋介石回南京不久，假意表示自己统帅无方，请求休假养病，实际上是让别人进攻西北，他自己又可装着未主事而逃避战争责任。如今请他销假出山，他就难找借口，也就不能不考虑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如果顽固坚持武力解决，他就难逃发动新内战的责任了。

果然，毛泽东于第二天即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要他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同时要求国民党给红军"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29 日、30 日上午，张闻天又致电毛、周、博，再谈中共策略：在一般情况下，红军不参加内战。只有在实行甲案后南京仍然进攻我们时，我们方实行自卫战。

但是，西安城内，战争危机一触即发。29 日，东北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召开会议，决定张学良不放回，坚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主战派压倒主和派，几乎控制了西安局势。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态度也由过去的主和变得暧昧起来。

中共及红军是坐而旁观、还是参与友军行动呢？

周恩来向西安方面表示，红军绝不做对不起友军的事情，但需协商后决定。于是，在 30 日下午 5 时，周恩来、博古等人匆匆赶到云阳，与那里的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王稼祥等紧急磋商，寻求对策。与会者分析形势后认为红军面临两难：不和友军采取一致行动，会导致红军与友军的对立，影响西北业已形成的"三位一体"局面；参加并采取一致行动，又违背中共和平意愿。但是在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终于做出决定："在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不变前提下，采取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行动。

是夜 10 时，与会者联名致电陕北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形势变化后中共和红军的策略方针："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 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

是夜 12 时，毛、朱、张复电表示赞同，并将当前行动方针概况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

随后，周恩来等返回西安，告知中共决定。张闻天仍留在云阳，关注着西安城内局势的发展。但是西安城里，"主战""主和"势力仍在较量，在这紧要关头，1 月 31 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了最高军事会议，最终决定要和平撤兵。东北军青年军官中的少数激进分子得悉会议情况后聚在一起，密谋暗杀活动，以便 阻挠和平撤兵。2 月 2 日，他们枪杀了王以哲将军，东北军发生了更大分裂，西安城内气氛又趋紧张，但在中共代表的极力周旋下，事件很快得到妥协处理，但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瓦解了。

西安事变终于落 下了帷幕。国共两 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步伐加快了。 （责任编辑 萧徐）

司徒美堂

何以受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礼遇

●木　易

1882年，14岁的司徒美堂怀揣着53个大洋到美国闯天下，26岁出任华侨组织"安良堂"总理，成了美洲华侨社会众所周知的"传奇人物"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在他幼年时，就失去了父亲，生活极为拮据。尽管如此，在他10岁那年，善良的母亲还是把他送进了私塾。贫穷的生活只维持了司徒美老四年学费，14岁的他就不得不过早地为家中生计而谋划，他进了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当学徒。一个穷家的孩子在作坊中所遭受的磨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免受别人的欺负，司徒美老从师学武。满身的武艺，使他既学会了自卫，又培养了侠骨义肠、除暴安良的坚强性格。

1946年，司徒美堂在南京中央饭店

1882年，司徒美老靠着母亲东拼西凑的53块大洋做路费，抱着闯"金山"的希望，随同乡漂洋过海，到了美国旧金山。

当他们穿着中国土布便服，拖着一条辫子，形容枯槁地踏上旧金山码头时，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的脏东西抛了一身。"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第一个见面礼。"50年代司徒美老在回忆这一经历时，依然极为愤慨，"这种侮辱行为决非偶然，美国政府用钱雇些流氓打手，专任此无耻勾当"。

他在美国落脚后，几乎每天都要面临着流氓打手们的"无耻的勾当"。为了谋生，司徒美老先在旧金山一家中国杂碎馆当厨子。当时有的美国流氓欺侮华侨，不但喝酒吃饭不付账，而且还要打烂盘碗和柜面，甚至动手打人。华侨中胆小怕事的，也无可奈何，而他对此却极为愤怒。仗着年少时所学的"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莫能近"的武艺，每遇到此种情况，他都打抱不平。"见有流氓捣乱，三拳两脚，将之打翻，扔到街上"。他的这种除暴安良的义举，在华侨中广为传颂。17岁那年，他加入了以忠诚爱国、义气团结和互助互济为宗旨的华侨组织——洪门致公堂。

1894年冬，鉴于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无法更多地保护华侨的利益，司徒美老决定在堂内另立"山头"。凭着他的威望，堂内一些"少年气盛，敢做敢为"的人，很快集合在他的麾下。于是，他与阮本万等人，在波士顿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由小到大，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司徒美老被拥之为"大佬"，并在此后连续44年连任"安良堂"总理。这一举动，不但奠定了他在洪门中的领导地位，而且使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

"洪门大哥"孙中山来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司徒美老担任保镖，并成为孙中山得力的支持者

孙中山先生是在1904年到美国的，在此之前，他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当檀香山的致公堂把他要到美国的消息通知美国致公堂时，司徒美老的"安良堂"就决定，"要出钱出力帮助他完成反清的革命

事业”。

司徒美老与孙中山在波士顿见面后，“就约同洪门兄弟招待他住在旅馆里，每天叫菜吃饭”，极尽“兄弟们的义气”；后来，司徒美老又将孙中山接到家里，每天亲自上厨，为他做饭。孙中山外出时，司徒美老又充当保镖，保护他的安全，成了孙中山得力的支持者。

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国内急需 15 万美金重振旗鼓。在美国的孙中山为此非常焦急。司徒美老得知后想，这么大的款项，如果只让洪门兄弟 5 块 10 块地捐，不但难以短时间内解决，“缓不济急”，而且也“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于是，他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并发动洪门兄弟进行捐款。不几天，就把款项筹足了。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急于回国，司徒美老又与阮本万等人为他筹足了 450 美金的路费。

孙中山回国后，司徒美老又发动致公堂，向国内发回 300 多封通电，积极拥护他当大总统。孙先生对司徒美老的支持非常感动。在他就任大总统后，专给司徒美老发来一封电报，邀请他回国做总统府的监印官，司徒美老以“我不会做官”相推辞。后来，孙中山在回忆他的革命经历时，对华侨对革命的支持依然满怀感激，高度赞扬华侨为“革命之母”。

抗战爆发后，司徒美老发动华侨捐款支援国内抗战，抗战将领来美国后，他以“要打先打死我”的气概，进行保护；日本人欲胁迫他组织香港帮会，周恩来亲自组织营救；蒋介石给他到访必迎、出则搀扶、送到“第三道门”的“殊荣”

1931 年，日本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九. 一八事变”，美洲的华侨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司徒美老利用他在致公堂的地位，组织华侨集会，要求国民政府积极抗日。“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华侨们对十九路军的爱国抗战极为振奋，司徒美老等人积极组织华侨捐款支援。他们很快将募集到的款项，通过南京政府转给十九路军。在他们得知蒋介石把捐款扣下后，非常生气，后来再寄款时就注明由蔡廷锴将军“亲收”。

“一·二八”抗战后，被蒋介石排挤到福建的十九路军组织人民政府失败，蔡廷锴为蒋所逼要来美国。陈铭枢致电司徒美老，要他发动华侨进行保护。他立即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并保证安全。蔡将军来美后，不但受到美国特工的跟踪，而且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也收买了凶手准备行刺。为了保证蔡将军的安全，每逢蔡将军出入，他以“要打先打死我”的气概与之同行。他陪同蔡将军遍游美国 10 多个大城市，直到蔡离开美国。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到纽约后，司徒美老为防止国民党特务对他下毒手，特地派出“安良堂”精明强干的人员进行保护，并在杨将军离美赴英时，亲自到码头相送。“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司徒美老与华侨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继续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抗战。为此，他辞去了其他职务，专职在筹饷总会工作 5 年之久。他后来回忆，“八年抗战，纽约每个华侨平均额捐了 670 到 1000 美元，另外公债和杂捐不在内，额捐款项在 1400 万美元上下，都从中国银行汇给了蒋介石。”

与此同时，司徒美老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的联系，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自毁长城的分裂行为，呼吁团结抗战。司徒美老关心抗战、热爱祖国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的关注。

1941 年冬，国民党政府为了让司徒美老向海外华侨募集到更多的捐款，聘他为“华侨参政员”，邀请他回国观光。他也想就此机会了解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便向海外华侨进行宣传。12 月 2 日，司徒美老由美国抵达香港。一直关心司徒美老的周恩来，立即指示中共香港地下党，借宋庆龄为司徒美老接风洗尘的时机，向他透露一些国内抗日的真实情况。出席这次宴会的有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儿廖梦醒以及司徒美老之子司徒杜。席间，早年与司徒美老在美国相识并成老友的宋庆龄，详细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他听后恍然大悟，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在司徒美老到达香港一周后的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香港相继沦陷。为了预防不测，司徒美老由家中迁往他处。

一天早上，司徒美老外出散步，突然被几个日本兵和汉奸劫持到日军司令部。原来，在他到达香港时，洪门的兄弟在欢迎会上拍摄的照片落到日军手中。日军便利用照片，派人四处搜捕，想让他组织香港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在他被带到日军司令部后，司令官井琦亲自出面，威胁利诱。他严正地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据他的儿子司徒杜回忆说：“父亲后来对我们说：‘我一见到井琦就万分生气，立即想到在他们铁蹄蹂躏下的中国同胞。但为了应付，只得耐住火气对他们说：我已 80 多岁，腿脚又不灵，新到香港来，人生地不熟，还是另请高明吧。’当时，井琦再三请父亲考虑，父亲再不答话。最后，井琦问：‘你是住在司令部还是想回家？’父亲意识到他想把自己软禁在司令部，就严肃地对他们说：‘我如果住在你们这里，外边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全香港的人

恐怕都知道我被你们抓走了!'井琦连忙说:'不要误会。'当晚就派车送父亲回来了。"

当时,司徒美老的处境十分危险,为了营救他,廖承志、连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一切准备妥当后,立刻派地下工作人员避开日本宪兵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与司徒美老取得了联系。当司徒美老得知是共产党人要救他脱离险境时,十分激动地说:"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共产党向我伸出了关怀之手,可谓患难之交,终生不忘。"

就在井琦将委任状送到司徒美老家中的当天晚上,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开始了掩护他们父子离港的行动。司徒柱详细地回忆了脱险的过程:"我和父亲都化了装,父亲一向是穿西服的,这时改穿长皮袍;我穿短布衣,打扮成仆人模样。我们跟随廖承志先生派来的人,坐上'滑竿',黑夜到了九龙。然后徒步翻山越岭……,到了大埔,我们乘渔船由大埔前往广东的澳头(即南澳),……我估计,这渔船也是预先准备好的。船抵澳头时,立即有我党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来迎接。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1942年2月,司徒美老安抵重庆。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派出吴铁城、陈立夫等大批国民党要员到机场迎接,随即安排到中央饭店。虽然蒋介石夫妇先后三次会见司徒美老,并给以他到访必迎、出则搀扶、送到"第三道门"的"殊荣",但暗中却派人监视他的行动。在蒋介石听说他与进步人士接触后,"亲自警告我要中断与他们的联系,并提出要我参加国民党。"司徒美老回忆说,"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在中央政府中给我一个职位。我拒绝了,我说我要回美国去。当我行前告别离开他们的房间时,蒋和他的妻子继续阿谀奉承我并客套地送我到门口"。

司徒美老此次之行,对国民党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通过同周恩来等人的接触,也充分了解了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行动。

在司徒美老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到中央饭店来看望他,并特意带来了《新华日报》,让他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虽然是初次相识,但谈话却进行了1个多小时。周恩来热情谦和的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天后周恩来又在重庆办事处为司徒美老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中共南方局和陶行知等100多名知名人士出席了欢迎会。司徒柱回忆说:"周先生先致词,他盛赞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从财力物力上给了孙先生很大帮助。接着又说,在抗日战争中,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也出了不少力。他还称赞父亲是一位爱国者……然后父亲发言。他首先感谢这次欢迎会的召开,接着说这次回国了解了许多抗日救国的真实情况。回到美国后,他一定要把这些情况向侨胞宣传。最后,父亲感慨地说:'爱国救国,人人有责。今后我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为国尽力。'"欢迎会气氛热烈。会后,周恩来、邓颖超等又与司徒美老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1943年2月,司徒美老回美国时,周恩来又亲自前来送行,并嘱咐他将祖国抗日的重要性及抗日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侨胞。回美国后,他将在爱国华侨中募捐到的钱财,源源不断地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1945年3月,为了更好地集中华侨力量,支援祖国的抗战,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司徒美老将美洲的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美洲洪门致公党,并被选为主席。

司徒美老再次回国,蒋介石极为冷淡,并乘人之危,夺了他"安良堂"总理之职;周恩来再次伸出了友谊之手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司徒美老率美洲致公党代表回到上海,准备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组织华侨政党参与祖国的民主政治和建设事业。回国之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有蒋介石不予答复。对此,司徒美老并没往心里去。这班远离祖国的老华侨很天真,以为在8年抗战中为抗日出钱出力,特别是为蒋政府募捐卖力,海外归来,一定能得到蒋介石的热情招待。但事实并非如此。

6月21日,司徒美老由吴铁城陪同见到了蒋介石。忙于打内战的蒋介石似乎早已忘了这位他昔日待为上宾的朋友,只跟司徒美老寒暄一番,根本未作实质性的会谈。

不久,司徒美老一行人带回的费用用完后生活陷入窘境。为解决生计,朱树楠怂恿司徒美老,要蒋介石偿付抗战后期司徒美老在美洲宣慰华侨时所花掉的3万多美元的旅费。于是,司待美老在朱树楠的陪同下,亲往南京向蒋介石讨债。蒋避而不见,只让吴铁城应付。吴铁城当面拒绝说:"政府的钱不能给异党去用,你们组党,可到美洲去搞,为什么要回来!"司徒美老听后勃然大怒,他拍桌子摔茶杯,如果没有人拦着,他的拐杖也打到了吴铁城的头上。

此后,蒋介石变本加厉,在以后召开的洪门恳亲会上,乘这位洪门老人之危,派心腹夺了他"安良堂"总理的职位,在随后成立的"中国洪门民治党",他成了有名无实的主席。

在司徒美老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再次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与司徒美老有过密切接触的连贯回忆说:"6月23日,司徒美堂先生应中共代表周恩来的邀请,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董必武两位领导同志和司徒美老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向他介绍了抗战胜利后祖国的形势、解放区的民主气氛、

大生产运动的辉煌成果等情况。”

这次会谈，使司徒美老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因此，7月25日，司徒美老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重重阻挠，准时出席由中共代表陆定一及在上海的民主人士马叙伦、黄炎培等人在来喜饭店为他所举办的欢迎会。

欢迎会之后，周恩来又两次到司徒美老寓所，与他交换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主张和意见，并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会谈使司徒美老对蒋的所作所为有了本质的了解。1946年底，他断然拒绝任“国大”代表，并于次年到香港隐居。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8月12日，司徒美老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是主张”。这是他沉默一年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言。在发言中，他慷慨陈词，公开表示，今后“谁能解救祖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即馨香祷祝之。”10月，当司徒美老即将返美时，连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公开设宴为他送行。宴会上，司徒美老为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同一天，司徒美老出席香港中国致公党的饯别会。会后，应陈其尤之约，写下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声明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这一声明在司徒美老10月30日安抵美国后公开发表。

毛泽东亲笔复信司徒美老，并在双清别墅为他的到来准备一付藤椅做的“人工轿子”；万隆会议后周恩来行装未卸，即前来探望

司徒美老返美前致毛泽东的信，由于交通原因，1949年1月才转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当即致信：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司徒美老接信后，于8月9日从纽约飞往香港。在我党的接应下，从上海路经天津到了北平。不久，毛泽东便在双清别墅同这位爱国老人会了面。

由于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比较高，路陡难行，小轿车上不来，拜访毛泽东的客人，都是在香山下换乘吉普车才能开上去。毛泽东担心司徒美老年纪大了，不能坐汽车，便让警卫员准备一付担架，到坡底去接。

但是，警卫员匆忙之间，找不到一付现成的担架，非常着急。毛泽东便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让他们把他自己的藤椅来代替担架。在藤椅两边绑上两根扁担似的木棒子。这样，一付“人工轿子”做成了。

当警卫员下山接司徒美老时，毛泽东又特别叮嘱他们：“你们四个人抬的时候，一定要轻轻地一块起，抬上肩后步子要走稳走齐，不要让担架晃动。”

当警卫们轻手轻脚地将司徒美老抬到会客厅时，毛泽东已经在外面的台阶上等候。他大步迎上来，亲手将老人从藤椅上搀扶下来。

来到客厅落座后，毛泽东便对老人说：“你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帮过忙出过力，对人民有贡献，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

司徒美老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后说：“毛主席太谦虚了，与我平起平坐，没有一点架子，使我深受感动，不得不把内心深处的话掏出来说给你听。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平来，心里有种想法，主要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理解不深，认为共产党胜利了，现在上台了，我们这些人来是给共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这是我的想法，没有想到毛主席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毛泽东说：“我们以后要长期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司徒美老十分感动，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后，司徒美老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经常去各地视察，并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司徒美老在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时，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表示坚决拥护土地改革，同时对土改中华侨的土地和房屋提出了建议和意见。1951年春，他又从北京南下广东，亲自了解土改情况，并将沿途所见所闻，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给他回了信：

美堂先生：

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个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在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健康。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开完政协会后，素有功成名退思想的司徒美老曾想到香港或美国定居。他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让我做官，我没做。现在大会已经开完，我也要回香港、美国去了。"周恩来得知他的想法后，极力挽留。在周恩来的劝导下，司徒美老放弃了这一念头。

虽然新中国刚刚成立，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但对司徒美老的关怀仍一如既往。看到他自美国归来，无棉衣御寒，特意定做了一件名贵的皮大衣相赠；考虑到他年老足跛，特意让大会秘书处制作了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出席会议；即使司徒美老偶患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疾病，他也要抽空探望。

1955 年 5 月 7 日，参加万隆会议刚下飞机的周恩来，听说司徒美老患脑溢血生命垂危。他一改每逢外出归来都要先到毛泽东处汇报的惯例，驱车直奔北池子 83 号司徒美老家。

5 月 8 日，司徒美老逝世，周恩来立即指示华侨事务委员会廖承志、方方等筹组治丧委员会，安排有关治丧事宜。

5 月 9 日，司徒美老的遗体在中山公园入殓时，周恩来亲视含殓。

5 月 10 日，周恩来又在中山堂主持了首都各界公祭司徒美老大会。会后，周恩来亲自扶灵，将司徒美老的遗体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

（责任编辑　徐　鲁）

艺苑掌故新谭五则

朱继功

张伯驹重金购卖《游春图》

《游春图》为隋代画家展子虔(公元 550—604 年)所作。这幅画生动地描绘了许多士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赏春的情景。宋代书法家黄庭坚(山谷)看了此画作诗道："人间犹有展生笔，事物苍茫烟景寒，常恐花飞蝴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游春图》对唐代李思训等画家影响很大，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开创了"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新阶段。

《游春图》绢本设色，经历代皇家贵族及收藏家的辗转珍藏而保存下来。张伯驹先生购买这一稀世珍宝究竟花了多少钱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2 年的一天，伯老的夫人潘素女士为我详谈了当时购画经过。

她说，为了不使这件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决定从一位商人那里将它买下。当时卖主索价 220 两黄金，而且态度坚决，毫无商量余地。可是我们一时哪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后来伯驹决定将住宅卖掉。这所住宅在西城弓弦胡同 1 号，占地 13 亩，原系慈禧最宠爱的太监李莲英的产业。这样总算凑齐了 220 两黄金，可是那位商人嫌黄金成色不足，非要再补 20 两不可，我们明知这是敲竹杠，也没有办法，只得变卖一些首饰，因此买《游春图》共花了 240 两黄金。后来这所房子成为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

张伯驹捐献国宝

《平复贴》为晋陆机(公元 261—303)所书。陆机字士衡，《宣和书谱》说他"出身名门，祖陆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世皆奕奕，为当代显人。"对其文才云："自少以文章得名，初受知于张华，华谓人之为文恨才少，而机患其多。"提到书法则表惋惜："虽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平复贴》流传至今，成为我国书画艺术保存年代最早的书法珍宝。

据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告：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溥仪逃往青岛图谋复辟，将《平复帖》留给了在京的两个弟弟溥儒和溥德。1937 年，溥儒等为母治丧，急需大笔款项，欲将《平复贴》出售。张伯驹闻知后，唯恐此国宝流失海外，遂以 4 万元重金购得。建国初，王世襄动手撰写《平复贴流考略》一文时，欲借用此帖，张伯驹慨然应允，留在王世襄身边达一月之久。

1956 年 1 月，张伯驹将《平复贴》、《游春图》两件国宝，连同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草书卷、蔡襄自书诗册、范仲淹《道服赞卷》、吴琚书杂书卷，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等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

王季思教授跳船

中国古典词曲研究大家王季思教授，1925 年在东南大学学习时，得到著名学者吴梅先生的教诲。王季思选择《西厢记》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突破口。希望通过此书的研究唤起青年人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

据王季思的学生、中山大学教授黄天骥的回忆：其实，王老师自己，也是从《西厢记》获得反封建的勇气的。他不满家长给他安排的婚姻，另和徐碧霞女士相恋，决定"私奔"。那时，他俩悄悄买了船票，准备乘江轮逃到上海。到了码头，刚好碰到熟人，王老师只好停住脚寒暄几句，让徐女士先上了船。谁知汽笛一响，船几起锚，离岸盈丈了。王教师急了，飞奔向前，跃身一跳，竟跳上甲板。江上风急浪高，人们都替他捏一把汗。后来，"张生跳墙"，"王生跳船"，竟成了温州学人们的口头禅。

（**另两则见本期** 64 **页**、73 **页**）

报头变换光明日报曾起风波

●关　民

光明日报自1949年6月16日创刊到今天，已有47年的历史了。在这近半个世纪中，报头的字体只变了一次，由创刊时的民盟中央副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的亲笔手写体，变为现在的毛主席的“集字体”。本来，一张报纸报头字体的变化，应属常情常规，但光明日报报头字体的变更，却蕴藏着一般正常人难以想象和难以理解的内情。

创办光明日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建国前夕，毛主席在西柏坡找当时的民盟中央的负责人之一的胡愈之谈话时，提出新中国应该办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这张报纸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发表言论、进行思想学术交流和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的园地。根据这个意见，党中央支持知识分子集中的民盟办起了光明日报，民盟中央推定著名老报人胡愈之担任该报总编辑，并请沈钧儒题写报头。

沈钧儒系清光绪进士出身，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投身于制宪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35年，他率先响应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创建救国会和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党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加反蒋抗日的革命斗争，是国统区民主人士左 派的一面旗帜，我党的忠实朋友。难得的是，沈钧儒又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从颜鲁公而取雄浑丰茂；从苏东坡而取其峻峭奇遒；再由宋唐上追钟王。

由沈钧儒这样德高望重而又擅长书法的民主人士书写光明日报的报头显然是十分恰当的。1953年1月，光明日报由民盟中央主办改为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联合主办，以后又多次经历沧桑变化，这个报头一直使用到“史无前例”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据传有的同志曾考虑过光明日报在大鸣大放期间一度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为了恢复名誉，重塑形象，想变换报头，废弃沈钧儒的手写体，请毛主席重新题写。中国的报纸，从人民日报开始，许多报纸特别是党委机关报，大都是毛主席题写报头，这既是报纸的荣誉，又成了一种礼遇。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又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的字龙飞凤舞，挥洒自如，独成一体。请毛主席为反右以后的光明日报重题报头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传说毛主席不同意，他认为沈衡老（沈钧儒字衡山）的字很好么，为什么要变换？再说如果所有的报头题字都变成清一色的字体，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大意）这个传说光明日报一些老同志都听到过，是否完全准确尚待进一步证实，但不管怎么说，光明日报的报头一直使用到“文革”初期，与文汇报一起成为当代中国大报中少有的不是“毛体”的报头之一。

那么，现在的形似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光明日报的报头又是何时和怎么出现的呢？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它反映了“文革”那个不平常年代里人们被扭曲了的心态。

新的报头是1966年初期“文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出现的。1966年初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其锋芒指向“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他们庇护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一切牛鬼蛇神”。光明日报的读者对象和服务对象是知识分子，它主要反映、报道的教育、文艺、理论、学术战线，又被认为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黑线”长期垄断和“专政”的“重灾区”，这样在“文革”初期，光明日报自然首当其冲。加上光明日报特殊的历史所形成的人员比较“复杂”、知识分子成堆的特点，该报在劫难逃，被认定是宣扬“封、资、修”的大本营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麾下的一面“黑旗”。但历史往往错综复杂。正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大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成为“黑帮”纷纷被拉下马的时候，光明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却“稳坐钓鱼台”，他的地位反而上升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成员。报以人贵，这时的光明日报非常神气，一度扮演了执中国报界牛耳的角色，当然也就没有人想到要变换报头了。

矛盾就是这样尖锐：“文革”前的光明日报是“资产阶级的舆论阵地”，而它的主要负责人却是“通天”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因此“文革”开始后的七个月，光明日报社内尽管也有众多大字报，但揭批的都是其他人，没有一张有分量的大字报是指向报社主要负责人。这种矛盾的状况当然不会长久。不知什么原因，光明日报的那位主要负责人迁出了钓鱼台宾馆。红卫兵

小将闻风而动，把这位显然失势的主要负责人，顺理成章地与他主持下的光明日报捆绑在一起，他们准备进驻报社，放风要“揭开光明日报阶级斗争的盖子。”

正是在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关键时刻，为了挽救局势，一些聪明人想出了更换报头保报社的计策。“文革”不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把沿用了 17 年之久的沈钧儒书写的报头变换为毛主席题写，那无异是暗示世人毛主席肯定现在的光明日报及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否则毛主席怎么会在这个 时候为报纸题写报头呢？这样！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毛主席的大红保护伞下面，光明日报就可以安然无恙、度过难关了。但请毛主席题写报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种传说是找过江青。请江青转报毛主席，一种传说是没有找人，因为领导同志太忙，不宜过分打扰。反正不管哪个“版本”，毛主席没有亲笔题字是事实。

怎么办呢？又有聪明的人想出了一个现在看来是等而下之的办法，从毛主席的书信文稿中选取“光明日报”四个字用于报头！造成亲笔题字的假象。反正局外人，特别是老百姓只认毛主席的字，不会知道也弄不清其中有什么“机关”的。选来选去，终于在“文革”前毛主席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选出了这四个字。写信非比题字，不求规矩，比较随便。毛主席写作有的字特别大，有的字特别小，选中的这四个字也是有大有小。报头的字体是报纸的“门面”，要求规范、协调。这时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帮了忙，通过照相制版，缩小、放大，直到处理得四个字大小差不多才印到报纸上，这就是现在光明日报的报头。

不料变换报头字体又带来了新的麻烦？“文革”期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重千钧。既然毛主席通过题写报头的方式肯定现在的光明日报．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对报社是一个特大喜讯，光明日报为什么不发社论来表示感谢毛主席的亲切关怀？而光明日报实在有难言之隐，因为这四个字毕竟不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如果发表社论向毛主席致谢岂不有点错拜山门？万一被毛主席或红卫兵小将发现，那更是伪造毛主席题字。其罪大焉，反而会引火烧身。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在光明日报变换报头以后，立刻就有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前来质询：光明日报使用毛主席题写的报头为什么不发社论？如此对待伟大领袖是什么感情？它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进而怀疑并追查这个题字究竟是不是毛主席亲笔题写？……

不久，首都高校的许多红卫兵组织纷纷进驻光明日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矛头指向那位主要负责人，报纸在“文革”中掀开了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　萧　徐）

广　告

近视患者的福音　“近视按摩器”三个疗程（27 天）视力可有显著疗效。每套 27 元。“达克眼罩”用名贵中药配制，每天治疗 2 次每次 15 分钟，每套 49 元。“小孔眼镜”每副 10 元。“气功书”45 个图解，每册 4 元。以上产品，主治其假性近视，疗效显著。联系人：京春明、彦英春。

偏瘫复原丸和“灯盏花素片”　主治脑血栓疾病所致的瘫痪、半身不遂、面神经麻痹、语言不清、手足拘挛等疗效显著，偏瘫复原丸 10 个 38 元。花素片每个疗程两瓶盒 66 元，联系人：彦英正。

骨质增生的福音　“回春骨刺膏”用祖传秘方研制的新药。对颈椎、胸椎、腰关节等部位的骨质增生疗效显著。10 天为一疗程，药 费 88 元，5 个疗程可痊愈。联系人：春秋生。

哮喘特效药“消喘灵”　采用祖传秘方研制，治疗哮喘、气喘、咳嗽、气管炎、肺气肿等。三个月为一疗程可消喘，两个疗程可根治。月用药费 82 元。联系人：春秋传。

根除结核之神药“消核膏”　是治疗各种结核病的特效药，轻者一个月（一疗程）用药 1500 克 108 元，重者三个月可根除。联系人：京秋核

白癜风药显神灵　“白癜灵”和“消白灵酊”药，是当前国内外治疗根除各种类型白癜风的最佳良药，每日抹 2 次，7 天见效，病期长的半年可痊愈。白癜灵每瓶 28 元，消白灵酊每瓶 56 元。联系人：英春灵。

以上产品均有详细说明书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常期供货到 2005 年，无效退款。邮局汇款写清品名，石家庄市光明医药器械经销站（西里街 65 号）电话：(0311)3034140　邮编：050051

学习助记器学生的伙伴　获全国发明奖和国际博览会奖，巧妙地利用声、视、听觉的同步反馈，促进智力开发，排除外界干扰，提高学习成绩，每套 12 元，联系人：黄春助。

矮小青年增高有望　“快快长穴膜片”是日本川崎博士发明将穴膜片贴于腰部，一个疗程（20 天用 2 副 20 元）见效。“增长身高秘诀书”日本东京大学川田爱益博士所著，每天早晚练习 10 分钟；每套 8 元，“增长乐”冲剂一盒 36 元，半年均可增高 5　10 厘米，联系人：彦黄高。

毛主席纪念堂工程与天池山文物保护

●张志新

（一）

说到天池山，苏州人没有不知道的。到天池山的人，更没有不被这里宛如桃源的景色所迷恋、乐而忘返的。

但是，这样一处重要名胜，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经历过一场浩劫：高约数丈的华山大接引佛，被一炮炸成数块，倒卧山间，被荒草掩埋；清高宗乾隆数次跸驻的翠岩寺大雄宝殿一夜间被扳倒了墙垣，卸去了屋顶；铁佛被化成了铁水，铜钟不知了去向；天池山的数百间殿宇，弄得墙倒壁坍，满目疮痍。

所幸天池山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屋和历今六百余年的石造像没有被砸毁；天池、华山的奇石灵泉没有被炸毁；天池、华山的古树修竹没有被掘毁；大自然赋予天池、华山的数千年来形成的灵山秀水等自然景观依旧存在，这里作为人类文化遗存的精髓依然存在。它象一块璞玉，只要精心呵护和雕琢，仍可大放异彩，所以这处省级文保单位，仍是我们保护的重点。但是，1977年春天，为毛主席纪念堂采石——这被吴县人称为“一号工程”的任务，竟与天池、华山的保护发生了矛盾，这着实给我们文物工作者出了一道难题。

（二）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丧，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粉碎“四人帮”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在天安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前门之间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纪念堂工程总指挥部把纪念堂南北甬道和部分台阶的采料和砌筑工程交给了吴县。

1977年1月25日，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总指挥部杨云怀、沈文川同志在省、地主管领导的陪同下，来吴县落实任务，考察宕口。1月29日，吴县作出样石，派专人乘飞机送往北京。经刘道兰总工程师检验，选定其中细砂和莱籽砂两种花岗石为原料，要求工件斑纹均匀，石体无隐缝，无白帆石带，黑色云母斑点的直径不得超过2.5毫米，并当场绘制了“比色板”，要求按“比色板”的颜色统一选料。按总指挥部提供的规格，尺寸统一加工，其加工要求更为严格：石料正面及四侧上半部全部甲级錾细（錾光），底面及四侧下半部为丙级双细；錾细平面之误差在2毫米之内，錾细部位及线脚口角，不允许有超过1毫米的凹陷缺口；双细部位也不允许存在糙粒……建筑面积为3870. 4平方米，石料总数为4344块，总重量为3020.8吨。其中石料平面面积在一平方米以上的约占总数的三 分之二，石料的块料大，要求高，工期紧，这是一次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吴县县委对此工程十分重视，2月初成立了“毛主席纪念堂吴县石料工程指挥部”，并将此列为“一号工程”，由县委副书记梁传禄同志分工主管。指挥部由吴兴福、夏发余、徐筱棣等11人组成。吴兴福、夏发余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3月7日，藏书、金山、枫桥三个公社分别召开“毛主席纪念堂石料工程献红心动员大会”，动员石工2450人参战。会后，相继于金山之寿桃山宕、仙人宕，枫桥之田鸡山宕、乌龟山宕，藏书之大焦山宕、天池山之太阳山宕等宕口始采毛料。但是，由于“一号工程”对石料的要求十分高，开采出的石料不是色泽偏黄、有色斑，就是白帆石、云母斑大，不符合要求。莱籽砂的花岗岩矿源十分匮乏，只有天池山有这种矿脉，于是枫桥、金山两地的石匠都移地藏书，进驻天池山。

一场为“一号工程”献红心的大会战立即在天池山打响了。

（三）

1977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文化馆文物组的叶玉琦同志结伴前往枫桥狮子山和何山各文物点转转，上午结束了那里的工作，下午便取道白马涧，翻上了华山与天池山的分界岭——牛头岭。

站在岭上，举目西望，我们惊呆了：牛头岭下碎石成堆，天池坞里工棚林立；抬石的号子声，采石的丁当声响作一片……看到这景象，就如在我的脑门里放了一炮，上山时的遐想顿时烟消云散。在天池山采石，事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急急下山，来到寂鉴寺，这里经过“文革”的“洗礼”，仅剩韦陀殿、旱船等几处小屋，居住着本是寂鉴寺的和尚“教养”，和从白马寺、明月寺等处移居来此的“灵岩”、“悟真”、“真航”等四位僧人。这里作为吴县林场的护林点，他们现在是林场的职工，同时也受我们的委托，义务地看护着这破落的庙宇。“教养”见了我们，就象受尽了委曲的孩子，嗫嚅絮叨地诉说着近日来他们的感受：“门前的六棵大椐树挖倒了，树龄都在五六百年以上，本是省级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古树，要长成这样的大树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跟来倒树的人说了，这是省级文物，倒树的人说：这是林场批准的。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运石头要用大树筑栈道，……实际筑栈道只是用点边皮、枝条，大树干拿去木器厂做橹哉。……听说马上要放炮，把莲花峰、石鼓峰炸掉……天池山完了……。”“教养”一席话，我的心中充满了矛盾，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之情，“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对说真话的余悸，交织在一起。我是搞历史的，历来是“文官谏死”啊！在那个年代，只要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需要，谁敢说个不字，说“不”字也有悖于自己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哪！但借这一名目，去干非这一名目而不能办成的事，这就错了。“砍古树做橹”就是一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说来也巧，那几日省文管会的蔡述传同志正为验收古建筑维修项目住在苏州。当晚，我就找他汇报，想搬来省里的“救兵”。老蔡是古建专家，也是我学习古建的老师，平易近人，和蔼坦诚，早年他到过天池山，还写过寂鉴寺石屋的介绍文章，刊登在1956年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寂鉴寺石屋作为苏南地区元代石构建筑的孤例，其文物价值老师比我更清楚，与他交谈，我丝毫没有拘束，但老蔡听到“一号工程”与天池山保护的矛盾，也着实为之一怔。这是一个很棘手的矛盾啊！蔡老师如果为避免矛盾，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发，他完全可以不管这事，因为他来苏州并没有处理这一问题的任务，天池山的保护，可以由我们向省文管会的领导汇报，经过省级领导的协调，另派员前来处理，但是，这又要拖到什么时候啊！说不定文件刚送到省里，天池山已给炸了。于是，我们决定去冒一冒这“天下之大不韪”。当晚，我们商量了几套方案，向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申述理由，争取不破坏莲花峰、石鼓峰、“老僧礼佛”等景观；如实在不行，也要把天池山的石屋、石造像保下来。

第二天清晨，我们赶头班车来到天池山。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工程总指挥吴兴福和指挥部的其他几位同志。我向吴总指挥介绍了省文管会的蔡述传同志，说明了来意。蔡述传同志讲述了天池山文物的重要性，讲述了文物保护的政策……吴总指挥不等我们讲完，就操着浓重的常熟口音打断我们说：“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但是‘一号工程’时间紧，任务重，所要的石料要求严。现在金山、枫桥的宕口这种石料已经没有了，在藏书这地方也只是天池山有，如果我们在其他地方找得到这种石料的话，就尽量不开莲花峰，如果实在找不到，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想办法把石屋保护保护好了。”说完，他要指挥部的其他同志照应一下我们，自己又急匆匆忙别的去了。我们仍没有把话说透，没有得到十分满意的答复，继续在指挥部里向其他同志作宣传，讲道理，了解“一号工程”的情况，与指挥部的同志们沟通着感情。下午，又到寂鉴寺向“教养”“灵岩”交代了“任务”：“如果炸莲花峰，一定要告诉我们！”并检查了寂鉴寺后园的挡石墙，作好了以防万一的准备，这才悬着一颗心似地离开了天池山。

事后，我们所做的工作和吴总指挥的表态起作用了，莲花峰上凿好了炮眼也没有放。总指挥选派了好几位有经验的石匠选采点，在天池山北侧的太阳山找到了符合要求的石料矿脉，并决定扩大太阳山宕口的开采，从而保住了天池、华山的诸多景点。1977年5月3日，“一号工程”全部采石加工任务完成，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真正落了地。

吴县的“一号工程”现场作业，包括：采石，粗加工，精加工，历时87天，比预定交货期提前了一个半月完成，达到了北京总指挥部和省委提出的“提前，提前，再提前”的要求。5月24日现场安装铺设竣工。经专家验收全部合格，落成开放后，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在“一号工程”胜利完成的同时，天池、华山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并为日后的建设与开放奠定了基础。

在“一号工程”与天池、华山保护的矛盾面前，我们文物工作者一次考验：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否敢于言真，是否能够尽责尽力地去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这对地方各级领导也是一次考验，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弹好钢琴”，“统筹兼顾”，而不偏执一理的话，那么地方的各项事业都将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我们的工作定能做到，前对得起古人，后对得起子孙万代。

（责任编辑　洛　松）

粟裕对手李默庵谈“七战七捷”

●高建中

不久前，由南京军区政治部和江苏电视台联合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七战七捷》，已经在全国的一些电视台陆续上映。这部电视剧，反映了解放战争初期，在苏中，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粟裕部以4万人迎战国民党军队12万人的进攻，取得“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的战斗过程。

当时，国民党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也就是说，李默庵便是当年粟裕将军作战的对手。

如今李默庵老人还健在。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生，经历过东征、北伐和蒋介石与新军阀的历次大战；经历了对红军的第三、四、五次“围剿”作战；抗战时期，他在著名的山西忻口会战中担任左翼地区队的指挥官，后任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在浙境接受日军投降；内战爆发后，他接替汤恩伯第三方面军司令官，不久，改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9月，他随程潜到湖南工作，任湘赣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在湖南起义，中间出走香港，后在香港再次通电起义；1950年，他移居阿根廷，后移居美国；1990年从美国回来在北京定居，现任全国政协第八届常委、黄埔军校的同学会会长。

今天，读者能从李默庵先生的视角看一看粟裕大将所称的“七战七捷”一定会颇感兴趣的。

就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提起当年的作战经过，李默庵首先介绍有关的历史背景，他说：

“蒋介石决定全面发动内战，起用陈诚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根据蒋介石的部署，陈诚拟定的初期的作战方针是：集中兵力，迅速消灭山海关以内的解放军之主力，控制津浦线、平汉线，稳定江南，确保华北，为了确保作战的胜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各战区的部队和官长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陈诚担任了参谋总长以后，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自知很难与他配合工作，主动提出辞职。而陈诚为了指挥顺手，当即同意他的请求，调他去任南京卫戍总司令。接着，陈诚提名由我来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我接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没几天，第三方面军改为第一绥靖区，我即改任第一绥靖区司令。

“当时，长江以北地区国民党军队仅占领着南通、江阴、扬州等地。其他地区如黄桥、如皋、海安等地，为解放军占领。我印象很深的是，长江的船只往返，国民党军队只能靠南边行驶，北面航线由解放军控制着，双方时有摩擦，这使南京政府感到很不安全，面子上也很不好看。所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是要下决心攻占苏中和苏北的。

“我是1946年6月底到无锡上任的，当时，国防部下达给我的作战任务便是占领苏中、苏北解放区。战斗分两个阶段进行：先是要攻占东台、兴化、高邮以南地区；后攻占盐城、阜宁、淮阴地区。部队有5个整编师（原为军的编制）、两个旅（原为师的编制）和两个交通警察大队，总兵力12万人。

“为了实现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我拟先集中兵力，攻占黄桥、如皋、海安、李堡等地。与扬州、泰县取齐，搞好这些地区的交通、补给、通讯等，然后再向北行动。

“为了慎重起见，我专程到南京见过陈诚，并与国防部次长刘为章进行了研究，作战计划获准后，我即在无锡的司令部召开了作战会议，那时，国民党军队的高级指挥人员，凭借着良好的军事装备和众多的军队，并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他们多数没有与解放军作战的经验，还不知道解放军的厉害。整编第八十三师战斗力较强。师长李天霞信心百倍地说，我的部队没问题，一个团便可以和解放军干一下！我是有过与红军作战的经验的，知道对解放军不可低估。于是我在会上提醒大家说，解放军作战一向机动灵活，粟裕部久踞苏中，熟悉地理，且又善于发动民众。此次进攻，切不可马虎大意，须稳扎稳打。各部队之间，要密切配合，精诚团结，

务必要一举成功。

“会后，根据作战的需要，我决定将司令部前移，设在常州，并且亲自勘察了地址，选定在常州东南角的一所旧式营房内。

“我的这一次作战，特别得到了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帮助。当年，他和我同在陈诚的第十一师当旅长，我到南京受领任务时，他主动提出要为我配备一架小飞机用于指挥作战，我高兴地接受了。那架飞机很小，只能乘坐两个人，但有了这架小飞机，为我指挥作战方便了许多。

“经过周密的准备，7 月 9 日，我又在常州的司令部召开了作战会议，确定在 7 月 13 日对解放军发动进攻。会上，我下发了油印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做好一切进攻准备……”

李默庵部进攻的目标便是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部队有第一师、第六师、第七纵队、第十纵队共计 19 个团，约三万多人。后补入第五旅（三个团）和华中军区的特务团等部队以及新建立的第十纵队和军分区的两个团。

第一战：泄露天机 就地遇挫

李默庵回忆说：“我的作战计划下达之后，万万没想到，7 月 12 日，我突然接到了蒋介石亲自打给我的电话，要我暂时停止 13 日的进攻。事情来得很突然，我不知原因，但只有照办。事后我才了解清楚，原来是我部的作战计划泄密了。7 月 11 日，我下发的油印作战计划，不知何故，被摆到了调解国共和谈的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办公桌上了。更有意思的是，比马歇尔早一天，也就是我召开作战会议第二天，华中人民解放军便获得了同样的情报。

“马歇尔拿到了我部的作战计划，立即去见蒋介石，他向蒋问道：‘我得知你们要进攻苏中解放区，有这件事情吗？’蒋一口否定，说没有。于是，马歇尔便拿出了我部的作战计划，弄得蒋很难堪。

“时隔多年，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我的作战计划是怎样泄密的。那个时期，抗战胜利不久，各个部队的保密观念很淡薄，司令部的各种人来来往往，泄密事件的发生，并不奇怪。问题是由于我部作战计划的泄密，导致了我部不能够按计划行动。而在这时，粟裕部首先向我发动了进攻，苏中作战一开始，我便遇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7 月 13 日下午 3 时左右，我接到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的电话，他报告说，据侦察，解放军的主力 正向宣家堡、泰兴城两地进逼，可能要先发制人，我即命令他严密监视，然而到了黄昏，战斗打响了。苏中作战就是这样开始的……”

宣、泰之战，粟裕集中了全部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和第七纵队向整编第八十三师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三旅的一个营发动围歼，大获全胜。战斗开始时，李天霞报告李默庵说：“我这两个团的团长打仗有办法，请司令官放心。”而到了半夜，他便改口说，解放军攻城猛烈，宣家堡还能支撑，泰兴已被攻破。李默庵命令他派队支援，援军却在半路遇阻，到了天明，李天霞和这两个团基本被歼。

李默庵说：“事后，我记得李天霞向我报告说，他的两个团吃了亏，但是，建制还在，还有战斗力。我就没有追究他。”

那么粟裕何以主动发起进攻呢？首战又何以选择蒋军的战斗力最强的整编第八十三师呢？

后来，粟裕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是否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否！自 5 月下半月，敌军已侵入我东北的四平、长春、永吉，6 月敌人又集中 30 万大军对我中原第五师发动了围攻，已经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而在华中方面，自从停战令生效以来，国民党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我解放区的蚕食……‘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给敌人以反击是顺理成章的。”

“……整编第八十三师原番号是第一百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的基本部队。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日战争后期作为远征军到过缅甸作战，战斗力较强。首战打这个强敌是否没有根据？不！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会主动地向他们攻击，并且到他们的出发地去打。我们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

第二战：攻占如皋 侧后受挫

战斗既然已经打响，蒋介石的国防部紧急通知李默庵按照原定计划，向如皋、海安地区发动攻击。李默庵回忆说：

“7 月 16 日，我命令各部投入战斗，严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一举突破，那时，我采用的打法是正规作战的分进合击战术。我的司令部仍然设在常州，以两部美式电台指挥作战……”

担任主攻如皋的是整编第四十九师王铁汉部。该师是分左、右两路沿南通至黄桥的公路攻击的。17 日，左路第七十九旅文礼部抵如皋以南的杨花桥、宋家桥一带；右路王铁汉亲自率领的师直属队和第二十六旅

抵如皋以东丁堰一带，左右两路对如皋形成夹击之态，准备于次日联合发起攻击。

然而，18日，粟裕部突然出现在整编第四十九师的侧后，并于当日晚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粟裕以第一师主力抢占东南公路上的林梓，从右路向敌第二十六旅发动了攻击；以第六师主力抢占了杨花桥西南的贺家坝，从左路向敌第七十九旅发动了进攻；另以第七纵队主力向东南出击。三路合力，拟全歼王铁汉部于如皋东南地区。另以第一师、第七纵队之两个团阻击向横桥进攻的敌李天霞部；以第六师两个团阻击向黄桥进攻的敌第九十九旅朱志席、整编第六十五师李振部。李天霞、李振和朱志席等部队，是李默庵安排随整编第四十九师 右后方跟进，以助攻如皋的。

战斗一开始就进行得很激烈。右路王铁汉率直属队仓促迎战，就地依托村庄转入防御，由于粟裕主力部队攻击猛烈，王部损失很大。19日拂晓，第二十六旅阵地被突破，王铁汉组织反击得以巩固。到了晚间，该阵地再一次被攻破，第二十六旅败局已定，王铁汉率少数部队突出包围。而在杨花桥一带的第七十九旅依托有利地形苦力支撑，战至21日下午，整编第四十九师的后续部队赶到，这才转危为安。

李默庵回忆说："进攻如皋的部队遇阻后，我曾采取多种处置，亲自打电话与南京政府联系，请他们派空军助战：亲自与王铁汉和文礼通话，叫他们坚持顶住；同时，督促其他部队按计划加速行动，以解该师被围之困。21日整编第八十三师进到姜堰以东马沟附近，整编第六十五师进到搬经镇以东地区。22日，第一O五旅也全部赶到了杨花桥一带。黄桥、南通两方面兵力接近会师。鉴于此种情况，粟裕部于23日拂晓放弃对第七十九旅的进攻，向如皋以北方向撤离。随后，我第七十九旅和第一O五旅马上转入反攻，趁机攻入如皋城。

"我部虽然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基本上是按照计划达到占领如皋的目的。部队进城后，我即令我的参谋罗觉元带领人员和电台、电话到城里建立前进指挥所，并令驻城部队巩固据点，储积粮食和弹药，维修公路，准备再战。"

原来在宣泰地区作战的粟裕部主力，为何又突然出现在如皋东南攻击李默庵的部队呢？粟裕在回忆文章中讲到：宣、泰之战结束后，"敌人以为我主力在西边，第四十九师将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我军来一个长途奔袭，创造歼敌于运动中之良机，将陷敌于被动混乱的境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军必须打得、饿得、跑得，能够连续地打仗、行军、打仗，而这正是我军的特长。7月15日晚，(我)即令第一师全部和第六师大部转兵东指，并用汽艇急运第七纵队一个团先期赶回如皋，协同第一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残敌，给敌人以我主力确实还在西边的错觉，引诱如东之敌放胆向如皋进犯。我第一军分区部队连日英勇阻击，为主力的长途东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主力在连续两昼夜激战后，又急行军一百几十里，表现了高度英勇顽强的气概，一路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夜过黄桥，群众以烧饼和西瓜争相慰问。在群众的封锁、掩护下。敌人还蒙在鼓里。"

战斗的过程如前所述。战至23日，粟裕见"部队已连续作战十天，相当疲劳，而且敌人第二梯队在陆续北调，如继续与当面之敌纠缠对我不利。为保持主动，如南战斗结束后，我主动撤离如皋城。"

第三战：
攻打海安　占领李堡

海安，是苏中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攻占海安，便可以沿角斜、李堡、姜堰、泰州形成封锁线，巩固苏中南部占领区，确保长江下游的占领区。基于此种战略考虑，李默庵回忆说："我在拿下如皋城后，即刻调整兵力，一方面驻守如皋、林梓等地；一方面对进攻海安做出部署，安排部队，一路由南向北，一路由西向东，分进夹击……"

对于海安之战，粟裕在回忆文章中讲道："我们的部署是：第一师、第六师集中在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待机歼敌；第七纵队在海安外围打运动防御战。""海安运动防御战从7月19日打到8月3日。第七纵队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所属4个团只有一个团打过大仗。但是，4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3000多的兵力，英勇抗击了5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4天多，伤亡仅2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十五比一的新纪录。仅7月31日夜，对敌人的巧妙袭扰，就使敌人消耗了炮弹万余发。8月3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七纵队主动撤出海安。"

李默庵回忆说："攻打海安，我没有听到部队报告说花费什么周折，经过两天多的时间，打了一下，整编第六十五师便占领了海安，第一O五旅占了李堡，其中部队受损失的情况，他们向我汇报过，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得了。"

第四战：
交接防务　李堡失利

李默庵回忆说："我部拿下了如皋、海安、李堡，实现了进攻苏中的战略目的，在我看来，是取得了胜利，当时，部队也纷纷向我报捷。我的司令部向我报告说，

粟裕部已经损失二三万人，大势已去，我也分析，粟裕部向北撤退，一时不会有大的行动，即加紧时机命令部队沿泰州、姜堰、海安、李堡及角斜至海边建立东西防线。”

为了加强防务，李默庵命令新编第七旅派该旅第十九团附炮兵辎重部队于8月10日从海安向李堡前进，接替第一O五旅遗留的防务。19时，天将入黑，第十九团刚接替防务完毕，警戒还没有派好，工事也还没有做好，突然发现强大的解放军分路向李堡包围攻击。该团团长介景和觉得天色已黑，部队难以转移，决心固守李堡村，等待天明新编第七旅从海安来援。谁知半夜23时起，粟裕部以强大的兵力向李堡村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经过两三个钟头的战斗，该团阵地就全被突破，部队大乱。介景和欲组织第一营残部于李堡的东边掩护其他残部向附近的杨家庄第三一四团阵地以南地区撤退，但因为受到解放军的重重包围，始终没有突围出去。至11日拂晓前6时许，该团全部被歼。

随后，驻杨家庄的第一O五旅旅部和第三一四团也受到了粟裕部的猛烈攻击，到11日下午两点钟，该团被迫向西南突围，旅长刘玉山率残部退回如皋城。

8月11日4时许，新编第七旅旅长黄伯先率第二十一团由海安出发，向李堡增援。7时许，先头部队即与粟裕部接触。此时的黄伯先还以为是第一O五旅在向海安前进途中与解放军发生了遭遇战，决心夹击解放军。命令部队继续急进。不料，粟裕部早就安排部队在中途伏击他们。12时许，黄伯先的部队进入了被伏击的地带，顿时感觉不妙，但为时已晚。他前进不能，后退无路。几次突围均被解放军打了回来。17时，粟裕部发动了猛烈的总攻，不到一个钟头，第二十一团就被全部歼灭了。仅黄伯先率残部几百人脱离包围圈，退回了海安。

那么，粟裕又是怎样抓住战机的呢？原来，粟裕率主力后撤，仅至海安东北一二十里。由于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人员和物资很快得到了补给，另在民兵的帮助下，封锁了消息，未让李默庵部发觉。而李默庵命令新七旅接替第一O五旅防务的命令，却为粟裕所“密悉”，于是，粟裕当机立断，集中兵力，“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之中”。

第五战：
腹地受敌　“交警”败退

李默庵回忆说：“李堡战役之后，我鉴于兵力消耗较大，部队疲惫，暂时放弃了在李堡、角斜一带建立封锁线的打算，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把重点放在了扼守南通、丁堰、如皋、海安沿线，加强对海安、泰州以南的‘清剿’和防御上，以巩固占领区。然而，到了8月21日，我封锁区的腹地丁堰、林梓一带的部队，又遭到了粟裕部的攻击……”

驻守在丁堰的是交通警察第七总队，驻守在林梓的是交通警察第十一总队。21日晚9时，这两个总队先后遭到了粟裕部的突然袭击。第十一总队凭借工事进行抵抗，打到第二天过午，粟裕部增加兵力猛打猛冲，下午5点钟，阵地全部被突破，部队丧失了战斗能力，只有向南撤退。第七总队抗拒了一夜，到了第二天的10点多钟，阵地也被突破，部队也被打垮了。他们只有一个大队（约300人）撤往东陈，与驻守在那里的一个大队合并在一起，但是，紧接着又受到了粟裕部的攻打，只有败退如皋。

李默庵回忆说：“我原以为这两个部队的火力很强，又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各自守一个据点，是有把握的。我对他们原本是放心的，他们受到攻击时，还在电话中满不在乎地向我报告说，不要紧，可能打上一两个钟头就没事了，后来战况转为危急，电话不通了，无线电呼叫不灵，我也无法处置，只有听任他们独立作战。”

丁、林之战，按照粟裕的说法，是采取了“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的战术，李堡战斗结束以后，中央军委电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粟裕分析交通警察部队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忠义救国军”改编的，以恢复交通为名，专门进行公路沿线的解放区的“清剿”，他们虽然全部配备了美械自动火器，但是重装备比较少，缺乏正规的作战经验，于是他和谭震林分别带领主力部队，大胆插入敌人的腹地，“16个团3万多人夜行军，连家犬惊吠之声都难听见，敌人当然更无从知晓。”从而，出奇不意地消灭了“交警”。

第六、第七战：
援如遇挫　攻邵未竟

粟裕部与李默庵部的“七战七捷”，第六、第七两战是同时进行的。粟裕称之为“攻黄救邵”。

这两战的大体情况是，丁、林战斗进行之际，由宿县地区东进的邱清泉第五军占领睢宁，进逼淮阴，为策应第五军作战，李默庵根据国防部的指示，派驻扬州的整编第二十五师沿运河北上，攻取江都县邵伯镇。

粟裕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即采取“攻黄（桥）救邵（伯）”之战术，决定以新组建的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两个团在邵伯防御。主力部队除以第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牵制性进攻外，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等3万余人大踏步机动，由丁堰、林梓越通榆公路向西开进，用攻其必救的办法，寻歼李默庵部于运动之

中，以解邵伯之围。

李默庵回忆说："发生在丁堰和林梓的战斗打断了我南通至如皋的交通线，如皋城成三面被围的态势，司令部向我报告说，如皋兵力单薄，如果粟裕部进攻如皋，守城部队恐怕难以坚守。于是，我令驻如皋前线指挥所主任罗觉元，转告王铁汉师加强防卫，同时，我命令驻黄桥的整编第九十九旅（欠一个营）东进如皋，加强防卫力量。该旅旅长朱志席接到命令后，很担心在开进途中遇到解放军的袭击，要求如皋方面派队前来接应。我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做了周密的部署。结果还是遇到了解放军的打击……"

8 月 25 日，如皋王铁汉整编第六十五师按照李默庵的命令派驻海安的第一八七旅全部、第七十九旅的一个 团和第九十九旅留驻如皋的一个营分三路接应前去增防的第九十九旅。第九十九旅则离开黄桥启程东进。按理说，这样的部署是万无一失的。

不料，第九十九旅离开黄桥在公路上开进不久，部队刚从集合队形拉成行军队形，已经赶至黄桥附近的粟裕部队主力便从道路两侧向第九十九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战斗从早晨 8 点钟开始，越来越激烈，至下午两三点钟，该旅与前进指挥所的联络中断……

黄桥至如皋 60 华里，自如皋方面前来接应的部队，原来以为不会发生什么情况，动作迟缓，这边的战斗打响以后，李默庵当即命令王铁汉亲自指挥部队火速赶往支援。王铁汉即率第一 O 五旅的一个团出发，于中午 12 时左右赶到了谢家店附近，这时，原来安排接应第九十九旅的三路部队，各距第九十九旅约十华里左右，可以听到前方的枪炮声了。王铁汉命令各部加速前进，不料，就在这时，解放军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三路部队，很快便被粟裕部分割包围，相互的联络也中断了……

李默庵回忆说："我得知这一情况后，深感不妙，急得直跺脚。第九十九旅的旅长朱志席是黄埔三期同学，北伐中，我当第六十五团团长时，他曾经担任我团的排长，第九十九旅也是一支比较能打仗的队伍，该旅陷入重围，我格外着急。更令人担心的是王铁汉，不仅没有指望上他的增援，相反，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尽管我不断打电话要前进指挥所通知王铁汉放胆前进，不要迟疑，但前进指挥所与王铁汉失去了联系，我的命令传达不过去。在紧急情况下，我急调驻扬州的整编第二十五师的一个旅乘汽车火速增援第九十九旅，但是，未等到援军赶到，26 日，第九十九旅全军覆灭，旅长朱志席被俘……"

再说粟裕部歼灭了第九十九旅后，立即抽调主力围歼王铁汉各部，到 27 日上午，王铁汉各部被打散打乱，仅有部分部队退回如皋城。

以上是粟裕对李默庵的第六次作战。

粟裕部对李默庵部的第七次作战，是在如黄路的战斗同时进行的坚守邵伯的战斗，整编第二十五师自 8 月 23 日向守卫大邵伯、丁沟、乔野一带的粟裕部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邵伯是水网湖泊地区，地域狭窄，整编第二十五师难以展开作战。粟裕部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战至 26 日，乔野一带阵地被整编第二十五师突破。李默庵获悉，即令该部集中兵力攻取邵伯主阵地。恰恰在这时，传来了第九十九旅被粟裕全歼的消息，整编第二十五师深受震动，军心涣散，李默庵也察觉到再战下去，难以取胜，遂下令将整编 第二十五师撤出战斗，回了扬州。粟裕的作战意图得以实现。

苏北作战　进出盐城

李默庵的第二步作战计划，是进出盐城、阜宁、淮阴，与占据徐州一带的薛岳部会合。根据战局的发展，国防部指示李默庵于 11 月中旬开始向北进攻。李默庵回忆说：

"此次行动，我以整编第八十三师李天霞部打头阵，以整编第六十五师李振部随李天霞部右侧跟进，第八十三师兵出海安，经富安、梁垛，于 11 月底攻占东台县城。后在草埝一带，与解放军打了一次小仗，渡过了河，继续北进。随后，前进指挥所前移到了东台，我即到东台指挥作战。

"12 月 8 日，第八十三师北进到了盐城以南的伍佑场一带。在这里，遇到了解放军的猛烈阻击……"

伍佑场是个 2000 余户人家的小镇，镇东南，环绕着一条小河。李默庵回忆说："解放军依托这条小河，沿岸布置工事。李天霞师集中炮火，组织部队强攻了数日，打不过河去。11 日，我带司令部人员坐吉普车赶到了卞仓，进入李天霞的指挥所坐阵指挥，并且叫来了李振共同商量对策。

"李天霞向我汇报说，该师已经展开了两个团，在正面攻击的是第五十七团，已经集中炮火打毁了不少的房屋和解放军的工事，他的步兵发动了几次攻击，均接近解放军的工事，但是，就是攻不进去。他还说，现在发现右翼方面，有解放军的部队在运动。

"我对李天霞部对伍佑场久攻不下很不满意，乃决定由李振第六十五师投入右翼，加强攻势。李振师也展开两个团，但是由于当地水田密布，他们找不到渡河攻击的空隙，难以实施。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徐州绥靖公署的通报，说苏北涟水、阜宁方向的解放军正向盐城移动，同时，我又

接到南京国防部空军侦察报告，说已经有大量的解放军在沿公路向盐城和阜宁南下。根据这些情况，我分析，解放军有可能增加盐城的兵力以图固守。我为了查明情况，第二天，乘小飞机亲自到盐城的上空察看，发现确有大量的解放军部队在向南移动，其先头部队已经在盐城东南方向的河流上架起了数座浮桥，我看态势很明显，解放军增加兵力不仅是为了固守，而是对我进攻盐城的第八十三师和第六十五师实施包围。

“我回到指挥所，约是10点多种，马上就接通了李天霞的电话，我问：你有没有把握迅速拿下伍佑场？李天霞说：没把握。我又问：你部队的粮食够吃几天的？李天霞说：仅够吃两三天的。此刻，原拟调驻扬州、高邮一带的黄伯韬整编第二十五师正在北上，队伍虽已出发，但是，赶至盐城尚需要两天，而我分析，解放军则有可能于当夜对我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六十五师实施围歼。

“我的这两个师一共有4万人，正处于四周河港交叉的不利地形之内，很容易被吃掉，情况十分紧急。于是，我决定立即将部队撤出战斗，撤退的地点选择在距伍佑场以南30里的刘庄一带。刘庄正北有一条拱形公路，可以凭借这条公路对南下的解放军实施防御作战。

“我的决心既定，立即打电话给李天霞和李振，分别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撤退的公路只有一条，两个师不能同时行动，我了解李振师是广东的部队，这个部队的特点是进攻时冲得快，后退时跑得快，于是，我让李振师先撤，并再三叮嘱李天霞布置好部队后撤时的掩护工作。这样，中午12点钟开始行动，至夜晚，两个师全部撤了下来。李天霞师后撤时，命第五十七团担任掩护。解放军发现了我部在后撤，即发动了猛攻，第五十七团损失了约有一个营。

“我部的两个师的后撤行动立即被南京国防部得知，国防部次长刘为章当即与我通话，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按照作战的纪律，未经请示而后退，是不允许的。于是我答复他说，部队的行动，并不是后退而是在调整，此事在电话中说不清楚，国防部可派人来了解。第二天，国防部便派来了汤恩伯，我向汤恩伯讲明了后撤的过程，他表示理解和赞许，认为我处置的是及时、正确的。国防部也就没有再追究什么。

“我们撤退到了刘庄，解放军并没有跟进，这时，整编第二十五师赶到了东台，我遂决定再次对盐城发动攻击。经过国防部同意，以整编第八十三师、整编第二十五师并肩向盐城分进合击，整编第六十五师作为预备队。

“大约是在12月26日黄昏，我的这两个师拿下了盐城。当时，解放军发现了我已经增加了部队，又由于涟水方面战局发生了变化，大部分主力都北撤了。所以我拿下盐城，并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我部占领了盐城，苏北作战计划得以全部的实现，国防部调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五师继续向阜宁以北进攻，因为盐城以北为徐州绥靖公署的防区，薛岳派欧震来办理交接。我也巴不得做此交接。草草办理了一下，我就回到了南通司令部。”

战果、战术、战斗力及其他

苏中之战，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回首往事，李默庵无限感慨。他说：

“粟裕将军已于1984年溘然长逝，我们之间的这场战争，写在了各自的历史上，当时，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也不完全一样。

“关于战果：苏中的七次作战，粟裕称为‘七战七捷’，消灭蒋军6个半旅，我记得国民党军队的统计，上报给我的是5个旅左右，损失4万余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不少官兵被解放军俘虏以后，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我们还损失了不少的武器装备。但是，由于双方的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的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最终还是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一点上看，我部是达到了作战目的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比较多，损失一些，实属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

“而在解放军方面，他们作战的主要目的是以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为主，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经过几次的战斗，粟裕部以较少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较多的部队，从这一点上看，粟裕部是胜利的。特别是粟裕卓越的战斗指挥艺术很值得总结。

“关于战术：苏中的七次作战，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就国民党方面来说，我采用的是正规战，即分进合击，稳扎稳打。照这样的打法，粟裕部的三四万人，只能防御我的一路部队的进攻，不是我们的对手。可是粟裕却集中兵力打我一点，而且，有时是集中五六倍的优势，这样，我的部队就吃不消了。这样的打法确实很厉害，实际上，这种打法，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打的。我记得当年我在江西‘围剿’红军，红军也是这样一种打法，概括地说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打则必胜。毛泽东的战略很高明，我曾经反复研究过。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打法，只

1947 年粟裕(右)陈赓在一起

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因为解放军作战有地方组织和地方群众的支持，打起仗来，民众主动为他们站岗放哨，提供情报，所以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很容易摸清楚。再者，有了民众的支持，可以及时补充兵员和物资，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我在同粟裕的作战中就很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的每一步行动，粟裕都了如指掌，使他把握住了作战的主动权。而在国民党军队来说，由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很难了解解放军的情报，我们的作战地区，水田多，下雨多，路很不好走，运输是个很大的难题，这也是削弱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想起来，当年我参加东征、北伐、抗日，也曾经经历过民众积极支持军队作战的热烈场面。当然，民众是否支持军队，与军队的纪律好坏有关。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即所进行的战争是不是符合民众的愿望。蒋介石发动的内战，遭到了民众的极力反对，作战当然就很难以取胜了。

"关于战斗力：苏中作战，国民党军队投入了 12 万人。而粟裕不过是 4 万人；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大炮、汽车等先进装备，不少装备是美国援助的，如汤姆式冲锋枪等，解放军不过是些普通的机枪、步枪，很少有炮，没有汽车，更没有飞机。从表面上看，国民党的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解放军。

"但在实际上，国民党的军队有许多的缺陷，比如，一是各部队的战斗力不整齐，有的好些，如整编第八十三师、整编第六十五师、整编第二十五师等。有的是拼凑起来的队伍，如被粟裕部吃掉的新八旅，是四川过来的，很不禁打，被吃掉在预料之中。和粟裕部比较起来，队伍不整齐。二是战斗作风不一样，国民党的军队打正规战，行动循规蹈矩，思想麻痹大意。有些指挥官骄傲自信，没有把解放军放在眼里，结果吃了大亏。三是高级指挥人员控制部队的能力有相当大的差别。国民党军队的高级指挥人员，很难亲自到一线上指挥，比如我，当时一直在常州，基本上是隔江遥控指挥作战。而粟裕却和部队在一起，有什么情况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后来我从材料中看到，粟裕为了处置作战情况，一夜之间，乘车、骑自行车，接着乘船赶路 300 余里。这种精神，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则根本不可能具备的。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而解放军的劣势就变成了优势，战斗的结果就自然不一样了。"

最后，李默庵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但是他借以忽视全国人民饱经战争苦难，亟思和平安定之共同愿望，仍采取战争政策，至遭众弃，走上了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由兴起全胜到衰落而败亡的老路。全国解放前夕，我看到旧的时代过去了，在这个大时代的转变中，如果我们仍不觉悟，仍坚持固有的路线，必被时代潮流所淹没。因此，毅然在湖南参加了和平起义。我衷心地希望，在我们中华民族内部，再也不要发生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了，我也衷心地希望海峡两岸捐弃前嫌，尽快地实现和平统一。"

(责任编辑　洛　松)

艺坛猛士 政治漫画家

米谷

●沈云汉

（一）富商家的独生子，却无意做买卖，而成了艺术的追求者

米谷原名朱禄庆，学名朱少华，朱吾石，1918 年 11 月 5 日，米谷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斜桥镇上的一个富商之家。

他 4 岁丧父，由寡母蒋云仙抚养长大。

1931 年，14 岁的米谷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于斜桥小学，按母亲的安排他考进了海宁县城里的乙种商校，打算读完三年商科后，即回家掌管店铺，做个安分守己的店老板。

按当地有钱人家的子弟普遍有早婚的习俗，母亲也为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县城里官宦人家的女儿张笑英。笑英毫无闺阁千金的那种娇气，而是性格开朗、热情大方，又喜欢体育运动的"新女性"。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师生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小学时代学过铅笔画、水彩画的米谷参加了宣传画绘制组，在临摹、放大报刊上的宣传画中，大家发觉他很有美术才能，艺专毕业的美术教师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于是从创作技巧和美术理论上引导他走上了艺术之路。米谷没有辜负老师的用心，到初中毕业，在西洋画上已有一定水平。

1934 年经母亲同意，米谷考进了杭州西湖艺专高中部，改学名为朱少华。1935 年秋，他转学到上海美专西画系二年级，改学名为朱吾石。

从小镇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大都市，米谷的眼界开阔了，接触面广了。

他对"弱国无外交"而造成列强企图瓜分中国而感到痛心，特别是洋人统治下的上海租界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十分愤恨，决心以讽刺画来揭露租界中烟赌娼公开"合法"的犯罪行为。

米谷创作的第一幅讽刺租界阴暗面的漫画，题为《夜上海》，是通过在时代图书公司任职的同乡同学周培松介绍给《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的。作品在该刊 1936 年 4 月号上发表后，鼓舞了他继续创作的热情。鲁少飞是当时十分注意培养年轻作者的漫画家，米谷的来稿他常常修改、补充后给予发表。不能发表的，也能指出其缺点退还，引导米谷掌握漫画的要领和技巧。应该说米谷的进入漫画界与当时鲁少飞对他的关心是分不开的。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先生逝世。任上海美专学生会干事的米谷与新华艺专学生会干事沈同衡在为鲁迅执绋时结识而成了好朋友，这两位学西洋画的学生，后来都成了漫画家，而且多次合作。

（二）为抗战、辞母别妻离开家乡，步行 800 里，浙江四青年奔赴延安

1958 年米谷、张笑英夫妇与子女们

1937 年"八·一三"全民抗战爆发。

米谷在上海美专毕业后回到故乡，与一些青年组织"斜桥抗日后援会"，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一次日机空袭斜桥火车站后，有人说成是米谷他们的宣传活动被日机侦察到了，所以来投掷炸弹的。他们把镇上所有的标语、宣传画全部撕掉，并扬言要和米谷等青年"算账"。宣传活动无法进行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纷纷离家出走，有的参加了县政府政工队，有的到招兵站去报名参加国军。

米谷则把母亲和刚分娩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安顿在农村亲戚家。打算到重庆去参加抗日工作。米谷辗转到达汉口后，在等候船期间意外地碰到了两位小学时代的同学殷白和中共党员王野翔。得知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正在分批招考年轻人去延安学习与工作。便决定一起到延安去。

米谷、殷白和王野翔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办好报名去延安的手续后，等了一个来月才接到录取通知，同一位叫余宗彦的浙江诸暨的青年，四人一起登火车去郑州，再转陇海路。

本来他们以"流亡学生"身份可以免费乘车，但中途遭刁难，从潼关到西安的车票也买不起，汽车又不通。四人商议，步行 800 里去延安。他们每人背一个背包，在黄尘蔽天，北风呼号中长途跋涉。为了省钱他们住小店，吃粗粮，过最低的生活。舒适家庭出身的米谷，首次经受了艰苦生活的考验。

（三）在延安接受党的教育、培养；在"鲁艺"他是个大忙人，讲课，创作和研究漫画技巧

到达延安后不久，米谷与殷白被安排进陕北公学 15 队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育。在队里，殷白被选为墙报委员。米谷当美术编辑，为墙报配插图，画花边，装饰上墙，发挥自己特长。他俩合作的"劳动节特刊"，使人耳目一新，受到领导的表扬。

学期结束，米谷被派到旬邑县陕公分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主要任务是绘制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供各单位所需，也布置会场和搞宣传画创作。

1938 年底，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调集了米谷、华君武、古元、陈叔亮、秦兆阳、刘金等一批学过艺术的青年到新增开的美术系工作，米谷任教师。他是科班出身，所以有些美术理论、绘画技巧等讲课内容，深受学员们欢迎。

在鲁艺米谷是很忙的，除了讲课，还为八路军后方办事处主办的《前线》作漫画，为出版鲁迅的《祥林嫂》配插图，还画了不少宣传画，曾为朱总司令塑头像。

与此同时，他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文艺思想有了一个飞跃，原有的正义感得到 了革命理论的指导，开始认识到漫画的战斗作用，认识到漫画能使文化普遍偏低的工农兵大众一看就懂而产生兴趣、引起共鸣，是艺术为宣传服务的最好手段之一，从而坚定了献身漫画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他与华君武合作，组织了一个漫画研究班，培训漫画新人，团结周围的漫画爱好者。由于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因而得到领导与同学们好评。1939 年二七岁的他在鲁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因治重伤寒而与新四军失去联系。避居在故乡期间，连续三次遭国民党特务追捕

1941 年春，米谷被派到新四军去工作 ，在部队出发那天，殷白特意从杨家岭"文抗"到 桥儿沟鲁艺来，与华君武等为米谷送行。从延安到苏北路途遥远，既要通过国统区，又要通过敌占区，随时有发生战斗的可能。果然，没有几天，有消息传来说米谷所在部队在过封锁线时，与敌人遭遇。战斗中米谷牺牲了。鲁艺的同志们在悲痛中召开了"米谷同志追悼会"，华君武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殷白。大家在"哀悼"中，正确的情报到了，说与敌人战斗的是另一支部队，米谷他们已安全通过敌战区，正在奔赴前线。一场虚惊！

米谷到达苏北根据地后，被任命为新四军一师政治文工团美术组长。

这里与延安不同，面对日、伪军和时时挑衅的国民党军队，情况复杂，部队经常调动，随时发生战斗。米谷除了工作，还要有一个清醒头脑来负责带好他的美术组，以应付紧张而频繁的敌情。有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回忆说：米谷当时看上去还是个小青年，但他的工作作风却很老练，每到一新的驻地，很快就会看到他的抗战漫画出现在墙头。他的作品一看就懂，使人在一笑中领会其用意，在欣赏中受到鼓舞。

1942年春，日伪的大部队在苏北进行“清乡”前的大扫荡，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投敌。新四军腹背受敌，在连续作战和不断行军中，身体虚弱的米谷感染了伤寒。根据地缺医少药而米谷的病情严重，部队准许他请病假去上海医病。

到上海治疗一段时间后，米谷的病情已有好转，他打算趁机回家探亲，看望母亲和妻儿后回部队。此时，日伪在苏北开始分块封锁，进行“清乡”了，以数倍于我军的兵力实施包围，迫使新四军不得不从盐阜地区作战略转移到淮南一带。同时，上海敌特也大肆破坏我地下基点。米谷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2年初秋，米谷悄悄地回到了已经沦陷四年多的故乡斜桥。镇上伪机关的头面人物均系本地人，明知米谷去过西北解放区，但念与米谷家是世交，佯作不知不问不闻。

1943年春米谷与回乡养伤和养病的新四军战士朱新楣和陈汉章（沙可夫之子）商量，决定到苏北找新四军，重返部队。因此米谷、陈汉章、朱新楣和他堂兄朱凤楣四人乘火车到镇江，找到上海美专同学陈慧龄（当代漫画家），请他帮助渡江，不巧因日军封锁江面，渡船停航，民船均被扣留，何日通航很难说，他们只得返回家乡。

米谷在家专心把延安地区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情景，用连环画形式绘制出来，准备发表。这就是抗战胜利后米谷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的《西北印象记》连环画的初稿。

潜伏的国民党特工侦知米谷是新四军干部，准备混进斜桥去劫持米谷，向上级请“功”。

米谷巧妙地躲开特工的两次追捕后，再次出走到上海。

到上海后，米谷向日伪控制的上海《新申报》、《什志》和《大众》月刊投漫画稿，内容是借用《伊索寓言》中弱肉强食的故事，影射日本侵略中国；又以小市民因生活困难而引出的“笑料”，使读者领会苦难的生活是日伪统治造成的。后来，龚之方、唐大郎办了一张格调不高的《光化日报》，时值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屡战屡败，米谷以“英美帝国失败了”，“帝国主义末日到了”等为题的漫画，发表在《光化日报》上。这些作品，他均以“朱吾石”署名，想引起党和新四军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注意而取得联系，但无效果。

1945年6月，国民党浙西行署从各方面情报分析，认为米谷是中国派在沦陷区的高级干部，由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少将副司令王某，携通缉令到海宁，责令海宁游击县政府逮捕米谷。特务先把陈汉章和朱新楣找来，要他们说出米谷在上海的地址，两人都说不知道，当即被扣留，戴上手铐，关押在警察局。

几天后，特工到上海侦知米谷住址，这一天有两个称是海宁同乡到钱业中学找米谷，见面后并不认识，敷衍几句就走了。翌日，初中时代同学祝代年来通知米谷，说海宁特工已来上海，正与汪伪闸北警察分局联系，准备逮捕他，要他立即离开学校。米谷马上乘车到五马路旭东电料行，这里的店员蔡凤章是朱新楣的堂舅，与米谷熟识，他要米谷住在他们店里，摆脱了特工的追捕。

不久，抗战胜利了。

（五）抗战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米谷发表大量作品，成了当时上海最有影响的漫画家之一

伪金圆券：“这难道是我昨晚脱下的鞋子吗？”

伪金圆券贬值，一夜之间，面目全非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已有《文汇报》、《联合夜报》、《新民晚报》、《文萃》、《民主》、《时与文》、《评论报》、《消息》等进步报刊，他开始用“米谷”笔名在上述各报刊发表漫画。他立场鲜明地揭露、谴责、讽刺、嘲笑当局的倒行逆施，毫不客气地表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和反对法西斯，其矛头直指反动派的最高层。他的作品咄咄逼人，火辣辣地使人看了感到痛快，因而得到了进步报刊的支持和人民大众的欢迎。

米谷的政治漫画在上海已有相当声誉，创作进入了一个旺期，大量作品的发表引起了反动特务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注意。

30年代初由米谷的岳父张步青一手提拔而进入党政机关的斜桥人顾达一，在抗战期间曾担任过海宁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胜利后已任浙江省党部委员、浙西办事处主任和省参议员。他认为必须对米谷的行为加以“劝告”，于是要斜桥镇长王绍达（米谷的同学）到上海去找到米谷，陪同他一起到杭州民生路省党部办公室“谈话”。

米谷到了杭州，顾达一面带笑容地问他：为什么要到延安去？后来为何又到新四军去？现在和哪些共产党员有交往？米谷答复说：到延安是去读书的；不是说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吗？我到新四军去参加抗日工作，没有错。

接着顾达一讲了一番“大道理”，然后对米谷说：“我与你父亲和岳父都是老朋友，作为年长的同乡人，我要劝告你几句。现在抗战已经结束，你应找一个正当职业，好好工作，不要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更不要再发表那些不合时宜的漫画了。你上有老，下有小，要担负养家的责任，才对得起你母亲的养育之恩，假使找不到工作，可以来找我，我会帮助你的。”米谷说道：“谢谢你关心。’

回到上海后，米谷根本不理睬顾达一的“劝告”，继续发表政治讽刺画，终于引起了上海军统特务的注意。

初中同学，已在上海警察局任警官的卢勃根，在内部了解到特务正在调查米谷，已开始进行盯梢，由正义感驱使，他要米谷住到他家去与其父母生活，自己和妻子则住到警察局宿舍去。他与米谷说：特务是不会到警官家去查问的，可以安心创作。米谷则变换着笔名投稿，平时很少外出。

由于重庆《双十协定》的签订和全国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公开迫害有所收敛，米谷即搬出卢家，在天潼路一家小杂货店楼上租了一个小房间，接妻子带了三儿子朱光山到上海一起生活，他则全身心投入创作。

党的《群众》周刊在上海公开出版，米谷向它投稿而与编辑林彬（林默涵）同志结识。林同志很赞赏米谷作品，于是相约密切配合，由林出题，米谷作漫画在《群众》上发表。

同时，原《新华日报》主编、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到上海创办《新文化》半月刊，米谷很快与他和叶以群结识了。

林默涵、华岗等同志的指导，使米谷在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在革命文艺创作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另外，米谷还与陶谋基合作，为《华美晚报》编辑漫画专页。

在鲁迅追悼会上结识的沈同衡于1946年4月从大后方回到上海，也从事漫画创作，而且就住米谷家附近。他们每晚多商量题材，除发表漫画外，还为群众游行队伍绘制大幅宣传画。当时米谷精力充沛毫不畏惧地发表大量漫画。如：揭露当局为了准备内战而去拉壮丁，连胡子花白的卖菜老农也拉来充数的《好一个“壮丁”》；又如：当局高喊“言论自由”，却下令公共场所“莫谈国事”，他的一幅《上海滩的哑剧》，愤怒地谴责反动派的骗局。当局滥发毫无准备金的大额钞票，他以《青春不再》加以讽刺。1946年7月15日，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惨遭特务杀害，一幅《昆明不明》上两只魔爪，一对三角眼，黑暗中明确标出了国民党党徽，说出了杀害这位民主人士的凶手是谁指使的真相。

驻沪美军士兵殴打车夫臧大咬子事件发生后，《文萃》编辑唐海制文，由米谷配画的《臧大咬子传》发表在该刊第18期上，控诉美军暴行，呼吁给罪犯以法律制裁。

1947年初，米谷以“令狐原”笔名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西北印象记》连载画，介绍当年延安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的动人事迹。又一次引起特务的注意，追查作者。米谷则变换笔名，继续向报刊投稿。他已成为上海很有影响的漫画家之一。

（六）内战爆发，米谷被迫出走香港，在党的指导下，进入又一个创作旺期

国民党背叛《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1947年7月，《文萃》编辑部遭被特务捣毁，陈子涛、吴承德、骆何民三同志惨遭杀害。《文汇报》、《群众》周刊被迫迁往香港，临行前，林默涵给米谷留了香港通讯处。

受到警方几次调查米谷的房东，已意识到米谷是“危险分子”，就下了“逐客令”。米谷也觉得在上海已不安全，即带了妻儿回到了故乡。他立即与香港林默涵去

信，要求去香港工作。不久，林默涵和唐海联名来信，邀米谷去香港。

米谷一到香港，立即参加工作，为夏衍主办的《华商报》、为《群众》、英文版《中国文摘》作漫画；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人间画会”，任秘书长；与廖冰兄等在年青人大学漫画学院讲课。1948年9月3日，在潘汉年的关心下，香港《文汇报》创刊，徐铸成任总主笔，马季良（唐纳）任总编，柯灵、郭沫若、侯外庐、茅盾、翦伯赞、千家驹、宋云彬、孙起孟、章乃器等文化名人均任该报编务，米谷则任美术编辑，他在上述文化界前辈的指导下，得益匪浅。

米谷在香港发表的漫画近于写实而夸张，内容尖锐泼辣，对反动派的鞭挞都能一针见血。如：针对金圆券骗局的《这难道是我昨晚脱下的鞋子吗？》、《空箱计》、《伪金圆券的准备金》，构思奇妙而令人发笑又痛恨，又如讽刺蒋介石独裁的《脸皮越来越厚》、《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二十年江湖独脚戏》，把这个独夫的丑态揭露无遗，既夸张又真实。他还与张光宇、特伟、丁聪合作编辑出版《这是一个漫画时代》月刊，特别是他创作了新连环画《少年毛泽东》和《小二黑结婚》，给香港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4月，百万雄师渡长江，米谷用“MK”笔名发表 毛主席、朱总司令两幅速写像于《文汇报》头版。渡江胜利完成，《文汇报》出了“号外”，重登这两幅领袖像。他还每天发表国际、国内时事漫画；发表社会讽刺连载漫画《香港小姐》。米谷在香港进入了又一个创作旺期，其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七）解放后，米谷参加《解放日报》，并创办《漫画》月刊，但在事业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米谷与《文汇报》部分人员返回上海。7月随文艺界南方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化会”后，奉夏衍之命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任编委兼艺术组长，并被选为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950年6月，米谷奉命创办《漫画》月刊，任主编，沈同衡、张乐平、张文元、洪荒等任编委，分工合作。他团结老一辈漫画家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丁聪、廖冰兄等，悉心培养新人，形成一个老中青三代人的坚强漫画阵营。如今不少有成就的，如韩羽、蒋义海、毕克官、缪印堂等，都曾得到过米谷的关怀和教诲。

解放初到50年代头几年，才华横溢，画思泉涌的米谷，除在《解放日报》每天发表时事漫画外，配合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创作发表了大量作品。他的漫画可以称得上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在新连环画创作中，米谷又创作了《新婚姻法》、《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美帝侵华史》，拓宽了我国连环画的题材。

以《解放日报》和《漫画》月刊为基地，米谷以非凡的精力和超群的艺术修养，在美术活动中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他被选为全国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华东美协副主席。1951年5月他代表我国艺术界，随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访问，参加“五一”庆典。

作为革命文艺战士，米谷在事业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51年6月20日，米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新社会・老现象》，批评开会迟到的不良风气，这是解放后首幅人民内部讽刺画。见报后，读者意见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到报馆，有的说开会不守时间可以在会上批评，用不着在党报上披露，有的甚至认为漫画是讽刺、打击敌人的武器，用于人民内部是错的。但更多的读者认为批评得好。到7月8日，共收到读者来信895封，其中完全赞同批评的605件，基本赞同的91件，持反对意见的163件。公开讨论了半个多月，报社在总结中肯定这幅漫画的积极作用。

张春桥掌握了上海宣传大权后，成了米谷的直接上司。 有一次米谷有两幅作品送审，张春桥不同意发表，要他修改，米谷不服气。原件再次送审，张春桥见米谷不按他的“指示”办，即蛮横地批了“米谷！你的党票还要不要？”最后经周总理过问，这两幅漫画才得以发表。

1955年5月《漫画》奉命迁京，米谷随刊到北京，仍任主编。1960年，因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漫画》停刊，他改任中国美术馆研究保管部主任。

米谷主持《漫画》10年，全身心投入工作，使该刊在京、沪乃至全国享有重要地位，他也以数以千计的政治漫画创作，确立了他在漫坛的声望，在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中，米谷总是敏感地领先发表作品。内部批评尚无经验时，他的作品带了头；苏联反华，他率先画出了讽刺赫鲁晓夫的作品。1959年米谷与华君武代表我国去法国参加国际漫画组织杜米埃俱乐部成立活动，顺道访问英国，回来便创作了《走马看英法》和《西方花边》两组系列漫画，把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畸形现象介绍给读者。

米谷不仅热心于政治漫画的创作，也时而发表美术评论。著名画家林风眠的“纯艺术探索”观点受到批判，被划为“右倾”，而米谷却在1961年5月号的《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我爱林风眠的画》的评论。他说：“林风眠的画象一杯醇香的葡萄酒，使我陶醉于美好的艺术

享受与想象之中。”又说：“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流露着爽朗、乐观、多情和青春气息……他的画风即无孤高绝俗之气，又无妩媚造作之态，而是那样朴素、平易，把欣赏者带进一个轻快、鲜明、优美、深邃的诗情境界里。”作为政治漫画家，又担负着领导职位的米谷，竟对一个受批判的画家鸣不平，很多人为之惊奇，当然也有不少人为米谷担心。果然，一些热衷于“斗争”的人对他进行“围攻、讨伐，”迫使他为此作了检讨。

米谷是全国美协理事、常务理事，又是一个部门的领导，担负着一定的行政工作，在处理日常事务外的所有时间，他都用来创作，根本不管家事，家庭生活，教育孩子，照顾母亲，全由妻子张笑英担负。他待人接物热情而豪爽，坦诚而无虚假、掩饰，使人乐于接近他。在创作态度上是一丝不苟的，每幅作品他总要横看直看，近看远看，左看右看，稍有不满就推倒重来。他根本不知道休息，长时期思想处于高度集中状态，60年又因功能衰退而手术切除了右肾，中年以后血压时高时低，但他仍然不肯稍有松懈。他是中国漫画界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但“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

（八）他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老母含冤自缢，妻儿分散。病重回京后放弃漫画之笔，潜心于画鸭

“文革”开始，米谷被定为“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每天游斗，搞喷气式，受尽折磨，导致血压居高不下，也不准回家，关在黑屋里反省，妻子儿女均被扫地出门，多次抄家，大部分作品和收藏品被没收或销毁。最后被揪到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农场监督劳动，养猪放羊，还经常接受批斗。

1968年9月，米谷的母亲蒋云仙被故乡的造反派从北京揪回斜桥，戴上“地主婆”帽子日夜批斗，国庆节前夕，老人家自缢在自己家里。到1974年米谷因病回京诊治时，家中已空无一人了，后经请求先后把在干校劳动的妻子，在东北生产兵团的小女儿和在山西农学院的大女儿调回北京来照顾他。1975年，经过医疗身体有了好转的米谷，便闲不住了，漫画不能画了，就改画水墨画，而且热衷于画鸭子。他经常带了速写本到郊区鸭场去观察北京鸭的习性、姿态。当地农民发现这个喜欢长时间看着鸭子的老头，还以为是个“疯子 ”呢。

不久“四人帮”倒台了，政治环境宽松了，鸭子也越画越多，过去不敢见面的老朋友们也来重叙了，他就要黄苗子为他的居室题写了“千鸭堂”室名。至于为何米谷选择了鸭子作画题呢？不少人说他用“春江水暖鸭先知”来表达他预感到“四人帮”即将覆灭，但他自己从不表态，至今仍是个“谜”。

1978年6月底，组织上为米谷平反后的一天下午，全国美协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几位领导来看望他，准备为他出版画集。米谷在极度兴奋中突然半身麻木而跌倒在地。经历了长达8年4个月的病床磨难后，于1986年10月20日13时30分与世长辞，终年68岁。

米谷逝世后，故乡海宁于1991年底建成了一幢由华君武题名的现代风格、全白色的纪念性建筑——米谷画廊。1992年1月15日，举行米谷画廊落成典礼暨遗作展览时，全国美协副主席华君武和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漫画家以及沪杭两地新闻记者，海宁市领导，很多人赶来参加。米谷的子女朱光森、朱光山、朱星娴向海宁捐赠米谷的遗作、藏书，以及米谷的故居房产，受到海宁市政府的表彰。

1993年海宁市文联成立了“米谷漫画研究会”，1995年当地政府决定，米谷画廊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责任编辑　徐　鲁）

“说有易，说无难”

“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座右铭。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二十年代王力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时撰写《中国古文法》论文，“附言”说：“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导师赵元任先生在论文上批云：“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

王力的另一篇论文《两粤音说》，蒙赵元任先生的介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这篇文章说两粤没有“撮口呼”。1928年，赵元任去广州调查方言，后写信告诉当时在巴黎的王力说，广州话里有“撮口呼”，并举“雪”字为例。王力对此深感惭愧，他说：“我不应该由我的家乡博白话中没有‘撮口呼’来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以想当然来推理是错误的。”后来他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上说：“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

朱继功

梁实秋、冰心联袂主演《琵琶记》

●罗静文

1925年3月28日晚，美国波士顿美术剧院内，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正在进行。容纳千人左右的剧场，座无虚席。观众大部分是美国人，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少部分是中国学生和侨胞。

演出的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他们虽然身着中国唐朝的服装，但念的台词都是英文。这是一场典型的中西合璧的演出，所演剧目是中国传统剧《琵琶记》。

这场演出，其主创人员即是后来驰名海内外的梁实秋、闻一多、谢冰心、赵太侔、余上沅、顾一樵等著名文学艺术家，可谓“明星”荟萃。

进行这样一次演出的原因

当时，中华民族正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处于深重的苦难里。留学美国的青年，虽然身居海外，但是他们怀念祖国，热切地关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他们经常谈论世界国家大事，痛恨国内军阀专横，连年混战，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为在国外亲身尝到那种被人轻蔑、歧视的待遇而愤愤不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纷纷组织社团，有的提倡世界主义，有的主张国家主义……其中清华学校的校友在波士顿成立了“大江”学会，他们主张温和的政治改革，认为只有“国家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只凭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探寻救国的道路。

为了宣传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他们决定将中国古典戏剧作品搬上异国舞台。戏剧在当时的中国还未受到艺术的礼遇，但其形象、生动的形式是民众教育的主要手段，已被有志之士开始认识。无论是平民教育、职业教育还是专门教育，都可运用戏剧这门艺术。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对戏剧本来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国外演戏，即满足了其对戏剧的爱好，又起到了宣传“国家主义”，介绍、繁荣与发展中华文化的作用。

先是在纽约的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等留学生发起上演了一出英文的中国古装戏《杨贵妃》，由撰写剧本到舞台设计、服装制作、排戏演出等等，全部由学生们自己负责办理。演出大获成功，吸引了不少美国观众。尤其是闻一多用油彩在服装上绘制出的大海、红日等，在灯光下更是耀眼，给人一种堂皇的迷色。许多华侨与美国人士都交口称赞，报刊上的溢美之词也使人振奋。这出乎意料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几个青年，他们决定回国后从事“国剧运动”。

纽约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波士顿，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看到演剧的宣传作用，也酝酿着在波士顿演一出中国的古典戏剧。

演出的筹划过程

筹划演戏的任务落到了梁实秋和顾一樵身上，他们平素对戏剧就很热心，经常省吃俭用，余下钱去剧院看戏，细心观摩演员们的精湛演技，欣赏了不少优秀的外国剧目。这次能够亲自粉墨登场，正好可以过把戏瘾。他们商议此事时，邀集了波士顿一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男同学。当然光有男同学不能成戏，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女同学，于是把谢冰心、谢文秋等几位女生也请来了。

大家在商议演出的剧目时，经过了一番讨论。男同学中有人提出最好演《西厢记》。因为它在国内流传最广，可以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曲折，也很有趣，人物也都活泼，那些曲子也都写得富有诗意，美国人一定喜欢看。

但是，女同学们心里却暗自思忖，扮演老夫人和红娘都没有什么，只是要演崔莺莺与张生互相爱恋，背着母亲，私订终身，就有点那个。虽说是假戏，但要演得逼真才行，这样的角色可不能演……

这时，冰心提议改演《琵琶记》。大家又经过一番讨论，男女同学一致同意了。

《琵琶记》是一出以蔡伯喈上京赶考赴选后发生的婚变故事来广泛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南戏，具有比较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关于蔡伯喈 的故事，很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南宋诗人陆游有《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1926年梁实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宋元南戏亦有《赵贞女蔡二郎》的剧目，写"(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事，把蔡伯喈写成不孝不义的反面人物。元末高明的《琵琶记》正是在这些民间传说 和戏曲的基础上改编成的，他对蔡伯喈的形象进行了改塑，把"弃亲背妇"的蔡伯喈改写成"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改变了原戏剧冲突的性质，也改变了原戏剧的主题。《琵琶记》叙述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被父亲逼着上京应试，到京后，考中了状元，被牛丞相看中，欲招他为婿。他辞以已娶妻室，双亲年老，不肯应允，又向皇帝上表辞官。但是皇帝既不允辞官，也不允辞婚。忠大于孝，蔡伯喈只好勉强留在京师与牛小姐结婚。自蔡伯喈入京后，他的家乡连年遭灾，赵五娘忍饥挨饿，辛劳操持，还是难以养活公公婆婆，公婆相继去世。赵五娘剪下自己的头发，变卖掩埋公婆。然后背着公婆的画像，弹着琵琶沿路卖唱乞讨，上京寻找蔡伯喈。幸赖牛小姐为人善良贤德，使赵五娘与蔡伯喈夫妻团聚。三人一起回乡守墓三年，尽了大孝，全剧以一门旌表全忠全孝全义而结束。《琵琶记》历来被尊为"南戏之祖"，全剧很长，有 42 出，而且剧中的对白和唱词极为典雅，文采斐然。大家议决由顾一樵改编成适合在美国演出的剧本，再由梁实秋翻译成英文。

顾一樵是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虽然学的专业是电机工程，但对诗词小说戏剧无不通晓，他负起了编剧的责任。他只撷取了《琵琶记》的故事骨干，就蔡伯喈的一生，由高堂称寿到南浦嘱别，由奉旨招婿到再报佳期，由强就鸾凰到书馆悲逢，把这三大段编成三幕话剧。改编之后由梁实秋译成英文，很快剧本便搞定。

剧本改译好后，由大家分担各项事务。首先物色演员。由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谢文秋演女主角赵五娘，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演牛小姐，顾一樵演牛丞相。男主角蔡伯喈费了一番周折，许多男士都跃跃欲试，争演这个角色，争执之 下，顾一樵提议由梁实秋出马饰演蔡伯喈 。梁实秋声明要先去征询谢文秋的意见，见她没有异议，才爽快答应下来。其他角色分别由王国秀、徐宗涑、沈宗濂、曾昭伦、高长庚等扮演。冰心原来只负责准备、设计剧中女角的服装，不参加演出，但在《琵琶记》即将演出时，扮演牛小姐的邱女士突然得了猩红热，要临时换演员，冰心只得匆促上阵，背台词，体会剧中人物的身份和处境，逐步进入角色。

演员确定后，进入排练阶段。至于服装制作、舞台布景等，梁实秋则写信向在纽约艺术学院学习的闻一多请求助一臂之力。闻一多复信说："因事不能来，但遣两员大将前去帮忙，一是余上沅，他是内行，能指挥一切，一是赵太侔，他多才多艺，但寡言笑，对他幸无误会。"果然，两位来了之后，二话不说，便伸胳膊挽袖子，锯木头搭布景，经过几天的努力，灯光、布景、道具全部就绪。闻一多虽然没有亲临波士顿，但他在布景的绘图上尽了很大力。他给顾一樵的信中说："舞台用品……布景也许用不着我亲身来波城。只要把剧本同舞台的尺寸寄来，我便可以画出一套图案，注明用什么材料怎样的制造。反正舞台上不宜用平面的绘画，例如一个窗子最好用木头或厚纸制一个能开能阖的窗子，不当在墙上画一个窗子的模样，因为这样会引起错误的幻觉。总之，我把图案制就了，看它的构造是简单或复杂。如果不能不复杂，一定要我来，我是乐于从命的。再者也请你告诉我你们在布景和服饰上能花多少钱。"闻一多实际上起了一个"遥控"指挥的作用。后来，在公演的那天，闻一多还是专程赶到了波士顿，并亲手为冰心等演员化妆。

服装也是向纽约方面借来的，演出《杨贵妃》的服装大部分是缝制之后由闻一多用水彩画不透明颜料画

上各种图案，在灯光照耀之下华丽无比，而且看不出有彩笔的痕迹。其中女演员的服装 比较素，需要再进行一番装饰，由冰心买来金纸和银纸，按照剧中人物服装的要求，把金纸、银纸剪成花，一朵朵的往衣服上贴，就这样把剧中女演员的服装准备齐全。杨贵妃是唐朝人，蔡伯喈是汉朝人，服装款式有很大的差别，但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因为在美国别说买中国古代的戏装根本不可能，就连中国式的花布也弄不到，况且美国人多半也不会去考证唐汉服饰的差异，可以蒙混过关。

经过紧张的课余排练和准备工作，《琵琶记》正式公演了。到底是学生演戏，上演之前还有一大堆的繁文缛节，先由在波士顿音乐学院读书的王倩鸿女士致开幕词，中国同学会主席沈宗濂致欢迎词，郭秉义先生演说，奏乐，接着才是一声锣响，幕起，演出正式开始。演出进行得很顺利，演员们把剧中的悲欢离合表演得极为动人。最后幕落时，掌声雷动，几乎要把屋顶震塌。美国观众被舞台上富丽堂皇的布景和花团锦簇的服饰，以及正冠捋须甩袖迈步的奇怪姿态所吸引，对剧中所表现的中国古代生活，感到非常新鲜。至于剧本、剧情、演技、舞台艺术如何，没有人会去追究，外国人看中国人演戏只是出于好奇心，看个热闹。其实，在当时也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琵琶记》，包括演戏的人在内。剧中原有一段插曲，由赵五娘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唱什么词阕，由演员自己选择，结果是赵五娘用四季相思小调唱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诗是唐朝的贺知章作的，唱的人却是东汉时的赵五娘，这样明显的时代错误，演出后无人提出异议。

演出的戏外戏

这场《琵琶记》，从筹划、编剧、服饰、布景、排演直至上演 ，聚集了一批留美的知名人士，真可谓是“明星”荟萃，他们之间不仅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情，而且还引发了不少有趣的小插曲，从中可以领略到他们当年的风采。

《琵琶记》上演之前，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曾作过一次预演，特地把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请来作指导。这位教授很认真负责，遇有他认为不妥的地方就大声喊停并予以解说，纠正了演员们的很多缺点。当演到蔡伯喈和赵五娘团聚的情景时，教授连声大叫：“走过去，和她亲吻，和她亲吻！”谢文秋站在那里微微含笑，梁实秋却木然呆立，他无论如何也鼓不起这一点勇气，越雷池一步。他告诉教授，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教授摇头不止。预演完毕，教授把梁实秋拉到一边，郑重其事地奉劝他：“你下次演戏最好选一出喜剧，因为据我看你不适于演悲剧。”话说得很婉转，但意思是十分明显的，教授根本不理解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梁实秋心里很不服气，他想，《琵琶记》不就是喜剧吗？而且这一次只是逢场作戏，难道还会有下次么？

虽说是逢场作戏，但难免没有一点情感流露。梁实秋到美国后邂逅谢文秋。谢文秋容貌俏丽，富有风度，很讨人喜欢。这次演剧，梁实秋与谢文秋分别饰演剧中的男女主角。在排练和日常接触中，彼此产生了一些好感，机敏的冰心发觉梁实秋很喜欢谢文秋。其实，谢文秋对同学朱世明一往情深，但是朱世明远离威尔斯利，是西点军校的学员，追求谢文秋的人又多，谢文秋便请冰心单独同朱世明谈谈，将她的心意转告朱世明，冰心同朱世明谈过后，谢文秋同朱世明的关系又进了一步。不久两人便订了婚，冰心获悉后便对梁实秋调侃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梁实秋也就

1923年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

因此顺水推舟，将“秋郎”用作了自己的笔名。

冰心与梁实秋之间的友谊非比寻常。他们是在同船去美国途中不期而遇的，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经过介绍，彼此相识了。梁实秋以前曾经著文批评过冰心的小诗《繁星》和《春水》，初次相会彼此不免有些矜持，只寒暄了几句就分手了。梁实秋觉得冰心“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他们很快就相熟起来，他们兴致勃勃地在船上办了一份名为“海啸”的文学壁报，各自将自己创作的诗文发表出来，以解游子思乡之愁。随着交往的日益增多，梁实秋逐渐觉得冰心“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到了美国，冰心就读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一年后，梁实秋也转到哈佛大学，因为同在美国的波士顿地区，两个人的交往更加密切。遇有闲暇或假期，梁实秋与冰心都互约朋友往访相会，或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或到波士顿的杏花楼上去品尝海外的广东佳肴，聚会畅谈，情趣万种。这次，大家又凑在一起同台为美国同学演出，逢场作戏，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他们在波士顿演出《琵琶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英国，正在牛津大学读学位的许地山立即写信，祝贺他们演出的成功。顾一樵把许地山的来信给冰心看，当冰心读到：“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时，她十分明白，许地山的这两句话里隐含着多少情和意。但当时冰心对此却未置一词，只抱以微笑，把一切都隐藏在心底，就连许地山在牛津大学为她申请奖学金，写信约她转到牛津大学去读硕士等，她也从来没有对别的同学说起。事隔六十多年后，冰心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这些青年留学生之间，彼此戏谑的话，我本是从来不说的，如今地山和实秋都已先后作古，我自己也老了，回忆起来，还觉得很幽默。”

冰心和许地山在国内时就认识了，冰心听过许地山的课，也十分钦佩许地山的博学多才，当年他们同在燕京大学，由于男女分校，两人见面的机会不多。他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燕京大学季刊》的编辑会上，他们同任校刊编辑，合作得很好，但有时也会为一篇稿件、甚至一个字争论不休。冰心平时待人处事温和、宽容，和女同学在一起时，总是十分谦让，从不逞强好胜。但是与男同学相对时，却从不退让。他们在讨论第一篇稿子时就发生了争执，冰心是女校代表，当仁不让，咄咄逼人，让许地山等男生编委领教了她的“厉害”。后来有一次，许地山写了一篇文章，文中用了“雇工”二字，冰心在编稿时，就随手在“雇”字上加了“亻”旁，改成“僱工”。许地山看后，给冰心接连写了厚厚的两封信，引经据典，论证了“雇工”二字的正确来源，把冰心“教训了一顿”。真是“不打不成相识，”从那时起他们合作得更加和谐，成为挚友。许地山由此对冰心产生了恋慕之情。之后，他们又同船赴美留学，巧得是，在旅美途中，冰心请许地山去找一位中学同学的弟弟吴卓，他却阴差阳错地把吴文藻找来了，结果六年后，冰心和吴文藻结为了终身伴侣。

在《琵琶记》即将上演的那天，还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一大早，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丁先生就急匆匆地跑来，面红耳赤地对梁实秋等人说：“你们今晚要演出《琵琶记》，你们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吗？蔡伯喈家有贤妻，而负义糟糠，停妻再娶，是一位道地的多妻主义者。你们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岂不要遭外人耻笑，误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多妻主义者？此事有关国家名誉，我不能坐视，特来警告，赶快罢手，否则我今晚不能不用适当手段对付你们。”大家一再向他作解释，梁实秋把剧本送给他过目，并且特别声明，剧本是根据高明的名著改编的。关于高明作《琵琶记》的意图，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姚华《菉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盖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可见，高明写《琵琶记》有讽刺的意味，但没有把蔡伯喈写成不孝不义的负心汉，而且历史上的蔡伯喈并不是个弃亲背妇的人。最后梁实秋还特别声明，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爱国之心决不后人。丁先生将信将疑，悻悻然离去，临走时丢下一句话：“我们走着瞧！晚上见！”丁先生这一通搅和，弄得大家一整天都心绪不安。

晚上的演出照常进行，一切顺利。曲终人散之后，梁实秋等人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到杏花楼去吃宵夜，刚刚坐稳，就听得楼梯震得咚咚响，跑上来一个人。大家一下怔住，原来是早晨那位面红耳赤的丁先生。丁先生走到大家面前，很难为情地笑笑说：“你们演得很好，没有伤害国家的名誉，是我误会了，我道歉！”随后便和大家一一握手告退。丁先生不但热爱国家，而且勇于认错，他的这一握手，令大家感到十分快慰。

第二天，《基督教箴言报》报道了这次演出的盛况，并且刊登了梁实秋的照片。事后，闻一多写了一首《实秋饰蔡中郎演〈琵琶记〉戏作柬之》，也凑了一份热闹：“一代风流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

（责任编辑　余广人）

通向太空的航天铁路

●才铁军

这是昨天的秘密；这是中国唯一由军人独立管理运营的铁路；这里有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这里留下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深深的足迹。它就是通向太空的航天铁路

在祖国大西北浩瀚的戈壁荒漠深处，蜿蜒着一条保密了近30年的军事铁路。它就是通往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航天铁路。即使在最新的地图上，现在仍寻觅不到它的踪迹。直到中国航天工业对外开放之后，才一点一点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这条神秘铁路银光闪闪的钢轨以及钢轨下的枕木，宛如一架长长的天梯，载着中华民族的骄子——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枚运载火箭，通向东风航天城，飞向茫茫的太空……

没有公路，机场也离得较远，这条铁路是航天城的生命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凤洲告诉我们说，没有这条铁路，便没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今天。

这条铁路全长271公里，有15个火车站。站长、火车司机、列车员、养路工全是清一色的军人或军工。铁路全线裸露在戈壁荒漠腹地，不靠近任何城镇，远离居民区，常年遭受风沙、高温、严寒、盐碱的袭击和侵蚀。然而，几千名航天铁路官兵、职工却用自己的血汗保证了它36年畅通无阻！36年风风雨雨中的千辛万苦，36年轰轰烈烈中的悲壮故事。除了他们自己，却很少为世人知晓。

最近，在国防科工委和总后军交运输部首长的支持、帮助下，我们来到航天铁路进行独家采访。

下面，就让我们给亲爱的读者们讲讲这些因绝对保密而被尘封了整整36年的可歌可泣的壮举和荡气回肠的故事……

1958年，一批铁道兵官兵和铁路职工悄悄地来到巴丹吉林大沙漠的深处，他们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用一腔热血修筑了一条航天铁路

1958年初，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我国决定在甘肃省泊水地区的金塔县至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巴丹吉林大沙漠的深处，建设第一座导弹、火箭、卫星试验基地。作为基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兰新铁路清水站至基地的铁路工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首先秘密开工。

一声令下，1958年5月，6300多名铁道兵十师及部分三师、六师的官兵被军列拉到西北，在一个叫"清水"，其实连井水都浑浊不堪的小站下了火车。他们被告之:不得告诉任何人干什么，与家人通信不得透露施工地点、情况……

同时，从兰州、济南、北京等铁路局调集的几百名政治上绝对可靠、技术上绝对精湛的铁路员工，也突然离家，秘密地来到戈壁铁路工地。

铁道兵司令员李寿轩中将率领勘测人员，首先对线路作了空中侦察和地面踏勘，在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的协助下，完成了线路设计。5月23日，铁路全线开工。

当年，铁路沿线没有人烟、没有绿树。风沙和干旱及奇特的昼夜温差使它成了一条生命奇缺的地带。施工几乎是在完全封闭、没有社会依托的情况下艰难地进行着。当时施工机械很少，战士和铁路员工们抡锹挥镐，顶着风沙烈日拼命干。铁路一米一米地往大漠深处延伸。工地上，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通明，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工地上常刮黑旋风，将帐篷连根拔起，吹得无影无踪。这时就得几个人躺在地上，拽住绳子。吃饭也奇特。风一来，天地间弥漫着黄沙，一张口，沙子就往嘴里灌。大家只好挤在一起，用手撩起衣服挡着风，狼吞虎咽。

工期很紧。前面铺轨，后面拉道碴的火车就跟上来了，追着铺轨队伍的后头走。关键时刻，运路料的机车坏了。从兰州铁路局来的张文甫等6名机车乘务员，就到玉门、陇西、疏勒河等地，借来日本人留下的已损坏的蒸汽机车，昼夜奋战将其修好，然后用来拉路料。

正当筑路大军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降临。人们碗里的大米和白面越来越少，代之而来的是骆驼草、土豆。土豆冻得都淌水了，也得往肚里咽。吃骆驼草多了，

这几位老工人都是 1958 年调人航天铁路的，他们在大漠中奋斗了一辈子

身体浮肿，大便不通，偶尔吃上一顿又粗又酸的骆驼肉，就像过节一样欢喜了。即使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施工进度还是每天按进度表完成，不受影响。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拉路料的机车乘务员们吃住全在火车上。机车后面挂一节宿营车，一半住人，另一半做饭。刚铺轨的铁路由于路基不好，车走起来左右摇晃。做饭时锅里的水也随着晃，有时饭没烧熟，水就晃没了，这顿饭就吃不成了。

冬天，气温达零下 30 至 40 摄氏度，开了一天火车，机车乘务员们两耳冻得发红，脸上冻得麻木失去知觉。回到宿营车要赶紧捂住脸和耳朵，一个小时后才能缓过劲儿来。若是赶上刮风下雪天，那就更难了。乘务员们得将身子探出窗外；两眼死死盯住前方。眼里的沙子被流出的泪水粘成串，足有一厘米长，挂在眼角，像个小沙柱。

硬是凭着这种战天斗地英雄气概，筑路大军完成了土石方 247 万立方米，桥梁 665 米，涵渠 644 米，房屋 2.5 万平方米，于 1959 年 4 月 27 日铺通全线，1959 年 11 月下旬通过国家验收，1960 年 1 月 16 日，铁路正式移交给基地铁路管理处运营。

在原来没有生命的地方，一条注满艰辛、注满血汗、注满牺牲，也注满希望的铁路，终于庄严地躺在了戈壁滩上。

以筑路的勇士们为主体成立的基地铁管处的官兵和军工们，又继续演奏那雄壮的航天铁路壮歌。

这是一条功勋铁路。36 年中，它安全开行了××××多列“特运专列”，将共和国的骄子——导弹、火箭、卫星平安运至发射场

军职混编的铁管处，是目前全军唯一在编的铁道兵部队。36 年中，铁管处管理的这条军事铁路安全运输了各种型号的导弹、火箭、卫星；安全接送了“特运专列”××××多列；运送了××××多万吨经济建设物资、战备物资、生活用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至卫星小至一砖一瓦、一棵树苗，都是由这条铁路运进基地的。为了保证这条航天城生命线的畅通，航天铁路人作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奋斗与牺牲……

由于沙害严重，沙子埋没铁路是常有的事。因此，这条线路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小点号”，孤零零地点缀在大漠上。这就是巡道、养路、扒沙战士和军工们驻扎的地方。当年筑路官兵懒得给它们起名，“小点号”建在某公里处，大家就叫它“某号”。大的点号驻一个连，小的只有两个人。每当沙埋铁路，“小点号”的铁道卫士们就倾巢出动，展开“清沙战”。战士前面清，火车后面跟着走，271 公里的路程，有时火车要走上十几个小时。这场面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独有的。

“小点号”没有水。近年来为 42 个“小点号”打出 31 口深井，但仍有 16 口井的水是苦的，没法饮用，要靠火车送水。买一次菜要吃上四五天，鲜菜往往成了干菜。

夏日，大漠就像一个大蒸笼，炽热烤人。现任铁管处处长季志林告诉我们，工程营的官兵们在沿线施工累了，连个乘凉的地方都没有，就找根电线杆或立一根枕木，五六个人沿着电线杆或枕木的影子，齐齐地坐在一排。太阳在移动，“影子部队”也跟着移动……

凡有特运任务，从接到命令开始，271 公里的铁路沿线所有的站、场、桥、涵，全部站满战士们，无论夏日曝晒还是风雪严寒，一等就是十几个小时，随时清沙、站岗放哨保畅通。

险情也时时伴随着他们。1973 年，一列装载火箭特种燃料的特运专列，因为沙洞及枕木腐朽，有两辆罐车掉道了。特种燃料的燃点极低，衣服磨擦产生静电的六分之一，就可将其点燃，稍有不慎，稍有泄漏，就可能引起大爆炸。铁路官兵们不顾个人安危，小心操作，很快将车辆起复，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

恶劣的环境对官兵们是个严峻的考验。1983 年冬，有个战士冒着狂风飞沙巡道，解手时被狂风吹下路基后，就找不到线路了。他在风沙中硬是奔跑了一夜寻找线路。第二天，

全连战士出动，才找到他，当时他还背着一个巡道包，连声说："我的巡道任务还没完呢，不能回去！"

1986年5月，一场狂风刮了六天六夜。驻守在70公里处的养路4连战士姬和平在巡道时迷失方向，在沙漠中爬行了一天一夜，被人发现后才获救。当部队首长接他归队时，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火车没有出事吧？线路通了没有？"在场的军营男子汉们，也禁不住感动得流下泪来。

官兵们视铁路畅通为生命。1987年12月，养路12连1排有个老战士，在一无燃料取暖做饭，二无粮食的情况下，为了坚守"小点号"保证铁路畅通，吃了四天生冻土豆，喝了四天凉水，直到接他的战士到来才下岗。

1994年6月20日，养路7连驻地因故停电，不能抽水，全连战士就干吃方便面，最后连口里的唾液都没了。但他们还是坚持每天上道作业，保证专列安全通过。

1994年6月24日晚，有一级特运专列通过。不巧，电话线被大风刮断了。养路7连战士彭本山和他的战友在狂风中奔跑了几十里传纸条，保证了行车指挥命令的传递。

36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防止了多少事故，连他们自己也数不清了。

1980年夏天，西北戈壁大漠上突然下了一场30多年来罕见的大暴雨。这天下午，老司机郑天义开着火车从清水向基地驶来。过大树里车站快到黑河水库时，郑天义借着机车大灯的照明，发现水库旁边路基上的钢轨有点倾斜，好像是被大水冲弯了，两根钢轨脱离了原来的位置。再往远看，隐隐约约看到钢轨的亮面，钢轨下面全是水，枕木已淹在水中。不好！郑天义马上来了一个急刹车。停车后，郑天义下去一看，路基被冲垮，钢轨悬空。机车赶紧后退到安全地带。一场列车颠覆、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防止了，保证了19节车厢、175名乘客、162吨战备物资的安全。基地给郑天义和他的副司机记二等功，他的名字也上了《东风航天城英模名录》。

36度春秋，36度风雨。他们在戈壁大漠轰轰烈烈的事业中，默默无闻地奋斗着、奉献着。航天铁路官兵和员工们，绝大多数没有观赏过火箭腾空的壮丽景象。有的人从入伍到离队，连火箭、卫星的模样也未见过。可他们却像一颗颗恪尽职守的道钉，不分白天黑夜，不畏风沙寒暑，紧紧铆在钢轨上。然而，谁又能说，这些普普通通的航天铁路人，和那些挂着勋章红花的航天英雄们不同样伟大呢？！

他们是戈壁大漠中的胡杨。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为航天铁路献上了生命中最辉煌的苍翠

航天铁路的东段、东风车站附近，有成片的胡杨林。这种属于杨柳科的植物，经过大自然风沙、干旱、盐碱的淘汰、筛选，终于成为戈壁大漠植物中的佼佼者。

有人说，航天铁路上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正像铁路沿线那一株株葳蕤的胡杨。这个比喻太形象、太富有诗意了。下面就让我们读一读他们用心血写在大漠铁路上的诗行吧！

在铁管处，我们见到了总工程师张生金。他是基地创业者的后代。1982年，他从位于峨眉山下的西南交通大学毕业。本来有机会留在北京，可他却又回到了戈壁滩，忘我地投入到军运工作中。张生金热爱这片热土，他曾写了一篇散文《小点号》，字里行间都是对航天铁路的爱。他不谈自己，却向我们讲起陈文汉、王学陵的往事。

铁管处原总工程师陈文汉为航天铁路整整工作了36年，把一生全部献给了航天城的铁路建设，是基地公认的铁路专家，人们称他是躬起脊背做桥梁的人。

1958年，25岁的陈文汉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自愿报名从军。西行的列车载着他加入了修筑航天铁路的行列。从此，他就像一台加足燃料的火车头，开始永不疲倦地爬坡闯关！

航天铁路通车初期，有20多台机车的锅炉由于水含盐量高、硬度大，致使积垢太厚、钢板变形而无法开动。为了解决水质问题，使"趴窝"

修建铁路的官兵在工地野炊

航天铁路终点站:东风火车站

的机车重新奔驰起来，陈文汉主动请缨，承担了化验水质、解决水源的任务。当时基地没有化验室，更没有必要的化验设备、药品。陈文汉就跑玉门、下酒泉，八方求援，弄清了戈壁滩的水质成分。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陈文汉不顾一天紧张工作的劳累，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整理资料、计算配方，常常熬到深夜。他带领同志们经过几月的艰苦努力，终力解决了机车因水质而“趴窝”的技术难题。当水满汽足的火车头又在航天铁路上奔驰起来时，陈文汉也成了航天铁路人心中的英雄，官兵们拥抱他，向他欢呼，用军人独特的方式向他祝贺。而他，却不好意思起来，脸色红红的。

1969年以后，陈文汉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负责组织装载火箭、导弹、卫星的“特运专列”。这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不得有半点差错。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坚持和列检人员 一道检查车辆，制订特运计划和应急措施，亲自跟车组织运输。36年来，陈文汉先后参加接运特运专列数百列，安全地将15颗卫星、数百枚各种型号的导弹及重要设备运到了发射场。他还结合工作实际，翻译了几十万字的国外军事铁路技术资料，发表了《导弹卫星试验任务铁路运输保障》的学术论文。陈文汉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荒漠中踏踏实实地走了36年，成为基地的一等功臣。工作之余，他喜欢在胡杨林旁漫步，欣赏胡杨树那苍劲的身影……

王学陵是第一位走进大漠、走进航天铁路的大学生女兵。那是1958年的事。当时她头上扎着两个小刷子，刚刚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学的是给排水专业。当得知自己是基地、是航天铁路第一个女兵时，难以名状的幸福曾使他流出泪花。

然而，现实却不那么浪漫。戈壁中淡水奇缺。她看到铁路官兵们惜水如油，一盆水洗完脸，还要洗衣服，洗完衣服再洗脚，洗完脚再把浑浊的水倒在门前的树下。此情此景，使王学陵这个给排水专业的大学生忧心如焚：“找水，一定要找到水！”

王学陵经过艰苦的跋涉，最后终于在戈壁滩上找到了一个采水点。她几经论证，决定从这里开始。当高扬程的水泵喷出第一股清泉时，王学陵手捧清凌凌的井水，激动得一饮而尽。水是甜的。泪是咸的。心是热的。

星转斗移。1975年冬，一项工程因没有水源，进展缓慢。当时，王学陵关节炎正发作。她忍着病痛出发了。两个儿子拉着她的手，噘着小嘴说：“妈妈，别走了，你一去，元旦谁管我们呢？”她抚摸着两个孩子的头，解释道：“好孩子，听妈妈的话。你们不是喜欢火箭、卫星，喜欢火车吗？可那些发射火箭和开火车的叔叔们喝不上水，妈妈能不去吗？等你们长大了会理解妈妈的。”孩子的手终于默默地松开了。这年的元旦，王学陵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个静谧的夜晚，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睡梦中的王学陵惊醒。她一骨碌爬起来。是沿线一个火车站打来的电话，向她告急：“车站的上水设备发生故障，明天有‘特运专列’通过。可机车无法加水了。”

夜里1点，王学陵乘铁路轨道车，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那个出事的火车站。她在现场仔细察看，凭着丰富的经验，终于在三米深的地下，找到了症结。天亮了，“特运专列”汽笛长鸣，徐徐开来。王学陵太累了，她扶着铁锹柄，支撑着满身泥浆的身子，扬起溅满泥水的脸，望着火车加水。

火车又一次拉响汽笛，向她致敬。她静静地立在那里。阳光下，她显得苍老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小姑娘了。她刚进入中年，就鬓染银丝，像个老太婆了。可她那双眼睛却格外地明亮，使她具有一种苍劲的美，就像铁路旁的那棵胡杨。

陈文汉、王学陵不正是航天铁路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吗？他们的生命像一轮太阳，将光和热全部献给了航天事业。

毛泽东亲切接见航天铁路职工的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这条铁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迹。航天铁路人心中珍藏着幸福的回忆

在航天城，我们问铁管处的退休老司机张文甫：“36年中，您最值

得回忆的是什么？”他马上回答：“周恩来总理来基地视察，在东风火车站月台上，与大伙儿亲切交谈……”

张文甫很具有代表性。许多航天铁路人都认为：36年中值得怀念的，除了那段艰苦而火热的生活外，就是共和国的领导人与航天铁路人的特殊感情。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航天铁路官兵和职工们定量就餐，吃不饱肚子。一次，齐瑞印机班的三名机车乘务员出乘后十几个小时没吃饭，竟然饿昏了。本来就吃得少，再加上铁路官兵、职工干活体力消耗大，很多人得了夜盲症和浮肿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得知基地的这一情况后，亲打电话给各省省长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要求全国、全军支援基地建设。邓小平总书记发出指示：国家困难再大，其他工程可以适当下马，但基地建设要搞下去，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搞！

很快，各类珍贵的救援物资通过航天铁路源源运进了基地，运进了铁管处的“小点号”，给创业者以极大的鼓舞。航天铁路官兵、职工与基地全体官兵一道吃野菜、煮沙枣，用杂和面和代食品，度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一位老铁路职工告诉我们，当年他浮肿，“如果没有周总理送来的黄豆，也许我早就没命了，我们忘不了我们的好总理……”老人眼里噙着泪花，说不下去了。

1986年3月26日，邓小平总书记的专列开上了航天铁路，当晚到达东风火车站。时间很晚了，为了不打扰基地的官兵们，邓小平决定就睡在专列上。车站的铁路官兵们发现，邓小平车厢里的灯光一直亮着，他一直工作到深夜才休息。第二天，邓小平总书记在车站附近亲切接见包括铁管处官兵在内的基地官兵代表。吉普车开得稍快了点，以致大家还没看清小平同志的面容，车就开走了。大家不甘心，就请基地首长给小平同志捎话儿，能不能再接见一次。小平同志欣然应允。上午11时，小平同志又重新与大家见面。官兵们排着队，这回总算看清楚了。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至今还被铁路官兵和老职工们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在昨天。

1966年6月30日上午10点，周恩来总理来到东风火车站外，准备登乘专列回京。当时东风火车站候车室里有许多铁路官兵和铁路职工，他们乘坐的客车待专列发车后才能开车。基地保卫处的同志为了安全，在总理到来前，就将候车室的大门锁上了。总理一到，大家扒在窗台看总理。见此，周总理回过头来，放慢脚步，向大家挥手致意。又让随行的基地首长找人打开候车室的门。官兵和铁路职工们拥到站台上，争先恐后地与周总理交谈了十多分钟。总理双臂交叉胸前，与大家谈笑风生。上车后，又拉开窗帘，向大家挥手。

12点左右，专列行驶到大树里车站附近。周总理发现烈日下有个小战士在巡道。当时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戈壁上又干又热。大树里站停车后，周总理特意让秘书给那个巡道的战士送去一个大西瓜。那名战士正好又热又渴，马上就将西瓜切开吃了。事后有人告诉那名巡道的战士，西瓜是周总理送给你的。那名战士后悔得直拍大腿。连长也说，你怎么不让我们也分享一块总理送的瓜啊！那名巡道战士不好意思地笑了，既遗憾，又幸福。

航天铁路职工最幸运的，要算是机辆段老工人赵江萍了。1970年5月1日，他作为基地发射“东方红”卫星的代表之一，在首都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岁月如流。1992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的专列驶进航天铁路。他详细了解了铁路的过去和现在，勾画出了航天铁路未来的宏伟蓝图。

明天的航天铁路，将更加辉煌！

新一代的航天铁路人，将更加奋进！

（作者为《人民铁道报社》群工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　萧　徐）

袁克文为何自号“寒云”

著名画家许麟庐先生原先住在北京车站附近的芝麻胡同一个四合院内，离我办公的地点裱褙胡同不远，步行十多分钟即到。许先生时常邀我去品茶论画。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竹箫斋”内常挂着名人书画，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批，如一个小型书画展览。

一次，客厅中挂着一幅袁克文（袁世凯次子）书写的篆字联：“西风寒树幽人醉，明月微波玉笛横。”古朴典雅甚是耐看。许老说，这是我从天津杨柳青画店偶而购得的，很喜爱特地请张伯老题词。张伯驹以其别具一格的书法欣然提道：“项城袁氏，余与克文交最笃。因其得有宋《蜀道寒云图》，遂以‘寒云’自号。寒云工书画，善诗词戏曲，余与有同癖，时相过从，人以比之陈思昭明太子，常为过誉，然因一代文采风流人物也。余所见其篆字书联于此只有两幅，笔意潇洒，无剑拔弩张之气，麟庐得洵可宝也。中州张伯驹题记，时年八十有四。”

朱继功

大渡河：翼王悲剧地 红军胜利场

● 邱远猷

大渡河，是我这个史学工作者多年向往的地方。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灭，成为千古恨事；中国工农红军则在这里胜利渡河，打通了走向革命胜利之路。当我夙愿以偿驻足这一古战场时，怎能不感慨万千！

大渡河，古名涐江，当地人又称铜河。发源于青海省东南端。流入四川的上游有大金川、小金川来会。从北向南流过泸定到达越巂（位于大渡河的南岸，幅员广大，清朝建制是厅）的北界，就折向东流。至乐山，会同青衣江一起注入岷江。这条河，两岸雪山绵亘，峰峦重叠，每逢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惊涛拍岸，震得山鸣谷应；巨浪翻滚，有如万马奔腾。既因水势凶险，不易架桥；复以水寒彻骨，难以泅渡。从前两岸之间，只有少数渡口和铁索桥可以通行，真可谓我国西南有名的天堑。

翼王悲剧地

石达开（1831—1863），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客家人，富有的农家出身。父母早亡，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16 岁时，在当地已经成了崭露头角的人物，被人尊称为“石相公”。洪秀全闻他的名，和冯云山去访问他，结拜为兄弟，他参加了拜上帝会，称为天父第七子。石达开倾家产，日谋反清起义。1851 年 1 月金田起义，任左军主将，12 月在永安（今蒙山）封为翼王，称五千岁。后参与克武昌，率军占南京，督师西征，与秦日纲攻破清军江南大营，战功卓著。他是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杰出的领导人之一。1856 年秋“天京变乱”后，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但遭天王洪秀全猜忌，于 1857 年负气出走，后率 20 万精锐太平军单独行动，开始远征，计划去成都，取四川独立。在转战西南的过程中，由于奉行流寇主义方针，没有基地作依托，长期流动作战，又脱离人民群众，结果多吃败仗，起义队伍损失严重。1863 年 4 月石达开率军 4 万人，从云南米粮坝出发，急渡金沙江，进抵四川宁远府（西昌）河西司。5 月 14 日的黎明，石达开率领 3 万太平军长驱直抵紫打地（紫打地原是清越巂厅西北境的一个小场，在大渡河南面，1902 年被洪水冲没。后在此地不远处建现在的石棉县安顺场）。想越过大渡河这道天险，从大渡河北岸经雅安，径取成都和川西平原。事前，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石达开给彝族土司王应元送了礼，向他们买路。石达开以为既然土司已经接受了礼物，就不致遭到腹背受敌的危险，所以进入了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山川险隘，进退艰难，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险地。

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闻知消息后，就立即派重庆镇总兵唐友耕调兵遣将，赶往大渡河北岸防守，从北、西两路对石达开进行包围和堵截。尤其恶毒的是，他同时施用各种手段收买南岸的土司王应元和土司岭承恩，使他们背信弃义，对石达开反戈相向，使石面临四面受敌的境地：北面是大渡河，对岸有清兵唐友耕部严密把守；西面是松林河和土司王应元的反动武装；东南面是马鞍山及土司岭承恩、清参将杨应刚把守；南面山径险路被岭承恩砍倒千年古树堵塞，又有清游击王松林的兵勇堵守。石达开陷入了重围。

石达开 5 月 14 日进入紫打地时，北岸清军唐友耕部当时尚未赶到，原是抢渡大渡河的极好机会。可惜，他对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考虑到，犯了军临死地、不疾战则亡的大错。当夜，适逢翼王娘刘氏生儿子，第二天又传令休军 3 日庆祝，没有过河。同时，大渡河口本来不多的渡船，这时又全部被王应元撤走，王应元还胁迫紫打地居民全部迁到松林河西，连粮食也都搬走。石达开的 3 万大军面临着无粮无船的困难，因而不得不在紫打地暂时停留下来，编筏造船，并且搜索粮食。但是，在 3 天以后，等到编造起几十只船筏的时候，不但北岸的清军大批齐集到位，布置了防务，王应元征调的彝、汉增援兵勇，也都聚集松林河西岸，

防守巩固。而且，天有不测的风云，连日大雨，大渡河的水位陡涨几丈，给渡河带来了加倍的困难。

石达开这时不顾渡口水势的险恶和对岸敌军的堵击，从5月21日起开始了顽强的敌前抢渡。他选出精兵四、五千人，分驾几十只船筏，战士用挡牌护身，拚命强渡。岸上的将士们，也都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声震山谷，惊天动地。清军从北岸用枪炮轰击，筏上火药中炮起火，各船筏同时炸裂，将士们纷纷落水，随惊湍飘没。有几只竹筏冲到下游，也被清军沿流击沉。这头一次强渡的太平军战士，竟无一生还。以后又几次强渡都未成功。

石达开见强渡大渡河不得，5月29日，他又向大渡河支流松林河进攻，打算强渡过去再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向泸定桥进军。松林河两岸交通原只靠一座铁索桥维持，长48丈，高5丈。在太平军到达紫打地之前，被骆秉章收买过去的王应元，下令所管辖48寨居民，坚壁清野，不留一颗粮食在外；调集彝、汉兵勇，撤掉铁索桥上的木板，沿河据险扼守。石达开派军昼夜猛攻强渡，都失败了。第二天又亲自督军，猛攻松林河数次，王应元率汉、彝兵勇拼死抵抗，仍攻不下。6月3日半夜过后，大雨停止，山高遮月，月色惨暗。石达开派先锋贾维杨带领500壮士夜袭偷渡。王应元惊觉，率兵抵御。不到一刻，人船俱覆，贾维杨和500壮士全部壮烈牺牲。

在石达开派军攻松林河那天夜里，土司岭承恩带彝兵又偷袭占领了紫打地东南面的马鞍山，于是粮食被截断，退路也绝了。石达开的战士吃完了粮食，就杀马而食，最后只能采野菜、摘桑叶、掘草根充饿。他们尽管枵腹苦战，斗志仍然昂扬。石达开感慨悲歌，题绝句10首在壁上，其中两句写道："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涐江定不降。"但是，战士们的体力却越来越弱了。

6月9日夜，清军越嶲营、土司岭承恩彝兵、王应元彝、汉兵，对石达开紫打地大营发动了围攻，大渡河北岸清军也用炮隔河轰击。石达开率部誓死抵抗，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无奈敌人几面夹攻，火力凶猛，石达开部队损失太大了。天还未明，石达开只好率领残部6000多人向东突围。且战且走，奔走了20多里，部队伤亡很多。到第二天（6月10日）天明时，突围至大渡河的另一支流老鸦漩河西岸的利济堡。石达开见老鸦漩河水势汹猛，难以越过，于是收拾残部，暂且安营住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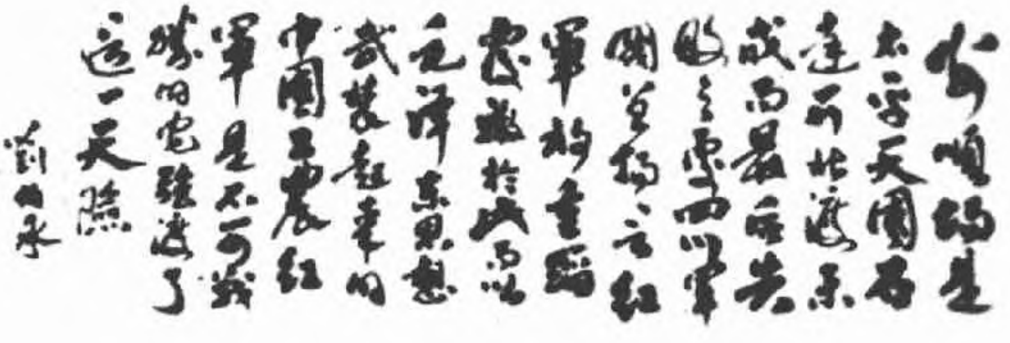
这一天夜晚，天昏地暗，星月无光，四野无声。只听得号角凄厉，惊涛激荡。有时也听到伤员病号和妇婴的饮泣和呻吟。石达开这时心中犹如刀绞一般难受，他和部将相聚而泣，商议着最后一线出路。在石达开看来，跟随他多年的将士，面临如此不幸的结果，这是他身任主帅的罪过。自己投河一死并不能消除这种罪过；只有以自己的死来换取保全部众的生命，才是他做主帅的应尽的本分。石达开从保全部众的责任感出发，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提出了以他一人死来赦免他的部众的要求。信中说："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这是石达开在绝望之中能采取的最后一步。

夜很深了。石达开含着眼泪，进入后帐，和家人诀别。早在几天前紫打地突围之前，有的翼王娘就已经投水自尽了。另外几个翼王娘胡氏、潘氏、吴氏以及他们的幼子，也都在6月10日夜晚，投老鸦漩河自尽。只有翼王娘刘氏和她的初生婴儿石定基，石达开派两名心腹卫士保护，当晚逃出险地，以图日后报仇复兴。石达开的妻小或死或走以后，只留下了一个5岁的儿子石定忠在身边。他忍抑着心头的悲痛，手握宝剑，倒在石头上，稍稍休息一下，准备来日的战斗。

6月11日，天色未明，清军突然冲杀过来。石达开奋力夺路，奔向东南方向的凉桥。清军拦阻于前，王应元追兵在后，石达开进退无路，收集残部，疾首蹙额，仰天长叹，说："进退路绝，突围无法，本藩与各弟今天都死在这里了！"将自刎殉节。清参将杨应刚率兵扼守凉桥，见石达开被迫惶急，怕他在拚命中牺牲或者自尽，急驰上高阜，大呼王应元各军停攻，说已奉令准石达开降免。石达开不得已也放下武器，把写给骆秉章的信送过去。杨应刚迎接石达开，到了洗马姑场清营。杨应刚假意极力奉承，又在洗马姑场欢宴石达开部属将士，来欺骗他们。6月13日，北岸清军增兵到来，就胁令石达开和部属到了大树堡。6月16日，清总兵唐友耕传令，将石达开及其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押送过大渡河，准备解往成都。石达开彻底受骗了。清军将领对留在大树堡的石达开部众，先把那些新参加的和老弱的遣散了约4000人。到6月19日深夜，突然发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石达开200多员部将、2000多精悍战士，全部死难，偶尔有逃出的，也被彝兵沿途截杀，然后把尸体纷纷抛进大渡河，淹没在滚滚的波涛之中。

6月25日，石达开被解到成都。他面对着骆秉章，怒目而视，不肯屈膝。他盘坐在一个蒲团上，痛斥清朝统治者暴虐无道，申说自己的革命情怀，历叙起义光辉业绩，最后说："南面称王十多年，杀妖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石达开遭受极其残酷的凌迟极刑，仍神色怡然，视死如归。时年33岁。

后人为缅怀石达开，石棉县建有多处建筑物。在老鸦漩河的岸边上，有解放后建的翼王亭，那是一座6角亭，韩夕畦撰《翼王亭记》石碑竖立其中，碑文清晰可见。解放前的有1943年6月，国民党"陆军第一百二十五师中将师长刘美抚拜撰"的《太



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殉难碑》；1944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撰的《大渡河怀翼王石达开并序》碑；1945年，“里人赖秉权谨记”、“里人曾濬文书”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打紫大地蒙难纪实》碑。

红军胜利场

在石达开大渡河畔紫打地兵败72年后，1935年5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也到达了大渡河畔的安顺场。

那是1935年5月中旬，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几万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率领下，在四川抢渡金沙江后，北经西昌、冕宁，来到了大渡河南岸安顺场，也进入了这个险境。

同样的5月，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的围追堵截，同样的渡口，同样数量差不多的军队，蒋介石见到历史这样的类似，大喜过望，幻想历史重演，红军重蹈覆辙，不禁狂呼：“叫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但是巧合毕竟只是外表的相似，呓语终于成为反动派对自己的讽刺。

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进驻安顺场后，选择好了强渡大渡河的指挥所。我到实地去参观，看见指挥所是设在一座紧贴山麓的石垒瓦房里，二层楼，坐南向北，北、东、西三面都有窗口，通过窗口，大渡河南北两岸一览无余。这座房子，至今完好无损，成了纪念性的展览室，陈列着许多当年红军胜利强渡大渡河的实物和照片。

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及时开展政治思想和宣传群众的工作。他们也向战士们说明了安顺场是具有“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地方”。红军领导人特地会见了曾经亲见石达开在此失败的老人。老人怀念着石达开部队“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称赞“红军的纪律则较翼王更好”。

红一方面军政治部还在安顺场及其附近地区，刷写了许多标语。至今，或依稀见到的有这样几条：“红军是北上抗日的主力军！”“红军是帮助干人（四川方言，即穷人）谋利益的！”“工农群众起来实行土地革命！”“不替军阀□□□打仗大家当红军去！”“反对卖国的国民党□□□！”“红军优待白军俘护（虏）兵回家发路费当红军更欢迎！”“红军是工农的军队！”这些标语当时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和当地彝、汉族广大群众。

在作好强渡大渡河的一切准备特别是搞好与当地彝族人民的团结关系之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在1935年5月25日，不顾渡口水势的险恶和对岸敌军的堵截，在刘伯承总参谋长、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开始顽强的渡河战斗。红军在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得仅有的1条渡船，船老大帅士高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摆渡，一师一团二连的17名勇士，在机枪、迫击炮的掩护下，从上午9时发起强渡，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拚搏，终于冲破对岸1个营敌军的火力封锁，乘船强渡登岸成功，为部队前进打开了第一条通道。

红军战士及时把这一胜利喜讯报告给毛泽东同志。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到安顺场听取了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左权等同志的汇报，研究了如何使全军越过大渡河的问题，布置了新的任务。当时，红一方面军第一师正在继续渡河。但是，这里的水流太急，经过几次试验，架桥的希望不能实现。当地群众的船只都被敌军毁坏，红军只寻得几只小木船。每船往返一次，至少要花几十分钟，要使几万人马全部摆渡过河，大约需时一个月左右。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尾追红军，已于2月26日进抵西昌以西的礼州，并抽调二十四军第七师师长刘元璋率所

部三分之二兵力，协同中央军一道由南向北追击，离红军只有几天行程。蒋介石电令四川军阀、二十军军长杨森就任大渡河守备指挥。杨森奉蒋介石之命也正由川南叙府（今宜宾市）兵分两路赶赴大渡河堵截：一路经犍为、乐山沿大渡河北岸向清溪（当时汉源县城）、富林（今汉源县城）前进；另一路经洪雅、夹江向雅安、荥经等县前进。形势十万火急，如果红一方面军不能尽快实现进军川西北地区会合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战略目标，还有被分割在大渡河两岸遭敌歼灭的危险。为了迅速粉碎敌人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放弃原拟从安顺场全军渡河的想法，决定兵分两路，夹河北进；红一师为右路纵队，从安顺场渡河后，由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领导，沿东岸溯流北上，策应左路执行夺桥任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同志亲率其余红军组成左路纵队，沿西岸北进。担任左路纵队先锋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第二师第四团，由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同志率领。军委指示左路纵队先锋团在3天内夺取离安顺场320里的泸定桥，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全部红军胜利越过大渡河天险。

5月27日，右路纵队红一师渡河完毕，左路纵队红二师四团先锋出发，向泸定桥奔袭。正当红四团沿河西岸向北疾进的时候，敌情发生新的变化。红军先头部队夺取安顺场渡口的第二天，即5月2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便急忙由重庆飞往成都，督促“剿匪”一事，频繁向泸定桥方向调兵遣将。5月28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命令，把原定部署提前1天，限令红四团在次日拂晓赶到泸定桥，迅速完成夺桥任务。红四团接令后，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行程240里，终于在5月29日早晨6点多钟赶到了泸定桥西岸。下午4时，飞夺泸定桥总攻开始。黄昏，红四团全部飞越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县城。第三天，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到了。第四天，红军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大渡河天险，接着乘胜挺进。6月中旬，翻过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与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到懋功（小金县）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大渡河畔安顺场，石达开饮恨终生的地方，成了中国人民革命夺取新胜利的起点。当时亲历胜利强渡大渡河战斗的李一氓同志，深为石达开在大渡河的悲剧所惋惜，更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所鼓舞，挥笔写下了评说咏叹石达开的《怀古两绝句》：“澎湃铜河一百年，红军史迹费流连，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早知末路排安顺，何不南朝共死生！”同时又写下了热情讴歌红军的绝句：“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锋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险，又见红军过铁桥。”

到安顺场参观、访问过的人，都会在这里读到许多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受到历史的启示和教育。1983年5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48周年纪念之际，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碑文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在这里落成揭幕。纪念碑屹立在安顺场大渡河畔。高6.26米，宽3.7米，厚3.2米。全部采用灰色花岗石雕刻而成。碑体正面右上方镶嵌着一个红军战士巨大的半圆头像，两眼凝视前方；下半部是17勇士乘风破浪、飞舟挺进、直逼对岸的浮雕。碑体背面刻着邓小平同志题词的贴金大字。整个纪念碑呈堡垒形状。整个纪念碑构图严谨，雕术精湛，把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一师二团以17勇士为先导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的激战场面，生动地再现在眼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纪念碑落成的题词，都陈列在石棉县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里。这些题词歌颂了强渡大渡河的勇士和船工们光耀山河、永垂千秋的英雄业绩，也激励人们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壮志豪情。如：

刘伯承同志的题词是：“安顺场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重蹈覆辙于此。而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强渡了这一天险。”

聂荣臻同志的题词是：“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一举强渡胜，三军大步前。”

张爱萍同志的题词是：“强渡天险红军万岁！”

宋任穷同志的题词是：“强渡大渡河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杨成武同志的题词是：“发扬长征精神！”

杨得志同志的题词是：“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成功，粉碎了蒋介石妄图要红军作第二个石达开的迷梦，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让我们以红军的革命精神，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而奋斗。”

陆定一同志的题词是：“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彝汉团结紧，建设永无疆。”

乱石嵯峨，波浪滚滚，奔流不息的大渡河是历史的见证。

（责任编辑　徐　鲁）

以崇尚节俭为要务的刘裕

●安中晶

在封建政权中，皇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先秦时期，已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到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后，更是“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能”。因此，历代皇帝中滥用民力，穷奢极欲者颇多。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皇帝以节俭而著称，南朝宋高祖刘裕就是较为突出的一个。

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自称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西晋战乱后迁至晋陵丹徒（今属江苏）。父亲刘翘曾出仕为郡功曹，但刘裕自幼家境贫寒，他以耕种为生，亦曾捕鱼伐获，深知衣食来之不易。

刘裕在东晋末投军，屡立战功，逐渐成为北府军的主要将领。以后，他凭借北府军的势力，消灭桓玄、执掌了朝政大权，又挥军先后平南燕，灭后秦，最终取代东晋政权，建立起刘宋王朝。

刘裕掌握国家大权后，以国事军务为重，从不以珍奇宝物为意。“宁州尝献虎魄机，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合创，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对于各地所进献的其它特产，刘裕则力戒奢侈，以为天下做出表率。“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他从不因一些器物于己舒适就加以享用，唯恐天下会因此而渐开奢风，如他一直患有热病，身上又曾多次受伤，到晚年发作得很厉害，坐卧常需要凉物，后来有进献石床，他躺上去，感觉颇为凉爽，十分舒服，但他又叹息说：“木床且费，而况石邪。”即令人将石床毁去。

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刘裕亲自统军攻灭后秦。当时后秦经过姚氏数十年的经营，公私富庶，库藏中的珠玉珍宝颇多。但刘裕并未乘机大加收敛，而只是收取彝器、浑天仪、土圭等国家所需的礼仪、测量之器，送到建康（今江苏南京），献给名义上的统治者晋安帝，“其余珍宝珠玉，以班赐将帅”。刘裕在东晋末已是大权在握，但到他正式登上帝位后，一直是“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

起初，朝中宫廷音乐的乐器及乐师都不齐备，长史殷仲文屡次向刘裕建议应逐渐配齐，刘裕说：“日不暇给，且所不解。”殷仲文说：“屡听自然解之。”刘裕说：“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殷仲文认为帝王应享用一定规格的宫廷音乐，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帝王的气派。而刘裕则并不以此虚假排场为要务，一方面讲自己忙于国事军务，无暇顾及于此，另一方面明确表示自己并不以不懂标志帝王享受的宫廷音乐为耻，且不愿增此奢华之物，唯恐因而荒废国事。因此，史称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者”。

刘裕在日常生活中穿着颇为简易，即使当上皇帝后也不讲究仪仗侍从，“常著连齿木履，好出神虎门逍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他对家中妻儿亦要求甚严，“高祖以俭正率下，后恭谨不违。及高祖兴复晋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粗素，不为亲属清漗。”并从小培养孩子的节俭之风，“诸子食不过五盏盘。”

对于房室殿堂的布置，刘裕也禁止搞得过于华奢。有关机构奏请在东、西堂、“施局脚床，金涂钉”，刘裕就不允许，只许用直脚床，使用铁钉。在永初二年（421），刘裕还下令禁止天下使用金、银涂物。

对于婚丧习俗，刘裕则力纠东晋时期的奢侈之弊。他的女儿出嫁，“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敢为侈靡”。由于他以身作则，使得王公大臣、士族豪强也都随之仿效，由奢趋俭。永初二年，在禁金、银涂物后，他又下命禁止在丧事中使用铜钉。

许多人在富贵之后讳言自己出身贫寒，这些人多崇尚奢靡，以纵情声色来弥补自己往日享乐的不足；但刘裕不仅富贵，而且做了皇帝也不讳言自己的出身，以自己的俭朴之风，稼穑之艰苦告诫后人，以求其了解创业之难，从而守住已成的基业。

刘裕在控制朝政及至登上帝位后，能不改俭素本色，并以身作则来改易风俗，改变奢侈习俗、在历代统治者中可算是十分难得的了。

（责任编辑 徐鲁）

编 读 窗

编者按：**本刊1996年第2期刊登著名作家舒芜所写《"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一文，责任编辑在处理此稿时曾作较多删节，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又未征询作者意见，以至出现了某些事实上的和文理上的错误，特别是删去了表示作者对周作人研究的态度的结尾，舒芜同志对此很有意见。本刊接到舒芜来信后，两位社领导曾登门拜访向舒芜同志诚恳致歉。现遵照舒芜同志意见，将他给本刊的来信全文发表。今后，我们将更加严肃地处理来稿，努力避免不应出现的失误。**

作家舒芜致本刊信

《炎黄春秋》编辑部：

我应贵刊之约而写的《"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一文，已在贵刊1996年第2期刊出。原稿10000字，刊出来的是6000字，被删去将近一半。既有大删，必有改动。于是就出现了使我很尴尬的问题。

现在一开头的一段，是这样的：

1917年4月1日，一个32岁的绍兴中学教师，竟然走进北京大学殿堂，执掌起教鞭。不久，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便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周作人。

如果有一个稍知周作人生平的研究者来质问我：1917年4月1日，明明是周作人到北京的日子，你怎么说成是他"走进北京大学殿堂，执掌教鞭"的日子？你怎么开口才一句就错得如此荒谬？难道他那天下午八时抵北京，当晚就去北大上课？难道你不知道，直至9月4日，周作人才接到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的聘书，已经是他4月1日到北京之后五个月的事？如果受到这样斥责，我真是冤枉。因为，我原稿并不是这样，而是——

1917年4月1日，一个32岁的中学教师，从外地来到北京。不久，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便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周作人。

我说得很明白，1917年4月1日，是他"从外地来到北京"的日子，我并未说这是他"走进北京大学殿堂，执掌教鞭"的日子，并未将事实提早五个月。（还不必说什么"北京大学殿堂"，什么"执掌教鞭"，我都不会写下这些词语。北京大学也许可以说是"学术殿堂"，但不能说什么"北京大学殿堂"。官职权力之类可云"执掌"，教鞭不可云"执掌"。）

接着第二段的开头，我说周作人原在他家乡浙江绍兴的省立第五中学任英文教师，现在是应北京大学之约而来，这就点出了周氏的籍贯，点出了他来北京之前的经历，并暗示了他的中西学养有素，对于未必了解这些情况的今之青年读者，这些话是必要的。现在都被删去了。

我只说到他是应北京大学之约而来的，并未说他是何时登上北大讲台的，下文也一直没有说。这是因为他来到北京后，事情又有一些曲折，他先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五个月之后才接到聘为北大教授的聘书。我认为这段曲折，可以略去，无碍于他是应北大之约而来教书的基本事实。不料平白被加上我未说过的"走进北京大学殿堂，执掌教鞭"两句话，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之后，使我成了一开口就错，见笑于稍稍知道一点事实的研究者，我怎么能不尴尬呢？

上面说的是开头，我赶快再看结尾，又使我愕然。我原来的结尾，是特地提出约自1986年开始的有一种为周作人翻案之说，说什么周作人在抗战期间沦陷后的北平，实是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策动他出任伪职，打进去做爱国工作，并非叛国投敌，云云。我明确表示不同意不相信此说，扼要叙述了确凿有力的反证。这个结尾，竟完全被删去了。这是周作人研究中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每个研究者对这一原则问题持什么态度，是大家都很注意的。研究周作人，是否等于要为他翻案，正是最近有争论的。我虽然早有论文《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伪职问题》（载《鲁迅研究动态》月刊1987年第1期），系统地驳了翻案之说，但在刚刚纪念过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时，又是在贵刊这样一个拥有广大读者的刊物上介绍周作人，我认为仍然不能回避这个原则问题，所以我特地以此作结，表明我的看法和态度，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这一郑重的结尾竟无端被删去了，剥夺了我的权利，使我成了回避责任，我实在没有想到。

以上是文章一头一尾被删改的情况，至于中间被删去的4000多字，如要一一举例说明，未免太繁琐。总起来说，大概是我认为必需介绍的重要情况，都被删去了；我尽量叙述得眉目清楚的，都被压在一团混乱的文字里面了。有的删削，虽仅一句半句，也使我成了语法不通之人。例如，说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我原来是说，"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新文学的新，是要把人当人，尤其要把女人当人"，现在，加着重点的那个分句竟被删去，成了"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新文学的新，尤其要把女人当人"，"尤其要"之前没有了"是要"；读者将不知我在说什么昏话。类似这些例子，更举不胜举。

因此，我特向贵刊声明两点：一、现在这样开口就错，无起码知识，回避原则问题，态度暧昧，语法不通，修辞不妥的文章，我不能负责。二、因此，我也不能接受稿酬。敬希公布此函，向读者宣布，为荷：

舒芜

1996年3月8日

来辉武的创业精神

●张永民

多少年来，中华民族为生存、发展，孜孜求索，奋斗不息。艰苦创业，作为时代的精神，民族的传统，燃烧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热情和理想。

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有伟大的创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支撑505集团公司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既不是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巨额投资，也不是古都咸阳有什么特殊资源，更不是神仙和上帝赐给了什么“无字天书”，而是来辉武特有的一种创业精神，这种创业精神包括：不怕风险、敢闯敢冒的开拓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自主精神；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实干精神。

不怕风险　敢闯敢冒

要创一番大业，需有创业的胆，创业的识，没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冒险精神不行。

来辉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初弃政从医，敢于冲破陈腐观念的束缚，顶住社会舆论的压力，不顾家人亲友的劝阻，毅然抛弃乌纱帽，丢掉铁饭碗，冒着极大的风险，投身于自己构想的事业，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饱尝各种辛酸苦辣，终于在国内外独树一帜开创了医疗保健品这个新兴产业。

试问来辉武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一段鼓舞人心的话：“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他一再强调：“就是要有创造性”。邓小平同志这里提倡的，正是这种开拓精神和风险意识。而来辉武经过亲身实践做到了这一点，这种革命的胆气、豪气和冲劲，来源于崇高理想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来辉武的开拓精神和风险意识十分可贵。慎性十足，不敢负责的人做不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也做不到；至于那种心目中没有人民、没有理想、没有事业心而只有自己的人，不要说做不到，甚至连这种开拓精神和风险意识都理解不了。

白手起家　艰苦奋斗

当市场经济的大幕开启，奔向富裕的初潮涌来，当人们开始以新的目光重新打量旧有的一套价值体系，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奢侈之风也乘隙而起之时，沉重的历史和变革中的现实一再令我们警醒：艰苦创业的精神不可须臾失落。

来辉武创办企业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白手起家，靠省吃俭用，向同事和亲戚朋友借款，经历了许多辛酸苦辣，异常艰难地创办了中国咸阳保健品厂、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中国医科院西安分院医药保健研所，并于94年成立了陕西咸阳505集团公司，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集科研、生产、经营为一体的高科技实业集团，被评为全国百家知名企业、中国百强民营科技企业之一。在创办企业取得成功之后，来辉武身为数亿元企业的总裁，仍然保持着过去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每日粗茶淡饭，出外节俭，从不铺张浪费，他经常教育员工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并语重心长地对员工说：“寻根问祖，延安精神是505精神的源泉，505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延续，我们企业成功是在延安精神鼓舞下取得的，延安精神任何时候也不能丢。”对此，他要求505全体员工要永远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坚持勤俭办厂，勤俭办一切事业；号召员工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斤煤、一分钱；并牢记“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古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扬、摆阔气、贪图享乐等大少爷作风，并告诫员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牢固确立创业者必须具有的精神风貌，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坚韧不拔的作风，带领全体员工坚定不移地朝着世界一流企业的既定目标前进。

不等不靠　自力更生

“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先，不算是好汉。”来辉武对郑板桥的这一段名言特别欣赏。因此他在创办企业时，一开始就不等不靠，发扬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建立了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经营机制，并通过实践锤炼，为企业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全面、系统、严格、科学法制化的规章制度，探索企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之路。

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

“创业”、“创业”，最突出的的特点就体现在一个“创”字上，来辉武教授研制发明的505神功元气袋属高科技名优产品，经国内外一流专家教授组成的专家鉴定委员会鉴定并确认是“精心研制首创的产品”。之后，他又继续拿出创业者的开拓勇气和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的精神，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还陆续研制开发出了505神功健脑帽、药枕、护肩、健乳罩、护肘、护膝，505清心乐茶、五味清茶、六味地黄胶囊、杞菊地黄胶囊等高新技术产品，深受广大患者和用户欢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一无现成的本本可搬，二无现成的模式可套，需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来辉武在创建和发展505事业的过程中，以独特的创业精神、企业宗旨、企业政策、人格要求、总体战略、宣传策略、销售策略等成功经验，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面向市场，搞活经营，提高效益，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尽管面临保健品市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假冒伪劣仿制产品长期困扰，来辉武始终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求稹务实，严抓细管，狠抓产品质量，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同时，他教育505全体员工要树立牢固的质量观，把质量看成企业的生命，对待产品质量要像母亲对待独生子女那样精心和认真。积极实施名牌战略，全面强化质量管理，颁布实施了《质量手册》，切实保证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广告之页

《当代炎黄书画精萃》
作 品 选 登

上左图:何家英《秋冥图》　　上右图:刘炳森《自作七绝》　　下图:王迎春《伎乐天图》

炎黄春秋

1942年，董必武（右四）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与周恩来（右三）等合影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线指挥部部分领导张爱萍（右三）刘西尧（右二）

百天战斗:北平《解放报》从创办到被查封

向忠发是怎样一个中共总书记

艺坛猛士、政治漫画家米谷

梁实秋、冰心联袂主演《琵琶记》

大渡河：翼王悲剧地 红军胜利场

ISSN 1003-1170

05>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00元